

专题：嬉皮士运动五十年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7.11.20
2017年第47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小镇中国

自然、人性与新经济



963



9 771005 36000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4/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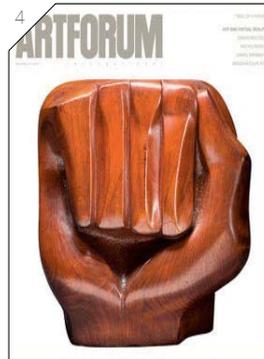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经济学人》(英国) 2017.11.11

美国危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有些人认为他的种种激进举措是在效仿里根, 试图通过巩固军事力量来扬国威。其他人则推测他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 若 2020 年无法连任, 一切将重回正轨。这两种想法都过于乐观。随着亚欧各国新贸易和新力量的崛起, 美国将在政治上更内向, 在经济上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崇尚“美国第一”, 只会让美国变得更弱, 世界也因此受损。



1 / 《时代》(美国) 2017.11.20 心系全球的马克龙

12 月, 除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外的 100 个国家的领导人将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 在巴黎商议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世界上最为全球化的威胁, 与此同时, 还有核武器、极右翼民族主义、圣战恐怖主义等问题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对于这些, 马克龙渴望讨论他的国家可以做什么。尽管他表示自己并不想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 但听上去他正在履行这样的职责。

3 /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1.11 坐立不安能帮你集中注意力吗?

“坐立不安”这种状态曾经被认为是无聊的标志, 弗洛伊德将这种症状归结为“烦躁”, 并将其表征指向性行为,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 多动症开始被视为一种病理症状。现在有科学家认为, 这种疾病与神经水平上的慢性低激发相关, “坐立不安”被吹捧为一种提高注意力、帮助多动症孩子甚至是有助于减肥的一种方法, 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吗?

2 / 《纽约》(美国) 2017.10.30 《吉米鸡毛秀》的政治对话

自 2003 年开播以来, 美国夜间脱口秀节目《吉米鸡毛秀》的收视率一直不错, 观众总是期待吉米对政治动向的新见解。近日, 吉米在节目中讨论家乡拉斯维加斯的重大枪击案, 并含泪指责政府在枪支管理上的不作为, 再次引发争议。在对吉米·坎摩尔的独家专访中, 吉米认为他的节目一直探讨政治, 但从不刻意在政治表达上过于强势, 他评论的永远是新闻里、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

4 / 《艺术论坛》(美国) 2017.11 艺术与虚拟现实

过去 10 年间, 虚拟现实的技术及其梦想再度强势回归。制作和观看 VR 影像的技术正在快速更新和发展, 预示着在不远的将来, 完全沉浸式和互动的虚拟体验会更加日常化。艺术家们也在探索这些交互式表达方式, 然而他们的态度并不乐观。本期专题探讨在当代艺术中的 VR 技术, 以及假象与真实、无所不在的新媒体技术与压迫感等问题。



P30 封面故事
自然、人性与新经济
小镇中国

- 34 小镇再发现：城镇化转向？
- 44 小镇的中国之路
- 48 戏、梦、互联网：谈不尽的乌镇
- 62 样板诞生记：“烂尾”工业园到云栖小镇
- 72 一个外来人士的小镇生活指南

P94

豫章书院：一场荒诞沉重的闹剧



P104

嬉皮士运动五十年



社会

- 热点：辽宁运钞车劫犯被审：三角债的深渊 90
- 热点：豫章书院：一场荒诞沉重的闹剧 94

经济

- 市场分析：中美经贸的新时代 88

专题

- 嬉皮士运动五十年 104
- 从“爱之夏”到“火人节” 112
- 嬉皮公社探秘 126

文化

-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如何重演一场经典谋杀 132
- 电视：李乃文，一个“不正常”的演员 136
- 戏剧：《金牌制作人》和它背后的喜剧传奇 140
- 收藏：挑战达·芬奇：《美丽的公主》之谜 146

专栏

- 邢海洋：360“借壳”与“壳”躁动 16
- 苗千：对称的宇宙 150
- 袁越：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 152
- 张斌：全球化，职业网球的现实与未来 154
- 宋晓军：三艘航母齐聚西太平洋的启示 156
- 朱伟：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⁵⁾ 158

(封面供图：视觉中国)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47期，总第963期，2017年11月20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字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面拉页 · 奥迪
封二~扉1 · 野生动物基金会
3 · 霞公府
17 · 美赞臣
43 · 三联全媒体
61 · 生活周刊
145 · 松果生活
153 · 冰上之星中国巡演硬广
155 · 三联中读
157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中菊资产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邮箱：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想象力绽放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关于孩子的讨论，大概就是“你希望他/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人会把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具体，可是根本的根本呢？我想还是希望孩子能成长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这种尊严感不是来自于对照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成功，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为人的快乐”。尊严来自对自我的建设，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期封面故事给我们陪伴孩子读书、游戏给了更细化更多面的指导建议，与孩子一起想象、思考、探知，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默心)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给孙子辅导作业

前不久回老家，到隔壁邻居刘婶家串门，只见刘婶坐在屋檐下，戴着老花镜，正拿着小学语文课本聚精会神地看。刘婶已经年逾六旬，虽说小时候也读过两年书，认得几个字，但因生活在农村，每天都是围绕着农活和灶台打转，并没听说过刘婶还有爱学习的习惯，今天怎么一反常态，不看菜谱，反而看起了小学课本呢？

原来，刘婶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小孙子留在了老家，由刘婶照顾。刘婶说孙子上小学前，因为害怕孩子磕着碰着，眼睛是一刻也不敢离开孩子身影，当时就合计着，虽然辛苦点，但等孩子上了学，自然就轻松了。不料，等到孩子上学后，照顾孩子的任务是不减反增：除了一日三餐外加接送之外，还额外增加了辅导孩子学习的任务。

刘婶苦笑一声说，先不说别的，就说这上学时间吧，现在小学放学时间都挺早，下午不到4点孩子们就放学了，听说放学早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是没错，不过孩子应该掌握的知识不能打折呀，但因为孩子在校时间短，很多老师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只讲了一遍。刚上小学的孩子本身因为年龄小、注意力不集中，知识点怎么能记得牢呢。这就必然需要家长课外给予辅导了，不然这孩子肯定第二天更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节奏了。所以说，现在谁家有小学生，家长不都是辅导作业辅导到半夜呀。对于城市里的家长来说，辅导孩子普遍不是什么难事，可在乡村，因为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孩子们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可爷爷奶奶大多识字不多，而且年纪也大了，对他们来说辅导孩子真是有点勉为其难呀。

听了刘婶的话，我也不禁一愣。的确，虽说教育的责任更多在于家庭，但乡村和城市毕竟不同，如果不能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恐怕“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情形难以改变，毕

竟小学是一个人打好基础、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刻，如果学校不能给予他们更多帮助，依靠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恐怕成效不大。

看我陷入深思，刘婶却又说道：“现在这素质教育也不是没有好处，你看家里的小孙子才上小学没多久，老师便时不时发短信要求家长陪同孩子完成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比如中小学素质教育知识竞赛、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网络问卷调查等，这些问卷调查、知识竞赛无一例外都需要通过网络完成，本来我这个农村老太太也不需要使用智能手机，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儿子儿媳专门给买了一部智能手机，我也顺便接触了高科技。”刘婶笑着说，“不过，对手机这东西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孩子们虽然给买了，我也不太会捣鼓，倒是小孙子，别看年龄小，用手机上网倒是很在行，就是有了这手机之后，老是用来玩游戏，管也管不住，辅导作业那是更难了。”

河南 关晓海

婆婆爱上“拼生活”

婆婆退休后，学会了电脑打字和上网，便开始与时俱进全面与网络接轨，开始有意尝试网络上新鲜的生活方式。继网购、换客、低碳之后，她又开始了“拼客”生活，既时髦，又实惠。

婆婆的“拼生活”，首先是从“拼菜”开始的。去年的蔬菜副食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飞涨，婆婆的钱袋子却没能跟着鼓起来。每次去菜市场回来，菜篮子是越来越轻飘，蔬菜颜色是越来越单调，直接影响到了全家人餐桌的丰盛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从网上懂得了“拼客”一词的含义之后，婆婆就从“拼菜”开始实践了。婆婆发挥曾担任过居委会大妈的特长，没一个时辰就联系到了小区里几个经常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的阿姨，一路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杀向菜市场“拼菜”。与菜摊小贩一通斗智

斗勇的讨价还价过后，以比平常便宜20%的单价批发了她们想要购买的各种新鲜蔬菜，然后她们在菜市场的角落用自带的弹簧秤一一划分，分配妥当后才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

“拼菜”的好处立竿见影，婆婆手里握着与过去同样多的人民币，菜篮子却装得满满当当的，餐桌上的菜品也丰盛丰富了许多。公公调侃着说，家人久违的笑脸又阳光灿烂了，小孙女的健康也得到有力保障了，真是皆大欢喜。

初次尝到“拼菜”的甜头后，婆婆做“拼客”的劲头更足了。紧接着婆婆又开始了她的“拼车”生活。公公婆婆都是热爱户外运动的“驴友”，春天来了，每个星期天，公公婆婆都要去郊外转转。因为风景区离家很远，公公婆婆每次都是坐车去，可每次坐车的费用让婆婆心疼得咬牙。自从有了“拼菜”的成功经历后，婆婆又开始策划着“拼车”了。

婆婆真是不错的社交家，很快她就联系好了“拼车”的人选——小区里几对志同道合的老夫妻。他们与婆婆一拍即合，还翘首称赞婆婆新潮、时尚、前卫。那个周日，婆婆他们就高高兴兴地“拼车”去五花山爬山了，回来时用省下的车费给小孙女买了一个毛茸茸的小熊玩具。

有了两次成功的“拼客”经验和心得，婆婆的“拼生活”一发而不可收。前不久，婆婆又组织了几个老姐妹去美发厅“拼头”了一次，“拼头”回来后，婆婆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仿佛年轻了十几岁。接着，婆婆又忙着组织人去商场“拼购”，去外地“拼游”，跟朋友们“拼饭”……

“拼生活”不仅给婆婆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身体的康健，还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新乐趣。婆婆津津乐道地说，爱“拼”才能赢，她要誓将“拼生活”进行到底。

哈尔滨 佟才录

抵抗自卑的高中时代

这种即便没有填写志愿，但是贸然去学校一问即被录取的事情，在今天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了。虽然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它也是一个偶然事件。中考报志愿时，我因为保守谨慎没有填报本地区最好的高中临一中，而是选择了所在县城的学校。考试成绩却很好，我和妈妈决定去一趟学校。说不出当时所见的那个老师是什么职务、什么身份，只是了解清楚我们的来意后就让我回家等待。接下来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临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学籍和档案也顺利地转入了新学校。整个过程没有花费一分钱、没有走任何后门，前后不过半小时。

后来从我同班同学的口中得知，他从临三中转入临一中多花费了近3万块钱，又一个因志愿没填好而不得不奋力一击的案例。只不过因为他是当地的学生，所以就比我支付了更多的成本。这份入学的经历除了让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梦幻，也为我接下来人生中的分野拉开了大幕。在此之前，我是那种有点聪明、有点刻苦，但

是没有梦想也没有远见的浑浑噩噩的“好”学生；在此之后，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满心惶惑、用努力支撑自尊、用沉默代替自卑的“怪”学生。

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社交。我以前没有体会过这种压力，更不用说懂得与其周旋与相处。在小县城，成绩就意味着一切。只要成绩好，老师就喜欢你；老师喜欢你，同学们就不会给你难堪。我记得当时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对我说过一句话：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学习最好的。而这种成绩既不指代你的个性、与你的为人处事无关，你也可以没有才艺，它就是那个字面上的意思——考试成绩。一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无需讨好任何人，也没有什么人格上的理想。我无需费力让谁喜欢我，也从没体会过不被喜欢是什么滋味。来到高中后，这一切都失效了。

周围的同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特长生，也有一路保送而来的尖子生。我的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保送”这个词。而特长生的意思并不是只有特长，女同学们除了漂亮、唱歌水平达到专业级，连文化课成绩都很好！男同学们聪明、圆滑，考试永远第一名。而且因为很多人在初中时就已经是同学，所以某种程度上的“小圈子”是存在的。那里承载了他们共同成长的欢乐与隐秘心事，

留给外界的还是森严而苛刻的人格壁垒。也就是说，即便你成绩非常好，要想被大家真心接纳还是很难的。反观当时的我，衣着朴素而土气，肥胖又不会打扮，性格阴郁而倔强。如果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坍塌有声音，当时的我一定忍受着轰雷巨响。

为了改变，我做过很多尝试，无一例外地像个滑稽而丑陋的笑话。外形一时变不了，也不用奢谈现学才艺或技能，唯一能倚仗的就是成绩和思想。说来同样苦涩，因为一直以来精神上的贫瘠，我读的书永远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土气与不适宜。我给同学们分享《谁动了我的奶酪》，底下嘘声一片；我迷上了哲学，却发现同学们已经不再看周国平了。费力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却仿佛篡位的老皇帝染上了骄横与一意孤行的作风——强迫大家在自习时间学习古籍与格言——一个漫长而落伍的理想。凡此种种，并没有错，可是也从来没对过。即便后来成绩越来越好，我在社交上的失败还是昭然若揭。对于一个自尊正烈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切都太苦涩了。

毕业10年了，想起当年午夜落泪的小人儿，心里还是有几分不忍。10年后的我们，各自有体面的工作与身份，但是好像也就仅此而已了。

中读用户 木易

致歉：本刊第38期《高桥盾：朋克，但是美丽的》一文中部分文字和图片引用《T Magazine》，特此致歉。

本期截稿时间：11月13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美国 | 退伍军人节

11月10日，一名妇女在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举行前来到亲人的墓前献花。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也被称为老兵节，节日当天，全美国会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退伍军人和阵亡将士。



西班牙 | 书雕

(右图) 11月9日, 来自西班牙阿利坎特的艺术家玛莲娜有一双妙手, 能将废旧书籍变成精美别致的迷你书雕。玛莲娜把别人丢弃在垃圾桶的旧书回收, 或者在二手书店、图书馆搜集废旧书籍, 进行二次创造, 将它们变成一件件精美的书雕。



土耳其 | 露天早餐

(左页上图) 11月11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艺术文化中心 Kubbe Istanbul 的工作人员在该艺术文化中心房顶吃早餐, 十分惬意。

日本 | 自然水族造景

(左页下图) 11月8日, 东京巨蛋举行已故日本水草造景大师天野尚作品展。天野尚将自然美景与生态模式紧密结合融入水草造景中, 创立了自然水族风格造景的艺术形式, 堪称水草界的巨人。





新西兰 | 冰山演唱会

(左图) 11月6日, 英国电子乐队 Modestep 在新西兰塞西尔峰挑战野格冰山演唱会上。

塞尔维亚 | 创意化妆术

(下图) 11月9日, 来自塞尔维亚的化妆大神米里亚娜·米洛舍维奇又推出了新的创意化妆术。她巧妙利用人眼的错觉, 用人体涂料在身上进行彩绘, 将自己化成骷髅。



360 “借壳”与“壳”躁动

文 / 邢海洋

360 回归，江南嘉捷股东号称人均赚到 30 万元，一家私募居然押中了江南嘉捷这只壳公司，一举成名。并且，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被私募基金经理描述得活灵活现，大有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猜彩票”只是个体力活儿的意思。猜大牛股难道比买彩票还容易，如果是这样，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市场是否又会鸡飞狗跳？

看私募“猜谜”的过程真是环环相扣、推理缜密。360 从美国退市回来憋着回归 A 股、重演暴风科技的辉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证监会眼看中概股回归势头汹涌，大有令 A 股招架不住的势头，于是匆匆关上了大门。于是 360 只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可前面有着 800 家待上市公司，这个队要排到猴年马月？有心计的私募就开始猜想，以 360 的能力和能量，或许能找到买壳的办法。360 宣布华泰证券为自己的上市辅导券商，360 会不会是虚晃一枪，借着华泰证券寻找壳公司借壳？

于是推理开始，3000 多家沪深上市公司，华泰联合最熟悉的上市公司一定是华泰联合保荐 IPO 的，共 88 家。如果是借壳，创业板名声不好又体量不够不能借。于是在其他板块中，寻找小市值公司。一般选择壳公司都是市值在 20 亿~30 亿元之间，不会超 50 亿元。国有企业卖壳，过程审批很复杂，也难操作。过去经常卖壳、历史沿革复杂的也剔除。而上市不满三年，几乎不可能卖壳。层层筛选，只剩下了江南嘉

捷和乔治白两家上市公司。两家公司并不在一个地方，这家私募也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盯梢 360 老板周鸿祎，看他去哪个城市出差更频繁，于是锁定了江南嘉捷这只即将变身凤凰的乌鸦。

这样一本万利的“福尔摩斯式”断案既不违规，操作起来又不难，看来在大 A 股只要有有心计，有决心，再有恒心，抓住一只大牛股如探囊取物。不过很快有人站出来表示私募的推理漏洞百出，博眼球大于实质，很可能是为了流量而事后诸葛亮式的倒推，炮制出的推理不具有可重复性。比如，并没有任何历史统计数据，或者行业内默认的惯例表明，IPO 辅导券商就一定借壳的财务顾问；其次，借出壳的公司是担任财务顾问的券商曾经保荐过的公司这个思路也有问题，刚刚出现的案例，顺丰控股借壳鼎泰新材，鼎泰新材上市是国元证券做的，借壳的财务顾问是招商证券，巨人网络借壳世纪游轮，世纪游轮上市是光大证券做的，借壳的财务顾问是海通证券。

至于“排除法”能在 360 借壳中大展身手，或有幸运的成分。但即使是“押十中一”，在相对淡静的慢牛行情中岂不也能算得上是一笔好投资？于是乔治白这只只是因为跟踪高管的原因而被“淘汰”的三千中选二的潜在“幸运儿”迅速两涨停，股价创出半年来新高。而一两年前因为具有潜在的“壳”价值，这只股票一直拥有较高的估值，只是近来借壳事件少发，这一类壳资源股才沉寂下来。

自去年以来，监管层对于借壳重组的态度趋向严厉，规定借壳上市与 IPO 等同审查。证监会还出台措施，严控市场的“类借壳”行为，重点遏制“忽悠式”、“跟风式”和盲目跨界重组。在监管层持续从紧的监管压力下，壳资源概念的价值在此期间一度大幅贬值。以往 ST 股常被视为有可能被借壳的标的集中地，不时遭到市场爆炒，但 2016 年以来多数 ST 股表现惨淡，2017 年以来整体更是跌势显著。

可即便困难重重，仍有申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几大快递巨头“借壳”悉数登陆 A 股。如今，证监会明确表态“不支持”的海归板块开始松动，怎会不再度引来壳资源概念的躁动？

近一年来“乔治白”股价走势图

(单位：元)



5大优势 汇聚这一瓶

美赞臣 配方液态奶



美国
原装进口



最小销售规格是盒（不供拆零单瓶销售）

- 01 每一滴都是精配营养
- 02 美国俄亥俄州纯净的水源
- 03 真空负压，灭菌锁鲜
- 04 无添加防腐剂
- 05 加个奶嘴，即开即饮

京东

美赞臣配方液态奶





栏目插图 | 范薇

迷乱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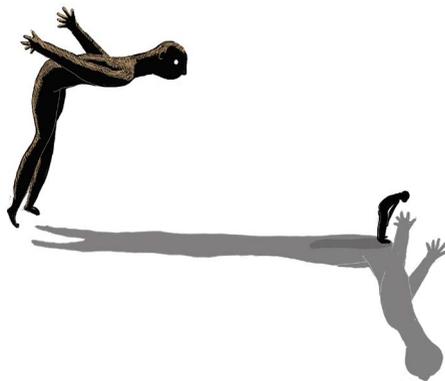
任志强又放暴涨论，他认为，错误的调控手段会让需求在一段时间以后集中爆发，所以下一轮会比这一轮涨得更高。他的依据是：2015年土地供应就是-33%，2016年，部分一线城市的土地连2015年的一半都不到，如北京2016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是800多亿元，而2015年是1960亿元。两年建设周期后，意味着明年供应极端紧缺。可是，11月3日，北京一宗位于远郊区的土地流拍。2017年，北京土地收入已经超过3000亿元。

“6进1”

发审委换届，画风陡转，11月7日6家首发上会企业5家被否。10月17日创业板发审委与主板发审委合并。“大发审委”履职以来，共有37家企业首发申请上会，21家成功过会，通过率仅为56.76%。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审委不再“唯利润论”，业绩多寡无关过会与否。上会项目持续赢利能力、内控管理水平和规范程度、财务和业务收入是否异常、募投项目合理性成为发审委关注重点。

影子银行拐点

穆迪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从2016年底的高点86.5%降至2017年6月30日的82.6%，影子银行活动停止增长。金融同业类投资者所持理财产品的比重下降，同时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也在下降，意味着监管举措取得一定成效。高风险工具的发行量下降，但核心影子银行活动（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继续增长。





H 股全流通

有媒体报道，H 股全流通试点将会启动。此前，只有 2005 年 10 月建行的内资股以特批的方式转成 H 股流通。目前内地有 226 家 H 股公司在港股主板上市，24 家在创业板，流通的基本是港交所筹资的股份。H 股全流通，对香港市场乃至中国的资本市场，类似于当年 A 股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同股同权，将大股东与散户利益捆绑起来。

高盛 A 股图谱

“原始股东”高盛清仓式减持了口子窖，套现约 50 亿元，净赚 10 倍以上，原始股成高盛的“摇钱树”。在高盛投资 A 股的 Pre-IPO 项目案例中，获利十几倍、几十倍都颇为平常，如其投资原料药企业海普瑞就获利数十倍。但海普瑞的“天价发行”本就有争议。此外，高盛投资西部矿业，获得 10% 的股份，一年后西部矿业就上市。但参照西部矿业走势，在高盛大赚的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则可谓伤痕累累。

对抗低波动率利器

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区间已经从原先的 300 美元左右飙升至接近 700 美元，作为市场波动性重要参考指标的标普 500 波动率指数 VIX，自去年年末以来持续低位运行。在波动率低迷犹如“一潭死水”的市场上，投资者已经从追求高收益转向追求高波动“赚快钱”，而虚拟货币目前市场体量小成交量大，可谓“正中下怀”。

民办学校高利润

9 月 1 日，新《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民办学校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此前，已有上市公司通过 VIE 实现资本化的方式，以服务费的形式实现股东分红，既享受了税收优惠，又实现了股东分红。在高毛利率、高其他业务收入、低销售费用率的共同作用下，民办高校的净利率高达 40% ~ 60%。海外上市的 K12 教育民办学校的净利润率也超过 30%。教育培训机构略低，在 10% ~ 20%。





零增长的逆袭

经济零增长听起来实在不令人兴奋，但根据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如果从民生稳定的角度来考量，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发表于《生态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早在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预测过增长总有停止的一天，但是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对增长的迷恋不仅对于地球资源来说不可持续，而且还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崩溃风险。根据计算机模型得出的预测结果显示，一个能够保持稳定零增长的经济体不仅不会像有些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还可能令工作者的工资收入平稳上升。

好消息



乐在其“中”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小组调查了36名年轻女性后发现，环肥燕瘦，都不容易快乐，保持身材适中的那些人，体内某种与感知幸福密切相关的神经类固醇浓度最高。这种神经类固醇能强化“快乐素”GABA与其受体结合时释放出信号的强度，从而放大愉悦情绪。



不止于数

不想让将来陪娃写作业成为一种折磨？那就从小多陪娃玩玩数学游戏。美国普渡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系日前发现，那些在家中经常与父母一起进行诸如查数、比大小、数字实物关联等游戏的学龄前儿童，不仅日后的数学学习技能更高，总体语言表达能力也要超出同龄人。

坏消息



路见危情谁出手

当遭遇呼吸和心跳骤停的紧急情况时，能否被及时施以心肺复苏术往往决定生死。然而，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小组公布于美国心脏协会科学大会上的调查结果，在公共场合中，男性患者获得路人以心肺复苏术相助的概率却是女性患者的1.23倍，生存率也因此高出23%。



谁动了你的钱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剁手党？根据发表于《市场营销学通讯》上的研究结果，现金支付从日常生活中的消失可能要负主要责任。针对496名德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使用现金购物时，人们更容易准确记住到底花了多少钱，而在使用信用卡或其他智能支付方式时却会变得漫不经心且易忘。

如果真动手打的话，定音鼓、打击乐的乐手力量会比较大一些。还有吹长号的，一看那个乐器，就知道乐手的力量会比较大，简直是音乐界的拳击手。如果是用声音来取胜的话，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对方的心理可能会被摧毁？比如像短笛、小提琴、双簧管等，但定音鼓依然有着最大杀伤力。

——朗朗回答“一整个交响乐团打群架谁会赢？”

这一时代庸俗化的伪节日是对真实对话和天赋的滑稽模仿；它也许煽动起了一种过度经济消费的浪潮，但它们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灭，一种只能被即将到来的一些新的诺言的幻灭所补偿的幻灭。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我们总是从负面角度讨论食物：这个不该吃，那个吃了会后悔，这个是邪恶危险的诱惑，那个不健康。这种做法的隐患比放纵自己饕餮任何“不好的食品”还要糟糕。我们在为食物而苦恼的同时，也把本应充满安慰和欢乐的时刻变成恐惧与焦虑的源泉。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教授阿隆·卡罗尔，《坏食物圣经：如何、为何要有罪地吃》

做出应受谴责行为的倾向就包含在艺术天才这一神话中——天才这一称号却很少延伸到女性头上。历史学家马丁·杰伊称之为美学托词：艺术为罪行开脱。

——《纽约时报》记者阿曼达·赫斯说，把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行为联系起来有助于更清晰地看待他们的作品

+/-
数字



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17
天

研究显示，如果一个人是在晚上被烧伤，平均需要28天伤口才能愈合，如果发生在白天的话，则只需要17天。这是因为成纤维皮肤细胞在白天反应迅速、修复能力比较强，而到了晚上它们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2 26 53
小时 分 秒

11月5日，2017年纽约马拉松落下帷幕。36岁的美国名将莎拉尼·弗拉纳甘以2小时26分53秒夺得女子冠军，成为自1977年以来的首位获得纽约马拉松冠军的美国女将。当日有大约250万纽约市民涌上街头观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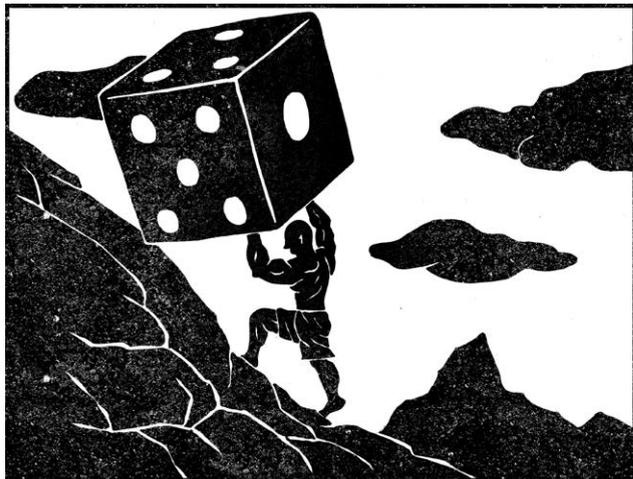
10
亿

“双11”天猫已卖出奶粉超5000吨，纸尿裤超10亿片，枸杞179吨。

概率的用途和误用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在美剧《少年谢尔顿》第三集里，谢尔顿跟家人一起听牧师布道。牧师说：“有人问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回答说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让我们持怀疑态度来看，最坏的情况也是对半开。我喜欢这个概率。”谢尔顿说，牧师的说法是错的，“混淆了可能性（possibility）和概率（probability），按照你的类比，我回家后，可能在床上发现100万美元，也可能没有。在哪个宇宙中这件事的可能性是对半开？上帝存在的概率是0，我相信科学”。

谢尔顿使用了归谬法反驳牧师。再比如，我们出门的话，要么会被车撞到，要么不会被车撞到，被车撞到的概率是对半开，概率如果真的这么高，可能没人敢出门了。我们还可以对那位牧师说，无神论者正确的可能性也是对半开。

谢尔顿说的可能性不同于概率，有外国网友在问答网站上说：任何事情的可能性都是1或0，即有或者没有；而具体到特定的条件下，这件事的发生可能性有多大，这叫概率。比如，丢一个骰子时，出现5的可能性是有（或1），出现8的可能性则是无（0），因为骰子上面最大的数是6。如果只丢一次的话，出现5的概率是六分之一。

概率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但清楚的数字往往压不过我们的本能。英国一位统计学家参与撰写的《一念之差》一书中说：“数字和概率呈现的是最后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风险对于所有人概括的比率……人生就是用故事建造的迷宫。同时

有两股力量产生：一种把大众推向确定，另一种则是把个体推向不确定。”人在幼儿时期死亡风险确实比较高，但只要撑到1岁以后，直到7岁，就到了他们人生中最安全的日子，可是我们陪几岁的孩子玩耍时总是怕他们冒险。现在在英国，1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交通意外的概率非常低，而且是所有年龄层中最低的，是成年人发生严重伤亡风险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每年有更多儿童被窗帘的绑绳勒死，但人们仍会细心地照常接送孩子上学，而对窗帘绳的潜在风险可能还不够警醒。

在英国，500万人中每天死于意外的人大约是50个，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专家把这个称为1个微死亡，相当于连抛20次硬币，全是人头朝上的概率。这是正常生活的基准点，然后就可以以它为基准，来判断其他事件的概率：在英国非紧急手术全身麻醉死亡的风险大概是十万分之一，等于10个微死亡，相当于骑大约110公里摩托车。再做一个对比：美国科普作家兰道尔·门罗计算过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这样死于意外的可能性远远小于找到知心伴侣的概率。

另一个有用的概率是：每天运动20分钟能减少19%的年死亡风险，相当于每天增加1小时平均寿命，赚40分钟，但运动的报酬会递减，每天锻炼增加到1小时，仅降低24%的风险，增加1.5小时的寿命，只赚了30分钟，所以人不能太懒，也别用力过度。☑

斗室清欢

文 / 中读用户 @ 梦小游

图 / 谢馥飞



如果是秋日的晴天，黄昏时楼道里会有蜜色的光芒，有时一出门竟有片刻恍惚，是一种小小的震撼。这种蜜色的光芒温柔宽厚，是不含惆怅的诗情，令人恬静而快活。这是筒子楼里最美的光线，可以过滤掉与筒子楼伴生的杂乱与喧嚣，暂时忘却各种令人烦闷的生活细节。

送女儿去南方求学后，我便和先生开启了筒子楼里二人世界的新生活。先生在北京上班，筒子楼里有一间宿舍。一直分隔两地，是周末夫妻。走过了大半生，才终于过上了朝朝暮暮的生活，所以，屋子虽小，能长相守，便是一生何求了。

彼时是初秋，正是一年当中好风日。每周末我们都去游赏北京的秋色，有时被漫天飘洒的落叶惊住，以为是风吹落的音符。半生之中，还从未有过这样身心自由的时刻。空巢的中年人，可以暂时忘却上有老下有小的紧张和疲惫，过一段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相对纯粹的生活。

有了女主人的屋子，宿舍就不仅仅是宿舍了。添了柜子桌子，多了杯盘碗碟，换了新床单和新门帘，拉了电线在楼道里开火做饭。斗室虽简陋，内心却丰厚。烟火气和书卷气使小日子过得层次分明，每一天都明净清晰。

春天，袭一身花香归来；夏天，带回几枝翠绿的莲蓬，等它风干成时光的纪念品；秋天，拾

几枝栎树掉落的红褐色荚果，插在淘回来的瓷杯子里；冬天，在积了一夜白雪的窗台上写下“初雪”，然后看它慢慢融化的样子。有季节感的生活，是走心的生活。平日居斗室而有清欢，一到周末，我们就去游赏园林坛庙博物馆。以这间小屋作为基点，我们把北京的古典神韵和四季景色都收入囊中。

余华曾经这样写过：“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居住在北京，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对于北京，只是一个逗留很久还没有离去的游客；北京对于我，是一座别人的城市。住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

因为是客居，所以一切反而显得轻盈。虽是陋室，却偏有世外桃源的安然。其实哪里有什么世外桃源，它只是对惯性生活的一种适当疏离，一种对沉重生活的暂时忘记。

屋里有一扇窗，一扇分成九格的极普通的玻璃窗。有时午睡醒来，望着窗外的天空，我会静静地发一会儿呆，纯发呆——天空是蓝色的海洋，飞机是游弋而过的白色大鱼，树是摇动的水草，我是宫殿里充满遐想的美人鱼……

在我喜欢的城市，有一间这样的陋室，有一个一直相爱的、陪我看风景的人，有一种简单而又丰美的生活方式，从秋到秋，这一年，是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俗世中的逍遥游。☑

睡眠的标准动作

文 / 爷是小白兔

图 / 谢驭飞



一个理想的、结束一天的动作，应该是这样的：鼠标移到屏幕右下角，点击设置，再点关机，让我这台用了4年的联想电脑，在一阵吭哧声中停止工作。同时，合上书，把书签插入当天阅读的最后一页，合上笔记本，咔哒咔哒，把两支中性笔的笔帽盖好。最好能都装进书包，省得第二天早上起来急急忙忙。至少，也要摆放有序，电脑在最下，笔记本叠着书在其上，两支笔放在书上。这是一种理想的秩序。但这种理想的秩序一定会导致失眠。

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啊？是有点，但也不是没道理。第一，如果我还有心思做这些整理，说明学得还不够累，还没有到需要睡眠的那个点，完美睡眠的那个点按照村上春树的描述，应该是一个野人用大棒在你脑后狠狠砸一下，然后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在一种忘记时空的混沌中醒来。野人要是看到书桌上井井有条，大概会被一种文明的巨大力量所折服，迟迟下不了棒子。第二，睡前还有这种想要维持秩序的意志，说明大脑还在运转。特别是，如果一步一步，动作简洁、迅速，说明意识还相当清晰，离睡眠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意识操控着十指，可以关掉电脑，合上书本，盖好笔帽，但按不了进入睡眠的按键，因为根本就没有。

如果你3点左右，从窗户缝飘进我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卧室，你看到（看不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电脑虽然合上了，但右下角那个红色的指示灯还在一闪一闪，书脊朝上，书摊开趴在电脑旁

边，我白天倾注于其中的怨念流了一桌子。笔记本虽然合上了，但没合严实，两支水性笔夹在其中，拱出一条缝，笔记中可以被理解的意义趁着夜色，顺着缝隙，一个一个逃离。第二天，笔记本里只剩下一些没有意义的符号，解读变得极其困难。我，或趴，或躺，反正在床上，右手拿着手机，手机线连着插头，插头牢牢插在插座上。一个光荣的战士，在他拉响导火索的前一秒，被一颗叫作睡眠的子弹击中了头部，与世短辞，好几个小时。在他旁边，是一片狼藉的战场，无人打扫，只有等第二天，闹钟帮他投胎转世后，才会急急忙忙迅速打扫战场，卷走一切不合秩序的存在，直到另一个夜晚的到来。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井井有条和酣睡，鱼和猪蹄不可得兼，哦，顺便说一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我决定从语言中屏蔽“熊掌”一词，请回到“哦”前面的那个逗号，插叙完毕。面上的秩序会带来睡不着觉的焦虑，一种无法掌控自我的烦躁，要解除这种焦虑，又要搞出一堆事情：什么喝牛奶、数羊、喝红酒、吃安眠药，结果无非是生活和身体的全面无序，一团糟。酣睡的前戏不是整理书桌，而是咒天怨地，你只要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一句：去他的，老子不看了。夜游神就会把这信息传达给你的老板或者上帝，于是野人被派出，一支大棒狠狠砸来，这才是现代人睡眠的标准动作。☑

旅行中的婴幼儿

文 / 孙欣

图 / 谢驭飞



带着四个月的宝宝从希思罗飞上海。婴儿车推到登机口，准备上飞机的时候才把宝宝抱出来，机组人员把婴儿车拿去托运。配偶把宝宝用婴儿背带挂在胸前，宝宝忽然视野大为开阔，东张西望，咯咯直笑。机舱里乘客挤挤挨挨，拖着箱子拎着外套，蜿蜒前行。坐下以后配偶对我说：女人看见他胸前挂着的婴儿，都露出一个上下八颗牙的笑容，“哦好可爱”；男人看见婴儿，表情则无一例外都是“天啦这飞机上有个婴儿！”。这样的描述有加强性别刻板印象的嫌疑，可是小范围样本总是屡屡符合经验。

带孩子旅行，同机乘客难免受到尖声哭闹的考验，父母的考验则从收拾行李时就开始了。婴幼儿按照现代规则科学而慈爱地养育，行头一大堆，没有哪样能精简下来。尿布湿巾卫生纸，奶瓶裹毯安抚物，不仅要带而且要带足。替换衣服至少两身，以防上吐下泻。大人也要准备衣服替换，以免事故后带着一身酸奶气息在机舱里熏着自己和别人。若有人空身一个抱着婴儿，什么都不带，马上就会被警惕性高的群众识别为人贩子拿下（而且群众往往是对的）。几个月的小婴儿还不懂得欣赏电子产品的好，不能用 iPad 或手机打发。他们醒着，必须靠父母娱乐；他们要睡，必须由父母哄睡。起飞和降落时由于咽鼓管压力不平衡引起的不适，他们只会用哭闹的方式表达。

要避免这种哭闹有两个方法：睡觉或喂奶，哪个方法能成功，全看机缘。

带婴儿飞过半个地球又转汽车转高铁，虽然既没有负重也没有跋涉，二十四小时后也已经精疲力尽。有点儿好奇过去的人是怎么带婴儿旅行的？安娜·卡列尼娜跟渥伦斯基去意大利逃避流言，有没有带着他们的小女儿？这一段情节记不清了。就算带着，也全靠英国女家庭教师和保姆，贵妇人只要想起来的时候偶然看看。安娜跟这个差点让她赔上性命和声誉的小女儿并不亲，虽然她才是爱情的结晶。她满心记挂并为之饱受折磨的是大儿子阿廖沙。

劳动妇女把婴儿绑在背上，天下去得。婴儿吃喝靠母亲的一对乳房，拉撒则随地解决。从什么时候开始，现代社会的父母们，一概要仰赖折叠式童车、纸尿布、湿巾、连体衣、无 BPA 的奶瓶、配方奶粉、安抚奶嘴……当然还有最强大的魔法武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逛百货公司的时候看见过一辆古典式童车，完全不能折叠，银光闪闪，简直有半部劳斯莱斯那么大。当时脱口而出：“这东西怎么上公共汽车，怎么上飞机！”

当然，我就是那个以为皇帝用金斧头劈柴的穷汉。☑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伯吉斯限量版书写工具

万宝龙全新艺术赞助人系列向17世纪罗马巴洛克艺术赞助人及收藏家、意大利红衣主教西皮欧内·伯吉斯（Scipione Borghese）致敬。限量版书写工具888的笔帽和笔锥采用墨绿色大理石材质，让人联想到伯吉斯美术馆的大理石地面，笔锥和笔帽环饰繁复的复古图案，灵感源自伯吉斯花瓶。



本地应用智能表

搭载了Android Wear 2.0系统的泰格豪雅 Connected Modular 45智能腕表中国版，更加支持本地应用，如用支付宝取代Android Pay，使用QR条形码付款；导航功能从Google地图换成“搜狗地图”；“Keep”取替Google Fit追踪健身活动；Google语音搜寻同样改为中国本地的“出门问问”。

绿叶屏风

墨尔本设计师Helen Konouris设计的三款屏风借鉴了树叶的纹路设计，随着藤蔓不断往上生长，最终还原出一片超大绿叶，让家里多些绿意。





洗蔬果的漏勺

DROP 漏勺的勺柄处设计了一个可以通向漏勺中央的进水口，放进蔬果后，将 DROP 旋转并合拢，这样蔬果就可以在 DROP 里边摇边洗了，解决了洗蔬果一个一个洗太费时费力，放在一起用水冲洗又怕洗不干净的困扰。



枕头背包

设计师 Maya Prokhorova 将背包设计成一个方块枕，当然里面没有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吹起充气的塑料囊，使用时吹入空气当缓冲垫缓解对背包内电子产品的冲击，同时吹满气也可以用来当枕头。如果在户外把塑料囊里填充热水，背包又变身为露营热水袋。



家庭安防机器人

设计师卡尔研发的安防监控机器人采用不倒翁的重心设计，独轮行进比起双轮结构更具灵活性。同时内部传感器可以监控周围环境是否有燃烧物或者气体泄漏。如果遇到以上紧急状态就立即启动视频直播将现场状况通过手机通知给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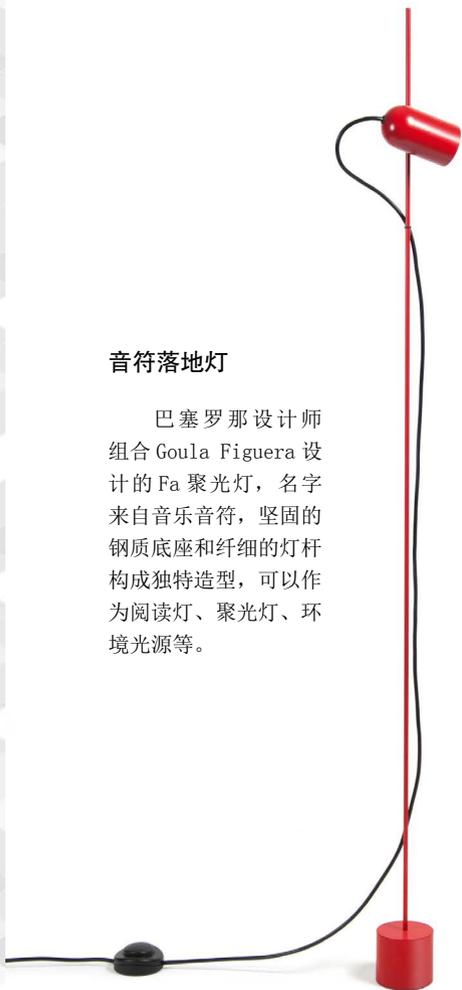
自行车导航

自行车导航 Beeline 连接手机导航软件后，可以用箭头来指导自行车的行进路线。其屏幕采用灰白显示的电子墨水屏，夜间骑行时有背光显示，屏幕有着超高对比度，在大多数照明条件下都容易看到。电子墨水屏不会分散注意力，消耗的电量可以忽略不计，从而使它有几个月的电池寿命。



音符落地灯

巴塞罗那设计师组合 Goula Figuera 设计的 Fa 聚光灯，名字来自音乐音符，坚固的钢质底座和纤细的灯杆构成独特造型，可以作为阅读灯、聚光灯、环境光源等。



非洲大象之泪

Backes & Strauss 为支持日本慈善组织“非洲大象之泪”特别制作的腕表，椭圆形黄金表盘上以金箔绘制出细致的树叶图案，其余部分镶嵌了品牌著名的理想切割钻石。



新的徽标

Fendi 品牌的 Kan I 系列背包以柔软平滑的小牛皮制作，中心处是金色金属的新款 Logo 徽标，与两个钯金色小徽标相互呼应，带来华丽的外观。





可折叠餐椅

Moooi 品牌 Shift 可折叠餐椅将柔软的针织面料套在带彩色涂层的金属框架上，充当椅子的靠背，椅面装有泡沫软垫，为多功能的折叠椅提供舒适的体验。

线性木桌

荷兰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海库帕设计的 Linear Wood 桌突出材料的特征，一层薄薄的单板挂在线性金属结构上，显示出有机曲线的美感。



金绿花瓶

L'Objet 品牌的 Fortuny Peruviano 花瓶意在表达一种超越时间的风格，绿色绒面革在黄铜瓶身上镶嵌出美丽的图案，花瓶的底部和瓶口还电镀了 24K 金。



水滴耳环

Celine 品牌的 Phoebe Philo 系列耳环用金色黄铜构成三个闪亮的圆球，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形成一种次第的韵律，圆球的表面反射出周围的风光。





小镇中国

自然、人性与新经济





描绘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斯的插图。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念

主笔 / 贾冬婷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莫干山住了几天。莫干山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从杭州湾来的南风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杭嘉湖平原进入其间，来自太湖方向的风也可沿山的斜坡飘然直上，使得那里时时皆有风，处处有凉意，19世纪末起传教士们就纷纷在此购地筑屋，莫干山逐渐成为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我去时已是深秋，游客不多，反而呈现出一幅日常生活的理想图景：早晨一推门，院子里铺上了厚厚一层红枫和金桂，在清冷的薄雾里，更衬出这幢民国别墅的萧索和厚重。从房子望出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沿着山坡往上走，可以深入自然，或者探寻其他老房子和一段段民国生活史。往下走则有更多人气和喧嚣，是这几年蓬勃生长的民宿，夹杂在村庄、稻田、茶园和市集之间。

生活在那里，自然而然会建立起人与人、人与大地的紧密联系。我住的房子里，负责打扫房间、烧饭做菜的阿姨已经住了十几年，见人就热情地扑上来的大狗“小白”也俨然是主人了。房东告诉我，女儿小学时的各种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她喜欢小动物，养过狗，养过翠鸟，养过小鸡，还养过刺猬，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在莫干山就可以。

莫干山其实是背靠景区的一个小镇。因为山上作为避暑胜地的历史悠久，也带动了山下镇子在解放前就形成了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产业基础，将周围村民聚拢在一起。但如今这些传统产

业都已衰败，村民们从种田改种毛竹，又改种茶，面临的技术压力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一轮的民宿热，则是莫干山传统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它距离杭州45公里、上海190公里的地理优势，与都市人日益扩大的回归乡村的需求的互相应和。镇中心废弃的蚕种厂旧址也被利用起来，成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物资集散的商业节点以及邻里关系的社区节点，有了传统中“集”的影子。

莫干山是一个特例吗？全国2万多个小镇，能否成为弥合目前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落差的缓冲地带？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是国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行“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政策的初衷。

从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城市开始，城市化一直意味着一种能量聚集，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消费功能高密度地凝聚在地域中心。在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正如19世纪末提出“田园城市”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后辈追随者所意识到的，这种城市化可以被整个区域范围内蔓延的城市化所补充或替代，而且有可能开创一个集合农村和城市优点的人居环境。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中心向边缘发展的趋势，即“逆城市化”现象。

尽管城市就像一个机器那样运转，长期以来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增长——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房地产开发，但是增长并非一条直线向上，而是随时间呈现增速缓慢—加速—再缓慢的“S”形曲线，而且不同阶段资源聚集的方向也不一致。以发达国家为观察样本，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工厂，整个西方世界依次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20世纪，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再加上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导致空间大幅度扩张、人口高密度聚集和异质的生活方式，城市逐渐开始了郊区化，并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多样性。欧洲的后工业化特征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形成众多的卫星城；美国则表现为分散的、无中心和网络化的城市群。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明显的“逆城市化”趋势，城市带和城市群范围越来越大，但大城市并没有明显增加和扩大，人口和资源开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从数量上来看，美国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城市总数的98.3%，而且一直在增加。

“逆城市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理性所致。如美国城市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大城市由于过度聚集已经变成了“恐龙城市”，可能会导致瘫痪，而小城镇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开放的土地等因素，具有产业优势。

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人性化和自然化日益扩大的需求也不容忽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显然更符合这种生活理想。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曾探讨了两种社会状态——大城市与小城镇——对人不同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大城市是一种法理社会，个人在集体社会中承担专门的角色，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需要做出不断有意识的反馈；而小城镇则是一种礼俗社会，其中的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中，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在对小镇的一种理想中，类似重新找回了儿童时期的认知地图：对孩子来说，随着离家距离的增加，信息密度迅速减少，认知向外扩散；而离家越近，则有越熟悉和舒适的体验。

理想小镇的原型，可以回到20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一是小规模、小尺度；二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功能和慢节奏生活；三是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田园式组团布局、便捷的交通网络、公平的社会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以至于后世的芒福德盛赞这一理论，“20世纪我们见到了人类社会

的两大成就：一是人类得以离开地面展翅翱翔于天空；一是当人们返回地面以后得以居住在最为美好的地方”。

在现实中，小镇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日常生活的主体。尤其是一些类型化的特色小镇，代表着特定的居住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发挥着产业集聚、高新技术集聚或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美国travel&leisure网站曾邀请读者在55类744个小城镇中投票，评选最喜爱的美国小镇。这些候选小镇的类别包括农贸市场、博物馆、冒险旅行和家庭旅馆等，最终桂冠被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小镇摘得，理由是其“诱人的乡村风情、啤酒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仅一项投票就可以把小镇分解到55个类别，可见小镇的特色对生活 and 生产的创造性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8%到2016年的57.35%，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典型的突变性和特殊性。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陈炎冰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2000年以来，表现为外部资本和经济介入的大面积城镇化，内部结构则表现为大城市急剧扩张、小城镇经济提升缓慢；大城市繁荣，小城镇衰落；大城市人口拥挤，小城镇人口稀疏；大城市增长强劲，小城镇发展乏力。最终，从小城镇底端到大城市高端，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全部呈现出与城镇体系结构相反的倒金字塔形，这也是导致我国“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力图扭转这一局面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让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又处在了一个“大城市主导”还是“小城镇优先”的十字路口。

小城镇战略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主张“内生型”的城镇化路径——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层层递进。但我们后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外生型”战略，资源都在向大城市集聚。现在回头发展小城镇，要与巨大的惯性相抗衡。更重要的是，与国外的各级城镇建制的平等不同，我国行政体制是层层管辖的，小镇是空间规模最小和行政级别最低的非农业聚集区，处在利益结构的末端。在重重障碍下，创新驱动的特色小镇期待成为一个撬动变革的支点。☑

（视觉中国供图）



小镇再发现：城镇化转向？

主笔 / 贾冬婷

在中国现实下，“城镇化”，其实是两条不同路径的交锋与融合——优先“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在城市化 30 年之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发现小镇：乡村工业化

1936 年，费孝通负伤休养期间，在姐姐费达声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小住。他无心插柳地调查了这个化名为“江村”的小村庄的方方面面，后来写成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而他初访江村的一个多月里还有另一个没来得及展开的发现，就是关于乡村上一层的集镇。

据费孝通回忆，他有一天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



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1000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他就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12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

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

他发现，震泽镇河中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都来自周边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

左图：江西婺源江岭风光

右图：黄山宏村景区内写生的绘画爱好者（摄于2011年）

细胞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

费孝通感觉到，像震泽镇这样，存在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级的社会实体，它们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他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

由于时间所限，费孝通当时只是在乡村遥望到了小城镇，没有将研究触角再延伸一级，由村到镇。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1981年，他才得以将这一水到渠成的课题进行下去。而那一时期，他的家乡吴江县的一些集镇刚刚露出一丝从衰落转向复兴的迹象。

历史上，江南一带“吴江七大镇”的说法远近皆知。震泽的航船交通、盛泽的万匹丝绸、松陵的行政中枢、同里的私宅园林……都曾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烟火繁盛、市井兴旺。但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些小城镇一度衰落。费孝通分析它们的衰落，有两个原因：从农村来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而从小城镇方面来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人口流失。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云南调查，看到宝山县小集镇破败的景象，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小城镇，这也是费孝通重启小城镇调查的契机。

费孝通调查了吴江县下辖的五个镇，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震泽镇是农副产品的一大集散中心；盛泽镇以丝绸业著称，形成专门化的丝织工业中心，也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小城镇；松陵镇是全县的政治中心；同里镇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平望镇是交通枢纽，这也让它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工业扩散点。

他特别关注小城镇在80年代初期复兴的动力问题。费孝通调查后认为，根植于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使得社队工业在此遍地开花。“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

他赞扬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



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费孝通所说的草根工业，就是后来被邓小平形容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顺着乡镇企业的燎原之势，费孝通从长江三角洲追踪到珠江三角洲，寻找“因地制宜，多样模式”。他发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企业，几乎都是原来挤在香港大楼里的“蜂窝厂家”转移过来的，港商把加工、制作、装配等工序放到了这里的众多乡镇里，而把订货、备料、核算、营销等业务留在香港，等于在香港开店，在内地办厂。相对于以社队工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这里是一种“前店后厂”的“珠江模式”。

乡村工业化也催生了城乡一体化的萌芽。费孝通认为，原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随着工业下乡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品需要广阔的市场，

(彭华士 / FOTOFEST)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954年，国营百货公司的流动批发组送货船运日用品到水乡震泽

右图：1988年9月，武汉街头的服装个体户在柜台内忙里偷闲吃午饭

从低级到高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国内到国外。于是，农业经济会纳入商品经济，农村的小细胞成为世界总体的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就是城乡对立的消亡，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形成。这也让费孝通看到未来中国走出一条“内生型”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

小城镇，大问题：“离土不离乡”

乡镇企业的星星之火比想象中更迅猛。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经超出一万亿元，与当年的国营企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从发展速度看，乡镇企业从千亿产值发展到万亿产值的时间，是从1984年到1991年，用了7年；而中国内地的千亿社会总产值增长到万亿社会总产值的时间，则是从1952年到1983年，用了31年。费孝通总结，中国历史长期延续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变迁。亿万农民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情况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

人的角色转换，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

在城镇繁荣的背后，费孝通更为关注的是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以丝绸古镇盛泽为例，在短短的四五年内，人口总量就突破了10万，几乎翻了一番。他用“离土不离乡”来形容那些白天进小城镇工作、晚上返回农村生活的乡镇企业职工。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城市化大多是在乡村居民举家嵌入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中国的城市化却从劳动力的只身进城起步，劳动大军定期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如同钟摆。

“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进城，在费孝通看来，是中国城市化阶段性的过渡现象。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蜕变中的青蛙”，身后还拖着一条尾巴。然而，正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城市化，表现出一种减轻代价、避免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农村中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不用都往大城市跑，就近在小城镇就业并



【视觉中国供图】

重庆市荣昌区万灵古镇（摄于2017年）

安居，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一些弊端，如人口涌向城市、农村衰退消失、产业化过剩等。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充当了“人口蓄水池”的截留和疏导作用。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费孝通在80年代初明确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认为小城镇应该在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城市化的道路，必须自上而下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得到了政策支持，从80年代初他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到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小城镇，大战略”，开始“严格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发展模式得以制度化。发展小城镇的一个表现是“撤乡建镇”，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小城镇数量从2000多个迅速增加到近20000个，增加了近10倍。

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认为，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道路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与自身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内生型”城镇化。城镇化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于城市扩大而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加，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或者外向型城镇化；另一种则是由本地的乡村中心演变为镇并逐步扩大成长为城市，称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或者内生型城镇化。社会学家们认为，内生型模式虽然在速度上比外向型缓慢，但它与社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强调各个地方社会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的自主性，因此这种城市化会更均衡、更稳妥。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

经济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外向型”道路。这种外向型经济是从引进外资、技术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从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萌发，到90年代，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小城镇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去的事物。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城市在空间上扩大了3倍，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已经由传统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化国家。

但在城市化率增长的背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也导致了结构性的不平衡。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江华分析，一方面是带来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2000年以来，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很快，大城市数量略有增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都有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外向型经济通常由国家与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区也因此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通常在首都或者省会，人口也随之向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是导致本土农民被城市化排斥。外向型经济是由政府与外来资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的城市扩张实际上伴随着本土农民的边缘化。农民不仅会失去土地，也无法进入和融入在其原有土地上新建的企业，保留的“城中村”也成为城市内社会问题集中的区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农民虽然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市民，但在实质上并未完成向市民的转变，更别说在中国还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问题。

某种意义上，如今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道路上。虽然30年之后的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基本的问题并未改变，仍然是“人的城市化”——农民进城问题。

“蜕变中的青蛙”：不彻底的城市化

2009年底，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弗农·亨德森(J. Vernon Henderson)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其实是滞后的：一方面，虽然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但自199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人口年增长率明显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能实现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显著地快于这些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中国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应该匹配的城市化水平。如果考虑到2008

年城乡之间存在高达3.3倍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对更大的统一劳动力和更多的城乡移民的需求就更加迫切。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滞后城市化”呢？弗农·亨德森认为，由于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中国一直维持着严格的城乡二元格局，户籍以及附加其上的各种公共服务越来越固化，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其他国家更困难。

即便是在城镇内部，其实还是一种“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告诉我，按照2016年的数据，我国城镇化率是57.35%，这是包括所有在城镇就业生活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而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来计算只有41.2%。两者之间16.15%的差额，是2.8亿农民工。这2.8亿农民工，再加上8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虽然在计算城镇化率时被统计进去，但他们在居住的城市里并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公共福利。而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滞后，固化了城乡社会群体的福利关系，使得放开户籍管理体制的难度加大了。很多学者认为，这部分人口只能算半城市化的人口。

在长久以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作用下，我国“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李铁告诉我，他这么多年从事小城镇研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认为城镇化是城市建设，是投资上项目，这是基于政绩、基于地方GDP增长的非常现实的认定。一些学者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他们所长久居住的城市应该向发达国家看齐，解决所谓的生态问题、宜居问题、低碳问题等等。而实际上城镇化很简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定是一个低素质、低端就业、低收入人口进入的过程，恰恰和现在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产生冲突。这些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和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得城镇化政策成了空中楼阁，无法在现实中操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自然而然的选择。新型城镇化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城市化”：2.8亿农民工和8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人口”，最终是融入城市还是回流到原居地？回到原居地的话，是回到农村还是附近的城镇？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江华指出，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增速明显放缓。尤其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在难以融入大城市而又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情况下，多半会选择留在原居地所在城



镇就业，或者将多年来个人或父母在城里打工的积蓄用于在城镇建房或买房，从而使得近年来城镇的发展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国家也重新注意到城镇化在拉动内需方面的潜力。但需要警惕的是，人口在城镇的集聚需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否则，这些人在城镇建房或买房后，很可能继续到大城市打工，城镇也很难真正留住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的原因。一字之差，又将焦点聚集到长期被忽略的小城镇上。如果能够将大城市无法吸纳的人口就近留在原居地的小城镇，让小城镇发挥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作用，无疑是最理想的方案。目前，全国有 2000 个县，20000 多个镇，每个县城增加 5 万人，就可以多容纳 1 亿人口；2 万多个镇，每个镇增加 2 万人，就可以再容纳 4 亿人口。

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城镇化转移出来的人口，按总量来说，主要应该容纳在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不是少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但小镇在中国又处在一个“倒金字塔”的城市行政体系——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市、镇——的末端。在这一体系下，较高级别的城市监督指导较低级别的城市，也享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更多公共财政资源、更容易得到交通方面的便利，而许多小城镇则没有足够的财力投资公共服务。因此，城镇化进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这一制度变革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

特色小镇：撬动城镇化的支点

2015 年以来，“特色小镇”成为一个炙手可热



左图：意大利奥尔塔小镇的一家临湖餐厅

右图：法国普罗旺斯的中世纪山顶小镇圣保罗·德旺斯

的词。2016年7月，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同年10月，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单，进入这份名单的127个小镇由三部委共同认定。此后的一系列细则显示，产业升级、金融创新、历史文化传承、扶贫攻坚等任务都被纳入到这轮特色小镇发展的内涵中。

“所谓特色小镇，实际上是指按照浙江的经验，在大城市周边或农村集聚区，以建制镇或城镇为基础，逐步形成的一种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的小镇。”李铁说。

李铁告诉我，特色小镇在全国的遍地开花，源于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到浙江的调研。他在后来的调研报告中总结了浙江特色小镇的发展经验，特别指出特色小镇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对当地实现现代化产业发展、高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能够按照浙江的方法在全国复制一批特色小镇。

浙江这些小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李铁说，首先在于以市场化的方式，将经营特色产业的行业和人才集聚到这个小镇，比如金融、互联网、专业

加工等。其次，这些小镇是远离大城市中心区的。再次，这些小镇没有过高的房租和管理成本，在低成本的过程中形成产业集聚。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后形成一定规模，这种特色产业将辐射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李铁告诉我，特色小镇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沿袭。从80年代起，我国浙江、江苏、广州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批特色小镇，例如温州柳市镇电器之都、浙江绍兴县柯桥镇纺织市场、台州市路桥区旧轮胎市场等，也是中国小城镇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节点。

而这一次特色小镇从幕后走向前台的背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一个是以此发展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比如出现了互联网小镇、基金小镇、梦想小镇、创意小镇等；另一个就是乡村价值的提升，带来城市人的新选择，同时也带来对健康产业、旅游等产业的需求。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认为，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展开和信息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和劳动力形成了全球性流动的增值效应，网络 and 智能技术为全球产业分工提供了新的竞争场域，



瑞士达沃斯小镇

使得各种经济要素可以不依赖传统区位空间而形成全球意义上的“特色文化中心”，这是特色小镇崛起的现实土壤。因此，从本质上说，特色小镇更像是一个新的地域生产力结构创新空间，创造特色小镇其实是创造可持续“文化动力”，而不以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和综合竞争力排名为主要标准。

以先行者浙江来看，特色小镇的萌芽也是基于破解空间地理瓶颈的现实。前浙江省省长李强曾说，浙江只有 10 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而且是“七山一水两分田”，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到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再到集聚区、科技城，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用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生产力的最优化布局。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小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希腊的圣多里尼小镇的经验，对浙江优化生产力布局颇有启迪。因此，浙江的特色小镇是在区域空间特色上，以原有的“块状经济”为基础，以产业集聚区为主体，形成的以非传统行政建制城镇为主体的综合创新空间。

特色小镇的优势在于差异化。比如，杭州的云栖小镇、梦想小镇都是信息经济特色小镇，但云栖小镇以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为特色，而梦想小镇主攻“互联网创业+风险投资”。差异化才能在有限的空间中进行优势产业资源的集聚。如云栖小镇的云计算产业，形成了产值高达 30 亿元的产业规模，同时集聚

了阿里云、富士康和英特尔等明星企业，其中由阿里云发起成立的由 45 家成员构成的中国首个云计算产业联盟，构成了特色小镇的核心产业价值生态。

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创新平台之一，特色小镇在中国刚刚起步。根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副教授张立对三部委评出的 127 个特色小镇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不同指标均反映出特色小镇在空间格局上的高度不均衡：从 GDP 产出来看，东部沿海、大都市周边地区小城镇明显占优；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中心城市周边镇的投资量较大，其他则较少；而民间投资来看，东部沿海中心城市周边仍较多，中西部则较少。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有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周边农村人口，最大值超过九成。但与此同时，许多特色小镇的主导产业尚不是很清晰，主导产业的平均就业贡献率只有 40%。

在轰轰烈烈建设特色小镇的热潮中，李铁提醒，不能偏离了产业引导的初衷。如果打着特色小镇的旗号，变成新一轮房地产开发，或者建产业园区，等于是将高成本的发展模式复制到小镇，最终还是会遇到危机。“微软、苹果都是在车库里成长起来的，松下在刚刚起步时也只是一个小作坊。如果一开始就在那里建了房地产驱动的特色小镇的话，他们还能在那儿做创业梦吗？”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小镇的中国之路

——专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主笔 / 贾冬婷



(黄宇摄)

李铁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就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目前的小城镇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反思和回归？

李铁：这几年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发展特色小镇，其实出发点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展实体经济最核心的是寻找成本较低的有利于要素积累的空间载体，这也是小城镇最突出的一个优势。

特色小镇也不是现在才有。80年代费孝通的一系列研究中都提出小城镇的问题，他当时去家乡苏南地区的几个小城镇做了调查。苏南地区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当时在全国最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小城镇的发展都特别迅速，这

五个省70%的经济总量都集中在县以下，主要是在乡镇一级。

那个时候全国小城镇发展得那么迅速，也是基于成本优势，而且最关键的不是经济成本，而是体制成本特别低。举例来说，因为上海本身管制得特别严，上海郊区在70年代形成的社队企业就逐渐蔓延到了浙江、江苏，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非常活跃的江浙乡镇经济。一开始还是分散的私营个体经济、集体经济、社队企业、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几个轮子一起转，转来转去就成了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那么快，要有集中的空间载体，村一级太分散，城市一级管制又太强，而镇一级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最末梢，于是乡镇企业逐渐集聚到小城镇，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在沿海地区迅速蔓延了，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

那时候我们在提到小城镇的时候，和现在小城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并没有考虑小城镇长什么样子，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大的街道，有没有广场、有没有绿化。提起小城镇，就是活跃的民营经济的空间载体，就离不开乡镇企业。

回头再看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浙江调查，他去了一系列小镇，袜子小镇、互联网小镇等，后来形成的调研报告的基本思路是，能不能再复制一种模式，再去发现低成本的、各种要素聚集的、活跃的民营经济，这种经济的能量是巨大的，吸引了大量的就业，而且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创新精神。

刘鹤为什么一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因为他也注意到，房地产过热的状况已经大大冲击甚至淹没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从省到市、到县，再到镇，全部都以发展房地产为主了。这种模式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收益，但它的破坏也是巨大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整个的创新机制给彻底摧毁掉了。企业开一个作坊，一个小工厂，一年的利润也就几十万，可是如果炒一个房子，就这么一投资，一贷款，一转手，就几十万了。形成财富不是通过苦心经营、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然后再去创新，最后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品牌。而是

通过炒房，那么我们的创新发展的动力就都被投机所取代了。实体经济要发展，要走技术革新这条路，要通过一点一点积累形成品牌，我们才可能在世界上形成竞争优势，而房地产是没有竞争力的。

我也曾去浙江、温州做了大量的调查，那里的作坊一年的利润多了几十万，少了十几万。但是在80年代，我们的乡镇企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它们经过了优胜劣汰才能成长为大企业。最近鲁冠球去世了，他的万向集团也是从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大企业都产生于此，比如微软、苹果，都是几个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大学在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空间或车库里，形成了后来的产业帝国雏形。可是我们现在呢？

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发展小城镇走了很长的路，但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走歪了。所有要重新反思“小城镇，大问题”，从当年费孝通的出发点来回顾，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80年代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内向型”道路，后来被“外向型”道路取代了？

李铁：这段历史我是见证者。80年代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90年代去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农村司，1998年又牵头成立了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小城镇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到了90年代末，十五届三中全会小城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80年代之前，因为粮食供给不足，我们没有给农村释放太多的活力，没有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一直到1984年迎来粮食大丰收，农产品的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才开始放松。乡镇一级管理成本低，土地成本低，就迎来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从乡镇企业开始的这条内向型道路是怎么发生转折的呢？一是1984年提出城市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也开始进行改革，从厂长负责制一直到最后的股份制，民营经济在城市开始扎根；二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国有资源向哪里去。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把全国城市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城市，一类是小城镇。后来最主要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土地供给，基本都向大城市倾斜了。

回头去看，小城镇后来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包括我们曾经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时曾提出的“搞活县域经济”也没有太大的奏效，主要原因是面临与大城市之间资源再分配的竞争。当时的财政体制还是统收统支，无论是乡镇还是村里创造的

财富，被税收拿走的那部分一定要进县以上财政的。那么小城镇怎么发展呢？主要是靠乡村两级企业的社队经济多余的一块，没有来自上一级的任何支持。

另一方面源自当时乡镇企业自身的粗放发展。一是在竞争压力下降低成本或者破坏环境，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管理层提出了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严厉批判，另外还有对乡镇企业假冒伪劣商品的大量报道，那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相对困难的时期；二是土地利用的粗放，企业盖个厂房来投资就行了，没有土地成本，因为可以带来大量就业，村里也可以通过出卖厂房获得一定的股份收益。农村滥用土地，而城市土地的管制依然严格，造成了城市和乡村发展的矛盾。

三联生活周刊：小城镇问题在国家政策层面是怎么推进的？

李铁：199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农村司第一次提出研究小城镇。我记得当时建设部、农业部、住建部，还有国家计委，很多部门都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思路。一大背景是，大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人口越来越多、农民工越来越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且90年代初我们最大的一个参照系就是拉美国家，那时候墨西哥、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发展得过大过快，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民窟和黑社会问题特别突出。我们决心要避免这些问题，于是提出“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就地转移，降低成本。

但是在实际决策中，“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并没有做到。因为生活在城市的决策者们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担心小城镇发展得过多过快，土地资源的滥占、环境治理的困难等。更关键的是在资源分配的优先级上，小城镇处在最末端。城市的发展更多依赖传统的国有企业经济改革，于是政府调配资源，为城市打造投资的空间环境。我们可以注意到90年代的城市工业园区，相较80年代的农村工业园区有了根本性的升级，当时最典型的的就是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专门划出一大片地，形成优良的管理模式、服务体系、环境空间，吸引一批中高端企业进驻，摒弃了过去的低成本模式。对投资者来说，有较低的进驻成本，农村来的劳动力，大幅度提升的管理水平，还有符合企业发展理念的环境，招商引资的力度跟村镇一级就有了根本区别。

到了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时，中央发现，

未来中国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人口的两栖状况，促进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带动农村的发展，重点就是怎么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农民往哪里转呢？当然是城市，于是1998年第一次提出“城镇化”。

之前我们一直都不敢提“城镇化”，城里人对农村人是严格排斥的。而一旦面对城镇化问题，就涉及农村人能不能进入城市，怎么进入城市。当时“农转非”还非常难，大城市落不下户口，就先从小城镇入手，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实际上1995年我们就开始推进户籍改革，到1998年三中全会变成了中央文件，将落户界限推进到县以下，后来又突破到了县级市，开始逐步放开对农村户口的办理。户籍改革的放开起到了很大作用，2001年一年就转移了1000多万农民工到中等城市周边的城镇落户，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大城市一直没有放开。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的“小城镇，大战略”是为了寻求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口？

李铁：对，当时“城镇化”才刚刚放开禁忌，户籍问题更是没人敢提。几千年来确保农产品供给问题似乎成为一种现实的担忧，已经形成的城乡福利上的二元差距，更是各级政府不愿意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借口。只有在小城镇寻找突破口，因为福利差距没那么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没有那么好，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接壤和联系，而且许多乡镇企业又在小城镇，在这里实现有关城镇化的一系列体制上的突破，引起的社会波动会比较小。

除了户籍问题，当时还要解决其他一系列改革问题。比如集体土地改革，集体土地能不能进入市场；还有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能不能向小城镇放权，不再把财政收入全交到上级。为什么90年代中期以后县城越来越好、小城镇越来越不行，就是因为各镇的钱全都上交了，拿去搞城市的面貌，自己剩下的只是零头。

但是到2000年后，又对小城镇砍了两刀。最重的一刀是工业园区，当时全国8000多个工业园区项目，只保留了2000多个县以上的工业园区，砍掉了6000多个县以下的工业园区，这就把绝大多数小城镇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给切断了。另一刀是税费改革，把农村一大批项目的税费全部取消了，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乡镇土地来源没有了，乡镇政府的财政来源

没有了，乡镇经济发展的活力也丧失了。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党的十八大重提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依然将小城镇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过渡？

李铁：我曾经和一些市长在一次访谈时谈到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所有的市长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农民工落户别到我们这里来，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提出小城镇，也是为了回避体制的矛盾，选择一个新的空间载体。但这是一种理想的设定，事实上，当产业不那么集中的时候，人也不那么集中。你看在城内就业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产业一类是工业，一类是服务业，遍布城市每个角落，他们要是走了大城市活不下去，这些人去偏远的小城镇也不行，没有就业机会。

所以现在要利用小城镇来缓解压力，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小城镇是哪里的的小城镇。比如说这次中央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但我们坚决反对把大城市的主城区和辖区放在一块儿，因为大城市辖区里还包含了很多小城镇，比如北京下面有100来个乡镇，这些大城市周边的镇其实是最有能力来承载产业和人口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推动“特色小镇”，是为新型城镇化寻求一个供给侧改革路径？

李铁：当我们把各种资源集中到城市之后，城市反而因为越来越高的成本压力，不能再吸纳。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小城镇问题。在作为特色小镇先行者的杭州，互联网小镇、袜子小镇，都是因为主城区成本太高，就到城区边缘低成本的地方去。镇一级普遍两类成本低：一是制度成本低，没有太多的管制；二是经济成本低，要素聚集从高处往低处流。这两类聚集到一起就能形成创新，形成规模，进一步带动空间转移。

现在特色小镇热了，人们希望用它来解决农民转移的问题、劳动聚集问题、产业要素的低成本问题、实体经济发展问题，但要防止随之而来的利益诱导把这一出发点淹没了。

一方面，特色小镇为房地产找到了一个新的由头。由于特大城市控制人口，控制土地出让，导致房价过高，在大中城市中房屋空置率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房地产过度扩张的形式已开始出现严重危机，房地产要升级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特色小镇的拿地成本远远低于大中城市，而且既有以特色为

名的创意空间，又有大量人口，必然为房地产商带来新的机遇。但一旦被房地产商介入，就会大大提高创业成本，特色小镇的特色就很难实现。另一个问题是产业园区模式的转移。过去的城市发展大概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模式：政府招商，低价供地，同时投入基础设施，吸引各类产业和产业园区的进入，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来弥补招商引资形成的亏损，然而现在这种模式在大中城市已经难以为继了。而眼下打着特色小镇旗号的小镇中，除了文化旅游、体育特色之外，很多正是产业园区的高成本模式简单地 toward 小镇转移。

三联生活周刊：和80年代相比，现在面对的小城镇问题有何不同？

李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激发新经济活力。小城镇如果发展起来，一是有利于土地的节约利用，因为土地利用最粗放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农村就那么一块地，会精打细算来使用；二是有利遏制无效占地，以前城市占地是低成本征用，现在如果农村集体来参与谈判，无限占用的可能性就会受到约束，一大块土地拆迁不可能再出现；三是有利于小的创新体制和实体经济在这里生长，这是比较成本问题；四是可以为国家获得新的税收资源，既然纳入了土地管理范畴，就会大大遏制地产商和政府从土地上获取利益的欲望。

其实80年代的小城镇也面临几个劣势。第一是起点太低；第二是管理水平太低；第三是没有环境约束、集约使用约束、生态约束等硬性约束条件；第四是村集体对村民的组织约束不是特别强。现在这些约束都有了，就取决于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思维模式的变化，比如怎么解决发展规模问题，发展空间问题，加强规划管理问题。首先要面对一种新的利益机制，过去说拆就一大片都拆了，现在得跟村集体谈判，而且村民的自我约束也在加强，有利于形成长期有效的发展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重启小城镇，政策层面给了更大权限吗？

李铁：现在正面临选择，分类放权。一是对于5万以上人口的886个特大镇，它们是新经济的最重要载体，给它们一定的活力，这些镇可以吸纳更多人口，发展更多产业；第二，对于都市圈的小城镇，也应该允许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就可以解决城市人口低价住房问题，然后把低端的产业迁过去，形成一种新的活跃空间；第三，我们的“逆大

城市化”现象也逐渐产生了，消费发生了变化，旅游人口大幅增加，有特色景观的小镇随之涌现，这一阶段特色小镇的含义也不一样了。

十九大习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句话实际上也非常清晰地表达了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在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上，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要如何放在大战略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下发展。要发展，但不能一刀切，要根据不同的区域进行不同的战略选择。当然更不能刮风，搞运动，而且不能再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谈论特色小镇，而是来培育实体经济聚集的载体，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特色小镇”在浙江兴起，浙江经验也适用于其他地域吗？

李铁：其实各地都有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而且其特色都有历史基因。比如浙江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是以个体民营经济为主体，而江苏省则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浙江之所以是民营经济为主，是因为浙江人有传统的经商经历和创业心理，习惯于立足于某一个项目、某一个产业，聚集在某一个空间。浙江发育最快的有200多个市场，比如台州的路桥镇，1994年我去的时候还叫破烂市场，各种废旧产品在那里销售，现在已经成路桥区了，发展成为专业化市场。而且浙商是外向型的，走南闯北带回大量的商业经验，这些经验在任何空间都可以加以利用。比如温州最有名的小城镇桥头镇，就在偏僻的大山里头，现在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纽扣市场。这和浙江的人文、地理、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西部也不是没有特色小镇，但西部的小镇又是另外的类型，最大特点就是旅游小镇比较多。比如贵州省今年的旅游投入特别快，去年“十一”贵州旅游人数已经超过了云南，就是因为贵州小城镇太多了，以旅游为主的生态小镇相继出现。这在过去30年是想不到的，少有游客去贵州。但是现在有深度旅游需求的时候，人们就会去找更自然的、更生态的地方。中国目前有13.7亿人口，城镇人口7.8亿，这其中有四五个亿的人会进行旅游消费，所以旅游小镇也是产业小镇，旅游经济也一样可以带来实体经济发展。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养一方产业，不能一概而论。✎

（实习记者李南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戏、梦、互联网：谈不尽的乌镇

记者 王丹阳 摄影 张雷



在乌镇的水上集市边，河鲜餐厅推出的露天座



如果说，乌镇的功成名就要比周庄晚了十年，这话一点也不为过。2003年，一部电视剧《似水年华》把乌镇东栅推到了全国观众面前，那时很多人的脑海里，知道周庄、同里，却不知有乌镇，那时东栅的面世也仅仅走过三个春秋，而周庄“万三蹄”的故事已红遍长三角。

但乌镇不愧是一匹强劲的黑马，甫一出生就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评专家阿兰·马兰诺斯的青睐，回去传播了“世界的古镇保护模式可以参考乌镇的做法”这一说。很快，“乌镇模式”就被乌镇人抢先“注册”下来。其实，当年马兰诺斯所赞许的“做法”主要是指“三线两管全埋”——当你在周庄看到扎作一堆的电线杆，在乌镇是看不到的。《似水年华》播出后，乌镇旅游步入快车道，2007年西栅开发成型，“乌镇模式”至今所孕育的内涵已远超那一眼舒服的外观——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世界的乌镇。

初入桃花源

1995年元月，阔别故乡五十载的木心悄悄潜回乌镇，去东栅财神湾看了看自己的祖宅。在他15岁前的记忆里，这是爷爷从隔壁孔家花园买来的一处边角料似的房产，而孔家就是茅盾之妻孔德沚的娘家，踏石板路走到财神湾另一端，就是茅盾的祖宅。映入老人家眼里的再不是雕栏画栋、朱门白墙，那是一幅颓败的后工业时代暮景，几个工人坐在他家的花园里旁若无人地扇着风箱。木心说：“在习惯的概念中，故乡就是最熟识的地方，而目前我只知道地名，对的，方言，没变，此外，一无是处……”

回到纽约后，他写道，永别了乌镇，我再也不回来了。几年后，台湾《中华时报》上登了一篇名为《乌镇》的散文，那时的他并不知他的故乡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36岁的南栅人、桐乡市市长助理陈向宏受命保护开发东栅，漫街灰霾的国营厂、自建房被正式推上手术台。陈向宏看到木心的《乌镇》



后，甫知东栅有这么一个家族，本着传统文脉之心，他辗转请老先生回来定居，并承诺把祖宅恢复旧容。

但乌镇模式绝不是恢复一两张文化名片那么单纯，它如同一个独自盘亘在田间地头的理想模型。如果从桐乡火车站去乌镇，得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经过一片平芜的城乡接合部，才能进入造满了干净簇新的粉墙黛瓦式民居的镇区，互联网大会赋予了大街上很多等待企业落户的众创空间或基地，一些城隍庙般雕栏画栋的房子镶满玻璃门窗，打着彩色灯带，“互联网医院”“金融咖啡”“酱鸭博物馆”兀自闪着，虽然在一个周一的午后街面冷清，却让人想起2015年12月习主席在这条子夜路勉励新入驻企业的场景……

《乌镇》里说：“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时隔22年，依然是这般路途周折，只是那车上不再是乌镇本地人，

而是塞了一车拖带行李的旅客，在这个平常的工作日，乌镇仍像一个吸引着四方来聚的乡间瑰宝，从不惧怕深闺人不知。一座恢宏的跨街牌坊上书乌镇历史街区，两幅题字各书“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魅力名镇”。景观大道上，穿着洋气礼宾制服的侍者逡巡观察着繁忙的大巴，路边游廊上的巨幅广告令人应接不暇，有木心美术馆里大英图书馆珍宝展的信息，也有“长城脚下的温泉小镇”，那是陈向宏在北京的最新手笔“古北水镇”，如今的他早已从政府公务员蜕变成风云一时的综合旅游开发大佬，这些上天入地的广告词无不昭示着乌镇今天的气象。

我的探访从西栅开始，礼宾司的侍者随时拖着行李车来往于景区口的人流里，直至行李被一个个旅行团拖进大巴，他们再去水路口，吞吐另外一批行李，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似夜夜笙歌、筵席永不散场的水乡。乌镇旅游股份公司品牌部经理许红



左图：乌镇东栅传统制酒工坊

右图：老街上受雇于旅游公司的卖鱼饵的商户

带我坐上游览车从南线的风雨长廊进入景区，一周前刚落幕的戏剧节上她一手操办了百家媒体的入驻，并严格控制着人数，“一家媒体我们只许一人注册，很多自媒体报名的我们都没放”。她来乌镇六年了，还记得当时的西栅有时冷落到如同空镇。现在的她一身黑色西装制服，这种装扮在景区里随处可见。

“我当时想这个地方我还是不留了，但那时公司跟我说，你等着吧，会发展的，我们将来还有戏剧节。”当时的公司已由中青旅控股，但操盘权仍在陈向宏和他周围一批20来人的乡镇同党手里，可以说在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等同于一个乡镇企业，但他知道要发展的话必须遵循两条，一是补充年轻大学生，二是广揽外地人才。许红从苏州跑到这里，当时总抱怨从西栅到东栅的乡路一到雨天就几乎不成样，乌镇镇区的颓败滞后是出了名的，有“一流景区、三流镇区”之说。

西栅北部通往宿舍的路上有一片桃花林，有一天她骑着车发现乡人正在砍树，“再一问师傅说这里要造一个大剧院”。当然，对于这个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姑娘来说，很难想象这个空如旷野的桐乡边缘地方，会天降一座足球场大小的剧院，这个景区想

要填充的文化盛事，对标着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直至今今年，她成为公司的骨干，见怪不怪地接待着戏剧节上的大牌明星，并客串了一个剧场的临时经理。“今年没有安排任何明星见面会，主要是想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戏剧节。”在戏剧节的那几天，在水巷桥堍上撞见明星应该不算惊喜，这从她平静的表情里可以见得。

一个穷镇的翻身梦

赖声川曾说：“乌镇A加上戏剧B，变成一个C。”乌镇就像一个阆苑仙境中的戏台，变幻着太多魔幻现实主义的水月镜花。哪怕是已经进入淡季，游客仍然如潮水般进来，不分昼夜。许红说，如今的东栅和西栅已经没有淡季和旺季之分，所以我能看见每座桥上，游客的闪光灯织成一片天网，应了那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这一切的背后，那个“隐形的巨人”陈向宏却极少露面，据说他甚至不会和戏剧节上的大牌明星公开往来，而是在幕后和组委会运筹明年的一届。“你采访不到他的，很多媒体都向我约他，我直接回

绝。”桐乡市委负责乌镇宣传的小魏这么对我说。据说，他最近在忙乌镇的濮院和北京的古北水镇两个项目，还有源源不断的景区开发“订单”向他砸来，包括观潮胜地海宁盐官镇。陈向宏离不开一条制胜法宝，就是坚决贯彻市场化路线，排除一切体制化干扰。虽然每一个从萧条走过来的江南水乡，其起步必少不了自上而下的保护和开发，但乌镇模式中逐渐催生出了一倒逼式的由商带政的关系，是其彻底而决绝的地方。这一切要从1998年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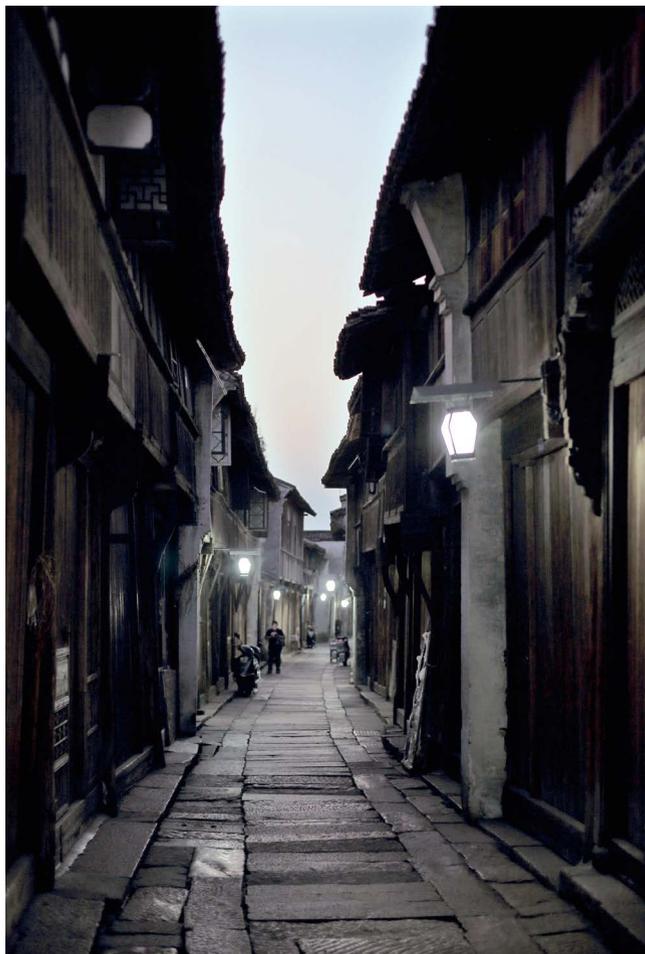
76岁的老人邵云在旅游公司的一间独立办公室里等我，他是陈向宏的顾问，西栅本地人，年轻时舞文弄墨，做过乌镇有线电视台新闻站长。他现在除了陈向宏之外的宣传乌镇的二号人物，虽然是个闲职，却代表着乌镇开发近20年来对于守住文化传统的一片匠心。镇上有个著名的植材小学，是茅

盾的母校，是桐乡唯一一个允许以社团注册的校友会。1998年，一群耄耋老人从海外回来团聚，席间提出一个观点：“乌镇能借着茅盾的名义开发旅游。”那时，除了东栅的茅盾故居是个收费景点，四下皆是乡下民房。

桐乡人皆知，乌镇当时是个穷得叮当响的镇，这跟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这里属“两省三府七县”之交，京杭大运河从北向西南劈去，乌镇犹如一颗夜明珠缀于东岸，河西是湖州，往北是苏州。这里本属杭嘉湖平原上的富庶圈，河网密布，1949年之前乌镇人从水路到桐庐要三个小时，由此带来弊端，那就是道路交通滞后，所以乌镇的穷在于工业的稀少。“公路交通落后，带来工业的滞后，一个镇只有七个国营单位，所以对镇子的原貌相对保存完好。”老邵说。

当年，以镇长周发荣为首的乌镇旅游公司成立了，老邵记得，他在镇委会议室里组织了一场笔试，镇上20来个从各国营单位自荐的职工答了一道《乌镇旅游开发之我见》的论述题，最终选了七人，成了最初的草台班子。起步资金是镇里拨下的40万元，几号人从东栅开始动工，面对的是满街飞沙莽莽的水泥路、倾圮的木构老房、无缝不钻的重污染型作坊等等，他们的思路未及旅游开发，就止于如何修缮上了。“这40万元，光一个转船湾和一个廊棚就修没了，因为那个转船湾曾拍过《杨乃武与小白菜》，就先修了。”但更大的问题是，镇一级的开发力量根本无法撼动当地牢固的“萝卜坑”。比如说，要拆迁就得劳驾市房管所，要动电线杆就得劳驾市电力局，老邵说，周庄要动的手脚没有乌镇大，所以也就在镇政府的主导下完成了。

大多水乡的开发靠的是“围堵售票”，但东栅的水系贯通发达，围堵谈不上，更何况那些老房子要大动干戈，连保护都谈不上就没钱了。这种情况下，1999年3月，乌镇来到关键当口，那年市政协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乌镇旅游开发委员会，由市长牵头，市长助理陈向宏被下派当差，所以至今，公司上下还是惯称他为“陈主任”。陈向宏顺理成章地兼并了之前的镇级旅游公司，新公司由市财政、交通、电力、土管等13个部门入股组成，各出100万元，筹得1300万元开始运作。市里来了钦差大臣，之前的问题一概解决，为了这背水一战的决心，陈向宏兼任了乌镇党委书记，可见当年市政府对此事的上心。当体制开始为一个景区的发展清障开道，乌镇由此得宠于一身。





左图：乌镇东栅老街

右图：西栅人邵云每天都在河边走一圈，如今他是宣传乌镇的二号人物

封闭式开发的必要性

东栅的开发不外乎重复了周边水乡古镇的老路，以收门票为主要收入，让居民自发经营。当年定了一个思路是恢复到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样子，种下了“三线两管全埋”的种子。“过去搬一个电线杆2万块，现在你电力局是股东了，根本不要钱。”老邵这样说道。这种转折有点魔幻，但它的成果更魔幻——中国人第一次看见一个没有电缆、电杆、水落管等现代市政管网的民国版乌镇，以至于西塘、同里的官员尾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来取经“乌镇模式”。陈向宏曾说，他要的是“新瓶装旧酒，而不是旧瓶装新酒”，这意味着一种实质内容上的“修旧如旧”。他们把全东栅的水泥路铺上了青石板，当过炼铁厂测绘工的陈向宏趴在地上用三角尺和铅笔画出了整个东栅的建筑恢复图。

“这是他第一次画建筑图纸”，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以至于他的乡人只能这么解释：作为北栅人，他熟稔江南古民居的传统走势，即使是内部，他也要求比如一条拱券的转角处须是祥云如意纹，而不是直角。但是，旧瓶也好，新瓶也罢，装旧酒时碰

到了问题。很快，里面的原住民开始“破墙开店”了，开起来的无非是些低档杂货铺或私人旅馆，漫天要价，一盘散沙。旅游公司当然无权干涉，叫来公安和消防管治，引起民愤，从此种下芥蒂。“我们景区一开门，他们也开门，旅游商品哗啦哗啦摆出来，今天管了他，明天起来街上的垃圾箱就扔到河里了。”老邵曾经猫捉老鼠般把摄像机架在河对岸，看是谁把大粪倒河里……

为了整饬，直到东栅里开出了200个摊位的下岗工人一条街，集中摆摊，矛盾才有所缓和。“可以说，东栅的弊端到现在都还在显现。”老邵说，将原住民作为原生风景的水乡开发模式几乎走到最后都会矛盾升级，混合式发展就有利益纠葛，除非不断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至2003年，东栅总投资的1亿元全部收回，年收入3000万元。陈向宏开始转向面积最大的西栅，但此刻他已经吸取了东栅的教训，他知道，要使一个古镇乌托邦——真正的理想类型成真，就必须掏空里面的居民，走纯资本化路线，做封闭式开发。

说白了，就是如火如荼的西方迪士尼、中国欢乐谷模式，只是当时的中国水乡，没有封闭式开发的先例，因为那需要足够的资金，还要有胆量。一个乡

左图：晚上9点半，西栅一家民宿餐厅正准备打烊，每晚10点，整个西栅景观照明全部关闭

右图：清晨的西栅景区，游客尚未入园之前，一切还是那么平静，甚至可以看到架着鸬鹚的渔船



镇党委书记、乡镇企业老板在借钱的时候照样碰壁，“天下能借的钱都借了个遍，这个项目像无底洞一样”。陈向宏拿东栅向银行抵押了3个亿，用这些钱在9个月时间里，通过货币安置、期房安置，将600多户人家悉数迁至西栅外。2007年，西栅建成开放，耗资10亿元，资金链绷到极致的时候，陈向宏不得不引入中青旅注资，将公司改造为股份制公司。谁也没想到后来乌镇成为中青旅市场化布局的光辉一笔，而陈向宏奇迹般地留任实际掌门人至今。

确实，在“画图纸”上他已更具经验，整日泡在工地，木梁、木柱必须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更换石质踏步，必须用与原来相同的石料，用鐮斧、剁斧加工；定升桥的一个转角推翻了几次，他不用水平仪，因为更喜欢自然的感觉……有人说，那儿75%的房子和景观是新盖的，老邵否认道：“应该说70%是修旧如旧。”在他看来，重建分三种形式：一种是无人的危房进行木结构加固；一种是自建的垫砖房做成“插花房”，当地人指原房基保留，重新加

裹和加高外立排板，把一层楼或做成两层楼，半新半旧；还有是那几个电镀厂、竹器厂、铁铺等等，自建的水泥或土坯车间全部拆除。

有一位乌镇的出租车司机跟我比画过西栅原来的样子：“如果西栅原来是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现在它有方向盘那么大。”当地人参照童年记忆里的原貌，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假”这个字。在他的印象里，我进入景区时走过的外围风雨长廊原是一片农田，而如果你走北线的水路搭乘“免费摆渡船”进入，他会告诉你，那个“元宝湖”原来就是田里的水塘。而所有游客，包括我，不会在乎这一点，因为这个大观园的奇幻度把你的注意力早吸引到远高于真与伪、旧与新的形而下层次。

西栅的拼图

陈向宏要打造一个脑海中的西栅，里边所有的商业形态由公司自己做主，12座小岛屿、72座古石



桥一路向西延伸，直至运河，栅内河汊纵横，入夜的景观灯带将它勾勒得灯火煌煌，如人间阆苑仙境，一切看来在一种暖色调里，统一如昨。没有人在乎有多少古桥是新造的，一对情侣走过，女人在一处几进的窄门前呼道：“哇，里面好大哦！”“是呀，就是清明上河图呀！”男人说。

用“清明上河图”来形容西栅不为过，它像是一出仿古的大型实景剧，每个商铺、馆子、客栈、戏院在里面演绎着各自的“人设”，游客一般不会注意内里的“玄机”，实际上里面所有的业态都是旅游公司精心谋布出来的。封闭式开发对旅游公司来说并不是进驻一批商户，然后统一监管，而是大多数商铺都直接自营，当你看到那些老字号糕团铺、中药房、南北货店等等像有了岁月风霜的匾额，错觉那是一家就开在原地的老字号——其实它是公司自营的，店家都是受雇的员工。这里70%的小吃摊为公司自有，少部分空间集中规划给外来商户。

陈向宏大手笔地在一张白纸上复原了他脑中

对民国西栅的构想，尽可能地将传统上存在过的文化元素填充进去，并雇人来维持日常经营。他坚持“一店一品”，即你不会发现第二家卖同类货品的商铺，整个景区就像是由不同功能片区组成的拼图，你能体验到太多丰富的民国元素，并不会被恶意抬价，因为所有的商品，哪怕是外来商户的价格单，公司都要审过。公司还监管着酒吧街上外来茶座的服务生的仪容仪表，有个细节是对客服务时不能玩手机。不守规矩的商户随时可能被请走，而只要在里面做生意，就是坐拥一个金银的天堂。

我来到老街上的钱氏竹器店，那本是栅外一户代代以竹器手艺维生的农家，1949年前，在他们村里有上百户竹器坊，如今只剩两三家。钱继准和父亲是2007年被请进西栅的，留好的铺面，象征性缴点租金，经营收入全归自己。说白了，旅游公司需要这些“非遗”传承人进来填充文化气息，而公司也是盘点了民国时这里的业态才一一相应地还原。钱家最初来景区的时候如同空摆设，青石板路上偶尔响起听得到回声的脚步声，老街上同样被邀来的布鞋店、剃头店的老板，常围聚一起叹气：“这个景区可能理念太先进了，吸引不了游客。”

钱继准当初从汽车维修转行，跟随父亲到景区来做生意，往年农村里为了照顾日常用途而生产匾、篮子，如今必须往工艺美术方面转型。契机是上海世博会，那时乌镇作为唯一的古镇开发样板专门有了一个古镇馆，之后它步入了黄金旅游发展阶段，此后，钱继准发现，北方口音的人增多了。我在他的店里待了一个小时，他坐在纺锤体的磨具前用竹丝编一个筒，一旁喧嚷的顾客使我们必须得大声交谈。跻身旅游业给他带来技术的升级，还有就是高端的客户。有一次，他父亲花三个月做的一个茶筴被乘兴而来的马未都收走了，卖了1万块。“如果继续在农村小作坊里，我们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生意。”言间充满着一种对旅游公司的感恩，他现在也成了同行中工艺改造的引领者。

晨会中的船工

所有的房子都灰扑扑的，一个区段的房屋从阶板、排门板到窗棂的颜色都是一致的，乍看一切都是旧物，分不出哪里是平地新盖的。我住的酒店“水市客舍”是一栋雕栏画栋的二楼楼大宽面的楼阁，是一种南宋临安古都酒肆的黯褐色。水市客舍前是



左图：乌镇木心美术馆，和古镇相比是另一种格调

右图：西栅有200来名船工，据说这是经过测算河道长度得出的合理值

个河湾，叫作水上集市，清晨凭栏眺望主河西市河，一个摇橹船荡过来，船工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飘来：“水上集市是我们西栅人以前喝早茶的地方，本来里面都是茶馆，河上都停着赶早市的货船……”

即使在这里当船工，都是一个正规的职业，西栅有200来名船工，据说这是经过河道的长度测算出的合理值。旅游公司上下3800人，三分之一分布在景区各个点位，直接对客，80%都是公司的员工。“船工的接受度可能比较差，我们要潜移默化地来，比如先教他们怎么接电话，以前当地人就一声‘喂——’，我们教他们要先说‘你好’。”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俞全明说。

3800人的管理，从最基本的人事标准化培训流程开始，陈向宏摸索出一条从中枢到神经末梢的全景式监管流程，他的团队就是个制定标准的大脑，往各个层面传导指令、监督执行、收到反馈。这个公司所覆盖的业务面相当于一个迪士尼，二级公司就有酒店管理、景区管理、景区配套、销售、经营五个，再层层分设部门。俞全明说得最多的是“应知应会”和“行为守则”，这是每个新员工进来时的

第一堂课。俞全明估算了一下，每年要补充千名员工，他底下的五名培训师进行分批培训，再把这些人放到各应聘的层级，由业务部门分级指导。

“先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然后再把培训一点点加上去，标准没有的话就会乱，包括每个服务细节，如果下一步的动作你已经提前了，那话就配不上了。我们公司说‘流程管事、服务管人’，这个景区内提倡一种管家式的服务，这是一些五星级酒店才有的。”俞全明说。他说的管家式服务的确是事无巨细，从最基层的船工服务中就散发着一种私享式的气息，这些船工每天早上9时有晨会制度，主要是盘点前一天的工作纸漏。

在景区最北部的总渡口前，36个穿着统一中式服装的船工在列队接受一名车船管理部督导的检验，深秋的水乡浸润在阳光里，晒久了眼前一片明晃晃，身上开始冒汗，那位女督导如同一名班主任，告诫在这般最高气温22摄氏度的天气里，他们该怎样穿衣。“昨天晚上发现有员工里面穿夏装，外面套羽绒服，这样看上去整个队伍非常不协调……夏装就不要穿出来了哦，我们统一一下穿秋装，白天热的话



就把里面的衣服脱掉……”末了，这名督导在队列里来回检查他们的手指甲，还要求把裤腿拎起来看袜子的颜色，那天，有那么几个船工穿的不是黑色的袜子，受到了批评。“如果这个细节都做不好，那么别的更难的细节就难抓了。”

在解散前，他们重新温习了一长串英语口语：“请上船，get on board；坐满了，it's full；小心台阶，watch your step；我的错，my fault……”整齐而响亮的晨读声随着河面上阳光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很多游客过来围观拍照。班长老姚摇着船带我渡了一圈，他谦逊而有礼，他们一天有四个班组在不同的时段发船，每人配有对讲机，接收着9个码头发来的调度指令，中途不能随意驳船，即使在码头候客也不能扎堆聊天。

这些舟楫遵循着规定的航程，不能私自偏离路线，甚至速度都有监测，它要以人步行的速率为准，每段航线25分钟，误差太大就会在晨会上被点名。游客少的时候就容易放松纪律，所以督导一再提醒不能聊天，老姚很知趣：“聊天的话声音太大，很不好看，所以我告诉他们不妨把英语单词抄成纸条，

候客的时候就自己背背单词嘛，12月份‘比武大会’的时候用得上……”但他承认学英语很困难，老是忘记。他老家离这儿有1.5公里，小时候在运河里划过大的货船到苏州、湖州，三年前刚来公司时根本不会划小客船，“技术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这要更复杂和精细”。现在，为了即将到来的“比武大会”，他正加紧巩固着“应知应会”和英语词组，还要会讲两个关于乌镇的历史故事。

作为一种点缀的“房东”

在东西约1.8公里长的老街上，两边错落的老宅争相竞发，有着各自的门面噱头。书院、邮局、水龙会、各种参拜庙阁等在现存遗址上重建的之外，还有精心巧布的一些展示和消费共融的老字号，无论是露天场上山谷垛般盖着斗笠的酱缸，还是染坊曝晒场上飘舞的蓝印花布，廊檐下元宵庙会般纸糊的花灯……这些都可观也可卖。你的一双眼无法在任何地方停留很久，这也许就是“一店一品”对游客一种潜在的视觉冲击，你说这是一个不用作拍戏的横店也差不多。



左图：高才荣的客栈二楼有五间临水房，十年前他应聘来西栅做房东时，本是个附近菜市场的菜农，现在的他谈吐逻辑清晰，举手投足没有丝毫土气

右图：枕水度假酒店副经理郑洪

同时，你很难辨认满街活色生香的铺子哪些是旅游公司的人上着班，哪些是付租金的外来老板——我想起景区外的乌镇人跟我说过，从外面开进去的小吃店，一个月百万经营额不是问题。

要进来开店并不容易，我看见太多枕水的水阁终日不上着锁，许红告诉我，那是还没有入驻的空铺子，“陈主任说宁缺毋滥，也不是什么店都能开进来”。陈向宏确实说过，随着客流的增大，他的担子越来越重，越来越不能唯利是图。客户体验度非常重要，他要做的不是一个休闲度假景区，而不是东栅式传统的旅游观光。有人说乌镇就是个大型旅游地产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毕竟是从存量文化上着手打造和修补而成的。许红说，每个业务部门得每周上报 20 条顾客意见，这些意见全都公开展示在 OA 系统里，等着

陈向宏批复，每条意见的处理方式和落实部门都显示在系统里，她觉得看顾客意见和部门各种反馈都挺有意思。

服务业的艰辛，公司员工高才荣深有体会，他就是公司 53 家民宿的“房东”之一。在老街上，那一个个客栈总被游客误解为是老板开的，实际上，他们只是“房东”，而且还必须是一对夫妻，受雇于公司来运营酒店线的一部分——民宿。要夫妻入驻是考虑到服务男女客人时的方便。民宿大多被规划在枕水的二层楼水阁里，是翻新过的老房子，当地人称“一间一楼”或“几间几楼”，指的是原住民在住宅格局上基本上下一间门厅，上面一间或几间卧房，房间以闸板相隔，隔墙有耳，不过以前都是同族。

民宿对于景区来说是一种“点缀”，所以即使一房难求，也控制不新增。高才荣的客栈下面有个门厅，摆两张餐桌，上面有五个房间，但游客住宿都是在总台预约分配的，老高并无财政权，但打理每个房间会有一点劳务费。总有些搞不清楚的游客觉得客栈开在里面一定是老板和景区分成的。“比如有些子女带老人来往，不会告诉老人家这里一晚上得近千元，第二天老偷偷来问我什么价格，我又不能欺骗，他知道了就不舒服了，挑你服务上的刺……”

对于房东来说，只有两张餐桌的生意是自己的，必须得夫妻档自己烧菜，若要雇人可以帮佣，但不能僭越——这样才是民宿。老高的两张桌子每顿饭得各翻四桌，忙得不可开交，想要多挣钱那就非饭点也得做，因为游客吃饭是说不准的。若哪天老家有事，得关门歇业，则必须向公司打报告，否则被认为是拒客坏了整体形象。在老高的嘴里，“集体”“应知应会”“休闲度假”等词出现得很频繁，每周开两次会不是假的，十年前他应聘来西栅做房东时，本是个附近菜市场的菜农，现在的他谈吐逻辑清晰，举手投足没有丝毫土气。他已经有了很多城里人的习惯，公司花了三年确立了后厨的一些规范，塑料袋换成保鲜盒，一开始怎么也纠正不过来。

油盐酱醋是统一配送的，食材可以各自买，但必须有正规批发商的小票，方便公司追踪。每个细节都有规章制度可循，20 多个民宿管理员每天逡巡在客栈间，有例行检查，据说，厨房煤气阀门不关也得扣行政分，年底的总分影响到是否能竞标到好的位置——老高在西栅换过两次区段，以前不枕水，生意稍差，直到这次换到老街正中心。不过，现在景区里的民宿基本不存在区段之分，服务总台上都

已订不到房。落日西下后，坐在老高的一张桌前喝菊花茶，茶是公司统一配送的，所以那几天我喝了好几趟菊花茶。身后幽蓝的水面发出沁人肌骨的寒气，这整个用闸板搭的木阁越到冬天越是寒冷，房间里的明清式雕花架子床跟我在酒店里用的都一样，我觉得在西栅流连就如同一个过家家般的梦，在不同的地方搬移同样的东西，体验却不同。

戏梦乌镇

网上对西栅的良好口碑里，有一个叫人惊叹的是，餐厅的番茄炒蛋都被规定至少放三个蛋，老高都记得这点，再比如油豆腐烧肉不能少于七块豆腐……民宿房东有一份公共菜单，菜式和价格都一样，游客能体验到的只是每家的口味不同，而老高还有10个私房菜，这是每家都必须有的。这些菜要拿去酒店管理公司的厨师线上做评估和价格指导，有价格上限，每一个季度必须换三个时令菜，为的是翻花样，不让游客腻味。在西栅的确是不腻味，变与不变、灵活和固定都那样恰当地调配好，如果说民宿是一种点缀，那么可以说西栅的大脑每天都在做点缀和搭配的事。公司里有个说法叫“流程管事，制度管人”，你看到的一切都围着这两样转。

按照枕水度假酒店副经理郑洪的说法，民宿是酒店部分的延伸，所不同的是服务主体变作了一对夫妻。从酒店管理板块来剖析，他把12个单体酒店和53家民宿看成一个个点，而背后有一套复杂和庞大的流程线，财务、质量把控、人力、前台、餐饮、厨房、配送等都是一条条拉得很长的线，他的工作就是点线结合的过程。他把酒店视作负责服务落地的后置的点，这跟以前他在别的酒店做垂直化管理时相当不一样。“我们处于中后期执行落地的角色，这是好几条业务线组成的业务监督检查的过程，体系比外面庞大得多。”他说。

酒店也按照不同的功能和档次来建造，枕水酒店就是第一届互联网大会开闭幕酒会的地方，马云和马化腾等人居住在此，是乌镇的网红酒店。该酒店有12个会场，年均承办600场会议，在这个东西贯穿四五百米，占地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酒店里，亭廊宛转、深不见底，它的梦跟外面的烟火巷坊的喧嚣的梦不同，是私密、独享和深静的。郑洪带领我从西头走到东头，两道连廊夹着内河，头上是统一涂成裸色的轩窗。传说中的总统套房是一个江南园林，一圈

八角形的楼阁飞檐连绵，围住一汪碧水，某角上安了个私家戏台。外界只是传闻它价格上万，其实门市价是5.8万元。“实际卖出去的也就两三晚。”郑洪笑笑，礼宾西装穿得极其挺括，这会儿他也在思忖一个月后的互联网大会，哪位元首被安排在此。

枕水酒店开业于2011年，从2014年开始，它的梦跟互联网大会紧紧连在一起，极尽高端和奢侈。整个乌镇因为互联网大会走向了国际，它既要造一个阿维尼翁戏剧节，又要造一个瑞士达沃斯一样的小镇。有意思的是，西栅这个“清明上河图”再现般的立体梦兀自伫立在空旷的乌镇，镇区虽然已经宛如一个新镇，但太多的众创空间等着企业来填补。中央促成了互联网大会永久在乌镇落户，陈向宏负责的是承接，而镇政府负责的买单和招商引资是贯穿今后的。

2014年，仅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三天就给乌镇





上图：花鼓戏艺人每日在东栅和西栅间走穴 下图：乌镇西栅书场的苏州评弹每晚高朋满座



带来了9亿元的收入，要知道在2014年全年，乌镇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该镇服务业完成的营业收入也不过28.5亿元。2015年上半年，乌镇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87.29万人次，同比增长25.28%，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5.39亿元，同比增长26.71%。陈向宏从2007年开始陆续辞去一串公职，甩掉管委会主任、镇党委书记、旅游局局长、市政府副主席的包袱，悉心做他的总裁，从此切断与体制缠绵的关系，杜绝了一切寻租的后患。现在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景区，在政府面前也毫不含糊。

某个华灯初上的晚上，市政府宣传科的小魏和我坐在水上集市边的一个甜品店里，他挂着一张从10月份就开始实行的临时出入证，代表他是互联网大会筹备组的一员。“这个旅游公司太牛了。”他说的“牛”就是指腰板直，公私分明。去年互联网大会时他带着嘉宾进入景区，“每天要给服务员签单，我说一起签可以吗？不行。”公私财务把控上的严谨让他作为市政府一员丝毫没有心理优势，反而就是一个买单人。平时更是不能免费进入景区，公务接待都得买优惠票进门。他实话告诉我，他平时尽量少和旅游公司打交道。在市政府的那头，是连续三年办大会的巨额投入和招商引资过程中远未收回的基础性投入。

不妨说，是景区的成功反过来拉动乌镇往互联网产业的大道上走，但是在景区这个乌托邦面前，镇区的清寒又是有目共睹的。晚上7点，我等待着水上戏台上的桐乡花鼓戏开场，桐乡花鼓剧团的四位耄耋老人来西栅唱了10年了，本是没有劳保的，现在有了份月薪的工作。桐乡话的念白发音扁塌又尖突，外人一定听不懂，但还是隔水驻足，谁都不愿错过这乌托邦的一景。一塘暗夜中的河水载着粼粼的灯光，跟随着杂沓的梆声荡漾起伏，晚上唱的是《卖婆记》，戏里完全是一个乡土的世界，也是旅游公司想要填充的世界。整个乌镇也像是一台戏，虽然这戏只是框住了一个乡镇的一小块，当地人称“乡脚”的微不足道的地方，但这已经足够了。☑



绘画·阿裡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样板诞生记：“烂尾”工业园到云栖小镇

主笔 / 杨璐 摄影 / 张雷

作为国家发改委“特色小镇”的推介样本，云栖小镇并不是行政上的乡镇，它同中国的云计算产业一样是从荒地里长出来的。它的形态也与相生相伴的云产业特点密切相关。

突破常规的小镇

即便是对互联网和云计算毫无兴趣的人，也很难没听过云栖大会的名字，至少也被马云登台与李建合唱《传奇》的花边刷屏过。开到第七年，这个关于前沿技术和未来畅想的科技大会，已经能吸引到6万人买票到现场来参加。云栖小镇也因为是大会的举办地而被人知晓。

但有点怪异的是，虽然名气很大，但中国的行政区划里却没有“云栖小镇”这个镇。如果好奇地



左图：云栖小镇是同云计算产业一同成长起来的新形态 右图：云栖会展中心体现的是云产业天大地大、自由生长的文化

去查地图，也没有任何一个代表乡镇驻地的图例标识在“云栖小镇”旁边。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阿里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说，很难界定云栖小镇的物理范围，园区里传统行业的企业就不算云栖小镇，而为了越来越多入驻的云计算和科技创新相关的企业正在扩张的面积又算是云栖小镇。按照国家发改委给“特色小镇”的界定，它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城镇，而是大城市内部或周边，在空间上相对独立发展，具有特色产业导向、景观、旅游和居住功能的项目集合体。

云栖小镇到底在哪里，难道像霍格沃茨学校一样需要幻影移形的到达吗？也没那么玄，最容易的方法是定位在云栖会展中心，这是一组实在的建筑，也是云栖小镇的地标。作为全国推广的样板小镇，显示当地工作人员能干事、效率高的例子也是云栖会展中心，它从招标到建成只用了100天，其中施工85天时间。另一件特别的事情是，它作为“浙江省送给云计算的礼物”，又有阿里集团的深度参与，最后选择的设计师却不来自于建筑大师，而是1981年出生，之前从未设计过会展中心的杭州建筑设计师马迪。

要想说清楚云栖小镇这个既不是行政城镇，又

不是工业产业园的新存在，倒是可以从云栖会展中心的从无到有讲起。

“2015年6月10日左右得到招标的消息，10月14日就开会。只有10天的时间准备和设计方案，这只能靠平时思考和工作经验基础上的直觉。”马迪说。马迪是一个讲起专业来就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的人，入行10年，正是到了建立自己理念和话语权的阶段，他拿出一个不同于传统会展中心风格的方案来。“每个地区都有一座政府投资的会展中心，它通常建得很隆重，有一种礼仪性质，但这种庄严和封闭的气质让老百姓难于亲近。我觉得这不符合互联网的精神，你没法想象穿着帽衫的年轻人在一个沉稳的会堂里开会，很违和。那既然要建设一个开互联网会议的会展中心，我觉得设计的关键词是平等、自由、开放。”马迪说。

要想平等、自由和开放，马迪的做法是消除建筑和小镇的边界，用柱子把会展中心往上抬，将一楼空间让出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活动场所，中庭还做了一面攀岩墙，人们可以在一楼散步跑圈，运动。二楼、三楼没有做围墙，而是用斜杆交织成镂空的效果，走廊又比普通的宽了一倍，消融掉内外的界限。在走廊上可以看风景，又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



王坚是“阿里云”的创始人，也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支持云产业的成长

“开会的时候，很多创业者就直接在这里展示产品和交流，原来这是一个枯燥的交通情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承载有趣故事的空间。”马迪说。

马迪抓住的关键词与王坚对云栖大会的想法不谋而合，它应该聚集起热爱这个行业，并富于创新精神的开发者。“说到办会肯定都会首先想到北京，因为人流集中，来开会的人多。我把会放在杭州，来开会的成本就高，如果会办不好是不会有人的。这就得逼着你把会给开好了。”王坚说。从2010年开始，这个开发者大会都是在杭州城里的宾馆举办，王坚始终感觉不太对。他说，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会怎么开是建筑和气氛决定的，“两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就非常合适，创新、创业大会在宾馆里开，脑子就被束缚住了。第二个问题是，希望会议的文化和精神可以有沉淀，但是宾馆和会议中心开完会就拆掉了，什么也留不下。

王坚把2013年的第四届大会搬到了杭州边缘偏僻的转塘科技经济园，阿里云开发者大会也改成了云栖大会，相对应的，云计算圈子里把转塘经济开发区叫作“云栖小镇”。“当时这里还种着青菜。看场地的同事回去说，这边最大的平地是个十字路口，活动计划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把电接到十字路口用来开会。我觉得不靠谱，自己来找，翻墙找到了一块菜地，位置就是现在阿里云办公楼这个园区的广场。”王坚说。在菜地里露天开会的条件很艰苦，2014年的大会，团队里很多人要求搬回城里的宾馆去，王坚不容讨论，继续在乡下菜地上讨论科技的未来。除了形式上突破了常规会议的做法，内容上也不一样。王坚说：“前面很多年大会第一个发言的都是我，开会都喜欢请名人，一开始名气能让会红起来，可越请到后来越没得请。另外，找领导致辞、名人站台的方法也不是我们大会的宗旨。我们这个会其实是表达开发者、创新创业前沿的人对未来的看法。”

这种天大地大、自由生长的气氛是王坚心目中对于云计算产业的理想和定位，也使得他从20多个设计方案中选择了马迪。“会展中心那些典型的特点，这个方案都没有，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王坚说。

从“烂尾产业园”到云计算基地

在同云计算发生联系之前，云栖小镇的前身转塘科技经济园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发展也不好的烂尾产业园。杭州云计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最早

这种天大地大、自由生长的气氛是王坚心目中对于云计算产业的理想和定位。

到这里买地开厂的企业之一，副总经理裴轶说，转塘这里山多，水也多，再除去道路，每块地的面积都很小，没有办法开大型工厂，就是中小型的工厂以后扩容也不行。“我们公司是因为手里有项目，买了18亩地就开始建厂。建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了面积小的问题。其他公司有些买了地没想好做什么项目、多大规模放在这样的面积上，就一直空着。那个时候，这边很荒凉，我们厂都被农田包围着。”裴轶说。

更让业主们觉得前途未卜的是，转塘科技经济园所在的之江板块是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旅游度假区，旁边的珊瑚沙水库是杭州城区供水的应急水源，在环境这么敏感的地方发展工业是不符合国家政策趋势的。“如果发展工业，这里的未来不好，大家都在寻找转型的机会。”裴轶说。她所在的公司去参加电商展会，还把IBM的高管请到这块地上想办法，但是菜地里一家盖了一半的工厂，很难在新经济中有逆转性的机会。

转塘科技经济园管委会也很明白走工业道路的前途黯淡。云栖小镇党委书记吕钢锋说，他2012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接触了很多云计算的资料。当时国内还是萌芽状态，但是国外已经在探索商业化了。他觉得中国早晚也会有这种技术，并且对整个商业社会带来变化。他不但毕业论文以云计算产业为题，还谋划着转塘科技经济园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转型。裴轶的公司也修改了建筑方案，把厂房改建成办公楼，挂牌云计算产业园，跟着管委会到处去招商。

2012年的云计算还不够成熟，在最考验运算能力的场景之一“双11”，只有20%的订单在云端实现。吕钢峰的管委会和裴轶的云计算产业园到全国各地的展会去宣讲，可几乎没结果，跟云计算相关的企业本来就不多，转塘的环境也不符合。“当时这边都是歪歪扭扭的乡村路，从城里到这儿连公交车都没有。也没有食堂、超市，只有我们为了自己吃饭办了一个小食堂。”裴轶说。如果把云计算对世界的影响比作发电对世界的影响，那么转塘科技经济园离

改变世界的圈子太远了。

转机却也是因为荒凉而到来，阿里云的一个机房在转塘经济园区落地了。“这种机房对耗电量的要求非常高，那每个区是有一定用电指标的。转塘这里又是工业园区，又是连个人影都没有，电量很富余。他们看中的那栋楼的业主也是把房子建起来不知道做什么，一直空着，就按照机房的要求进行了改造。”裴轶说。在2013年1月份机房的开业仪式上，王坚和吕钢峰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相信云计算产业的未来，于是想做些事情。“那时候也没想过做云栖小镇，也没想要影响什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阿里云创业创新基地，聚集几十家跟云计算产业相关的企业。”吕钢峰说。

当时的阿里云还刚刚起步，创始人王坚不但在互联网上受到群嘲，也被阿里内部的高管公开质疑，

甚至在马云写给王坚书的序言里都没有避讳曾经有激烈的冲突。“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了解的也并不比大家少。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计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里，王坚对机房启动那一天的印象很深刻：“那天特别冷，仪式还在露天进行，我冻得够呛。云计算也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只阿里云，整个行业都是这样。我那天还有点感触，也没经过深思熟虑，但也不能说是没认真想，我就说可能我们见证了一个历史。其实，我心里也不知道云计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看到那么多人为了这件事还真的搞在一起了。回头看真正变化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从大家看到的地方开始的。”王坚说。

云栖小镇不是一个龙头企业带动地区发展的故事，阿里云当时还不是什么，没办法成为招商引资的招牌。“行业里质疑得不得了，说是新瓶装旧酒的也有，说是100年以后的事情的也有，你要是说云计算能挣钱，那是骗人的。”王坚说。吕钢峰对此很有耐心，他是一个讲策略又想做事的干部。“做工作最后是体现在招商上，可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阿里当时对云计算投入很大，如果国内云计算能成功一家，阿里的概率是大的。”吕钢峰说。他没有按照招商引资的常规做法对王坚有所要求。他没有按照招商引资的常规做法对王坚有所要求，而是先把事情做了。

转塘科技经济园的开放态度和如白纸一张的荒地，让王坚觉得不但可以把阿里云开发者大会迁到这里来，迸发创新思路 and 沉淀云计算的文化，还可以把客户们引进来。阿里云的团队都是研发背景，刚上线的时候没有服务意识，还引起过网上的炮轰和吐槽，最后由王坚出差去道歉。云计算是一个新行业，客户的反馈很重要。王坚认为，是开发者和客户在教给团队如何做云端计算。“我有个私心，我自己到处跑可以见很多客户，员工没有这个机会。客户聚集在附近，员工们也能了解到他们最基本的需求。”王坚说。

跟云计算强相关的企业也欢迎这样的设计。政府采购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财政厅和阿里集团筹建、按照云计算的架构搭建的政府采购平台。副总裁洪秀慧说：“政府采购的现状是每一级财政部门都要建一个自己的采购体系，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各地系统重复建设且信息孤立，彼此数据不能打通，原本非常有价值的采购数据没办法用，无法对政府采购的





左图：吕钢锋带领迷茫的传统工业园找到了有未来的方向

右图：随着“阿里云”的成熟，一批“涉云”企业聚集到小镇，形成生态

效率和效益提供价值。各地供应商、评审专家的引进，大都是本地的，资源不丰富，造成信息垄断，就会出现质次价高的问题。2013年的时候，马云就想能不能用阿里的平台优势切入政府采购领域，让它规范化阳光化。”洪秀慧说。

政府采购有严格的程序，采购的商品跟阿里平台上现有的品类也不十分匹配，不能简单把政府采购体系接入阿里现有的购物平台，必须从头搭建。新时代的购物平台毫无意外的采用了云架构。洪秀慧曾经在阿里工作过6年，正经历了云计算成熟的过程。她说，“双11”虽然增长很快，但如果不改成云计算，早晚有一天挣的钱都用来扩充机房，因为随着订单增多给处理器带来巨大压力。政采云现在做政府采购市场，以后业务可能还要扩充到公务员群体，这也是个淘宝体量的大生意。云计算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很方便地把平台上某个单位的创新方式接入进来，让平台所有用户享受到这种先进方法。“就像维基百科，它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买了手机的无数人共同创作的。采用云计算的技术就相当于买了手机。”洪秀慧说。

政采云把总部搬到了阿里的同一个园区，两

栋楼之间步行只有一分钟。洪秀慧说，公司除了谙熟政府采购政策和程序的部分，另外很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平台搭建上，这种与技术强相关的事务，离阿里云近很省力。“我们跟阿里云频繁沟通是刚需，除了技术服务以外，甚至是经验的分享。比如说我们申请网络安全资质这些事宜，阿里云已经摸索过一遍了，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少走弯路，投入产出比高。”洪秀慧说。

“淘富成真”

王坚和吕钢峰的初衷是在转塘建立云计算的创业创新基地，就不能是把园区的空房子租给阿里云的客户那么简单。王坚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撮合了不同背景的公司组成云栖联盟，其中最早深度参与的是总部设在杭州的银杏谷资本。跟金融背景的投资公司不一样，银杏谷的背后是汪力成的华立集团等五家浙江省有名的实业企业，银杏谷资本总裁陈向明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都知道技术变革对未来一定产生很大影响，想用投资的方法摸索一条转型的路。“我们的初衷是拥抱变化，并不仅仅是投资

挣钱，所以当时虽然对阿里云的质疑挺多的。股东们还是想站在这一边。另外，当时亚马逊的云计算已经成定局了，从做实业的角度理解，这个东西早晚是要出来的。”陈向明说。

陈向明担任了云栖联盟的主席，第一次在云栖小镇开的云栖大会就是由银杏谷资本的投资经理做主持人。“那时候对这个开发者大会的关注很少，虽然也来了4000人，但跟现在是没法比的。我们不是简单地来投项目，完全是跳进来一起建设。因为从IT到DT的转变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这时候必须站到实践最前沿来。当时云计算的发展还不清晰，我们要做很多组织协调的工作，必要时还得让大家互相取暖。”陈向明说。

随着在云栖联盟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陈向明发现云计算行业同其他“风口型创业”不一样。“传统的投资会收到很多的项目，那是考验判断力。可接触云产业之后发现，它本身没有很多东西起来，不存在让你去判断项目的好坏，很多时候是去设计创业项目，同时你再给它钱，还要帮它找市场、应用场景、合作伙伴。”陈向明说。

从投资角度去看转塘的云计算创业创新基地和云栖联盟就会发现，招商和孵化器都不能满足这个新产业发展的需求，而是必须建立生态，在这个生态里的各种资源越丰富，越能碰撞出新项目。今年云栖大会上被反复提及的云徙科技，就是银杏谷资本撮合的创业公司。陈向明说，云徙的创始团队有用友软件的背景，它的优势是既有大型企业的资源，又非常了解它们信息化的需求，可它熟悉的是IT服务，不是DT服务。阿里云有云计算技术，可对企业不了解。“它们每个都差一点，我就游说用友的团队出来创业，介绍阿里云总裁胡晓明认识，让他们融到阿里云的生态里。”陈向明说。因为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是真需求，云徙科技成立才一年时间，就拿到了不少大客户。今年新零售的一个话题“茅台云商”就是云徙科技开发的。

参与云栖联盟的还有郭台铭，他跟吕钢峰、王坚一起讨论了云计算创业创新生态的结构，并派了一个制造专家团队常驻转塘科技经济园。富士康的代表林志聪说，在整个产业都在提创新创业的趋势下，富士康也要尝试在传统企业之外，对创新能做什么。跟阿里合作的初衷是想打造质量好价格又不贵的产品，从这个想法往下谈，我们锁定了智能硬件的方向。



1

跟普通的工业园和创业基地不同，转塘的云栖联盟创办了一个开放性的“淘富成真”活动。“淘”指的阿里背景，“富”就是富士康。当时王坚跟郭台铭讲，“富士康不能只帮苹果生产，也要帮小企业才能真正改变社会，大企业要成为小企业的创新平台”，二人一拍即合每个月固定会有云栖联盟的企业派出专家为创业者指导方案和提供帮助，比如银杏谷资本会给出融资建议或者投资、富士康的工程专家给出制造方案，淘宝发挥渠道作用、工业设计公司洛可可给出市场前景建议等。“刚创业的小公司很缺乏经验，我们跟云栖联盟的其他公司一起提供资源和机会，帮它们提高存活率。”林志聪说。

因为以支持和参与创新为目的，郭台铭给富士康团队确定的筛选标准是寻找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价格的破坏者。“如果这个方案是把市面上已有的产品改进得更便宜，那不是我们这个平台要支持的。我们希望看到创新、创意能增加这个新产品、新应用的价值。”林志聪说。除了每个月的点评，林志聪和同事们要把方案变成产品。“不同的方案需要的技术和设备不一样，这些设备分布在富士康四十几个工厂里，不可能全部搬到小镇来。我们要做的是给出优化方案，再看需要用到哪个工厂或者实验室，做资源对接。”林志聪说。



2



3

1. “哦耶科技”
创始人邓方涛

2. “硬功馆”创
始人林春青

3. “博拉科技”
利用云计算技术
做的机器人检测
系统

富士康已经给“淘富成真”里五六十个项目生产了脑洞大开的产品，但这些最后不一定能获得市场成功。林志聪说，智能硬件迭代很快，流行趋势也一波接一波。对富士康来讲，每个新东西的订单量都非常少，可从方案、打样开始的工序却一个都不能少。这挣不了什么钱，但创业者能获得制造专家的支持，而富士康也在创新潮里精进思路和工艺，既然创新会对制造业造成很多的挑战，这些方案刚好提供了新内容去研究。林志聪说，他们帮助生产的一款智能笔获得了创新奖项，淘宝众筹的成绩也很好。那支笔是针对纠正小朋友写字姿势的，姿势不正确笔芯就缩回去写不了。“创意家在小厂生产的样品，重量有21克，功能和信号也不稳定，笔芯该回去的时候不回去，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我们分析笔的功能原理，重新设计了一些架构，挑了不同的元器件材料，把重量减轻、稳定性提高。创业还是那个创意，但我们改进升级了。”林志聪说。

创业者

在新兴的云计算生态里，只攒出“创业导师”来还不够，连创业者和创业项目都要有意识去寻找。云栖联盟对自己生态的描述是科技蓝天，创新牧场

和产业黑土，这些“生态设施”需要对象。也许是大学老师出身有种济世情怀，也许是自己做阿里云的坎坷经历，王坚对创业的理解更宽容。他说，牧场和孵化器的区别是放养和圈养的区别。牧场只要提供蓝天和草地，其他跟你没关系，这种环境里真正的创新才能激发出来。黑土意味着不要眼睛只盯着成功者，要尊重失败者。黑土本质上是死掉的东西烂在这里嘛，时间久了就成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产业是创新创业的肥堆起来的。“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创业死掉了，这个人就毁掉了。这个气氛一定要改，只看光鲜的考核机制要变。”王坚说。

契合这个创业调调的项目有像硬功馆这样的项目，创始人林春青在华为工作了十几年，组建了华为在杭州的实验室。他从华为辞职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我在灵隐寺旁边的客栈已经开张了，但是有人劝我这么多年的硬件经验，还是继续在这个领域里做比较好”。林春青说。硬件领域需要各种材料、调试设备，还有放置这些设备、研发的空间，在美国有“车库文化”，中国绝大部分独立创业者没有这个条件。更多的情况是服务于一个企业或者创业团队，虽然核心创意属于开发者，但是荣耀和利润被其他辅助部门摊薄了。林春青说，他如果在硬件领

域继续做下去，是想探索一种模式让开发者只专心于自己的创新，却得到相匹配的回报。林春青对硬件创业的想法被人推荐给王坚，两个人聊了三个小时，最后被邀请来云栖小镇创业。“当时专门有人给他找个领域有想法、有意思的创客，约在咖啡馆里，一次见一拨人，每人15分钟。就是聊天，聊对自己领域的想法。我当时是那天见的最后一个人，又说到了一起去。”林春青说。

林春青探索的第一步是在阿里云的同一个园区做了公益性质的实验室硬功馆，24小时向硬件创客们开放。“仪器全都是朋友们赞助的，连开发板都有人捐。他们通知我留意一下快递，我开箱就是一堆物料或者开发板。知道你做了这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愿意拿出来给人分享。”林春青说。消息很快在硬件圈子里传开，不仅有杭州的创业者，甚至有人远道而来，无论是周末还是通宵在硬功馆里都能见到。大家坐在桌子前，专注自己的研发，不问出处，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氛围。

把云计算生态这个关键词设置好，招商也逐渐容易了些。哦耶科技是最早入住云计算产业园的创业公司，他们做的是专门针对中小型企业、运营商的智能硬件和软件系统，像可以收集数据和建立局域办公处理功能的路由器、把普通打印机改造成共享打印机的系统等。创始人邓方涛在摩托罗拉工作了很多年，最开始创业都是在家里完成，拿到订单之后，西湖区科委推荐他不妨在转塘落脚。“当时周围还都是草地，只有这个云计算产业园。我一开始租的孵化器里的办公桌，后来做得有点大了，就租了一个小间。这里虽然很偏远，但我的产品都是在网上销售，对交通没要求。它租金本来就比市内便宜，政府还连续三年给租金补贴。”邓方涛说。

除了租金上的优惠，对邓方涛来讲，另一个重要的扶持是得到富士康的帮助。“最早我是在小厂生产的，部分产品有质量问题。我是第一期淘富成真的学员，富士康给展品进行了诊断。后期在富士康的厂里生产之后，把质量提高到了一个好的等级。现在想找出一件有缺陷的产品，找到的都是好的。”邓方涛说。邓方涛卖得最好的一批路由器是10万台，对于富士康来讲是个微小的订单。“我可以服务中小公司和运营商，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大的路由器企业不愿意给做。如果是间普通的公司，富士康就更不能给生产了。因为淘富成真的项目里，我们的领域很匹配，对我来讲，我没有做出太大的投入，怎么

都不亏。心理没有落差，合作关系就稳定。”邓方涛说。

随着云计算技术在各种领域的应用，转塘园区的企业类型也丰富起来，除了互联网领域的创业企业，还入驻了深入传统制造行业寻找商机的公司。博拉科技是给工厂的生产线做自动化和智能改造的解决方案的公司，它其中的一个客户是福特汽车零件的生产线。COO曾盈华说，福特要求一切零件的生产数据可追溯，所以企业不用这种生产线，就接不到福特的订单。它的原理就是，每一个零件都有二维码，从生产到质检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每一道工序的状况和最后的检测都有详细记录。博拉科技要做的就是根据客户生产流程和工艺要求，设计机器人组合和软件系统。

把生产设备、各种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和操作系统严丝合缝的连接成流畅的生产线，背后需要复杂而迅速的计算，这些业务都于云计算息息相关。博拉科技的母公司虽然在市内，创业不久就把总部搬到了阿里云的附近，因为工业技术跟互联网技术相比发展速度要慢一些，在这里可以获取云计算最前沿的信息，互联网水平得到提高。曾盈华说，让公司看中的还有每年的云栖大会，作为入驻企业不但可以获得展位的优惠，还在宣传上搭便车，更重要的是获得同行交流和潜在客户。博拉科技今年展出的就是汽车零件生产的最后环节，缺陷检测。它是机械手和视觉识别密切配合，按照事先设定的标准检测缺陷，一旦不符合就会报警。因为数据都是程序设定的，这种检测比从前肉眼检测速度快、准确度高。这个检测站已经有企业感兴趣想进一步接洽了。

云栖小镇

把行业大会、资本、创业导师、涉云企业捏和在一起，还要有文化沉淀和价值观，创业创新基地的定位难于体现这么复杂的系统。作为运营方的管委会还有更实际的需求，吕钢峰说，传统工业园区的形态是企业关着门自己管自己就可以了，把围墙搭好，它在里面生产，产业工人就按部就班的标准化做出来就行，8小时内在生产线上，8小时外他的需求也比较简单。所以，工业园只要满足物理空间的要求就可以了。“大家头脑风暴云计算产业和从业人员的需求就不一样了。他需要开放的空间，有咖啡馆，有信息交流，要环境好，这些满足了才能留住企业、留住人才。那么，合适的形式就是小镇，

它能承载工作、生活、精神文化活动的功能。我们从云产业的人的需求出发去构建一个生态体系，这看起来是产业园到小镇名字的变化，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吕钢峰说。

从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来看，它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生态。首先有硬件服务商行业，它提供硬件给企业，然后装上云的操作系统，这是传统IT服务公司的领域。第二是云服务商，这个领域未来中国或者说全世界都不会太多，会形成垄断。第三部分又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行业，云的应用公司，就是用云技术为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提供技术方案。“我在这个产业里沉淀了四五年就是想把这些人聚起来，可以互相交流、有资源流动，这对产业的刺激会非常大。”吕钢峰说。要形成一种你来我往、共生共荣的圈子，也需要一种更柔和和丰富的形态。

云栖小镇就是从云计算产业的特点和需求出发，造出来的概念。把云栖小镇建好，工作其实很复杂。吕钢峰说，那就要把企业服务好，而不是管理好。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做起来不容易。“第一次在转塘开云栖大会，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开发者都半信半疑地怕是传销组织。我们是安排了车去接站的，他家人不许他坐，让他自己打车到会议现

场，如果情况不对还脱身。那么，这种要在菜地聚集4000人的事，作为地方政府也是顶着风险的。”吕钢峰说。还得有配套设施，现在只有两家咖啡馆，距离科技人才们熟悉的城市物质文化生活还遥远，吕钢峰说，转塘从前是个工业园区，向谋划的那种小镇去发展还需要时间。

王坚跟转塘发生联系的一个初衷是想沉淀云计算开发者的文化，现在有了小镇的概念，除了云栖大会的形态，他还做了一个“博悟馆”，邀请艺术家、美院的师生参加创作营，用人类计算能力、数据形态发展的历史为灵感创作作品、在这里展出。王坚说，博物馆大多是展示过去的东西，但我希望人们看完计算发展的历史，能够在对未来思考。我叫它“博悟馆”，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展示未来。

云栖小镇这个词，私底下叫了两年。王坚说：“我们圈子里不说转塘科技经济园，都叫云栖小镇。可这是没有政府辖区的，开玩笑的说法，这都是地下工作。省长来视察的时候，吕钢峰出主意，让我在省长面前叫云栖小镇，看看反应。”领导们觉得这种形态和想法都很新，想在浙江省推广，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云栖小镇”获得了认可，成为浙江特色小镇的发源地，又从浙江省走向了全国。✍

古典画风穿越现代美学的雅趣

王赫绘

生活历



【接受团购及广告定制，详情致电：010-846 81051】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德国柏林西南郊区斯蒂格里茨 - 策伦多夫的郊外，前来沐浴、游泳、晒太阳，享受闲暇时光的柏林人

一个外来人士的小镇生活指南

文 / 遛遛

有人说，小镇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方，只有在小镇里，人与人之间才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发生紧密复杂的联系，私人生活因此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京郊小镇的外来者，我从未真正在这样的小镇生活过。郊区与小镇居住者的想象是迥异的，一个望向城市，一个望向内部的小宇宙，这两种审视的方向，塑造了你所认识的小汤山镇。

镇上开了一家咖啡馆

最近镇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叫“和平咖啡馆”，就在镇中心广场的对面。对我所住的京郊小镇小汤山来说，这可是个新事物。五年前搬到这里来的时候，镇上还没有咖啡馆。最有名的食物是讲礼村的驴肉，咸味力压所有其他味道，非常质朴，但物美价廉，几十元管饱。或者是每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住的社区（一个略微别扭的舶来词）组织的秋日烧烤。在葫芦河畔摆开几米长的烤架，几百支羊肉串气势

磅礴地并排烤着，袅袅油烟消散在寥廓的小镇天空里。烧烤会上通常还有北方涮肉。大铜锅烧着煤炭，沸腾的汤里煮着小镇上餐厅送来的内蒙古肥羊。每次用小碗乘几片镶着脂肪花边的卷曲着的羊肉，浇一勺麻酱，我就意识到我已生活在北方干爽的秋日暖阳下。

不得不说，我是这个小镇的外来者。过去我在成都的市区长大，现在说是从成都迁徙到了北京，从西南地区跨越了胡焕庸线来到东部，转念一想，才发现原来是从二线城市的市区迁徙到了超一线城市的郊区小镇。我这样描述，好像就已经隐含着一些二元对立的等级观念：一线，二线；城区，郊区；城市，小镇。其实不是“好像”，简直是很露骨的。我试图渲染出一种德国人说起“温泉小镇巴登—巴登”那样富有历史感的田园牧歌色彩，帝王气息萦绕，远离尘嚣，隐匿而富裕，但“温泉小镇小汤山”还是现实主义地落在了等级体系的窠臼中。

现在镇上竟然开了洋气的咖啡馆，我将其视为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自我显形的“现象”。有一天下午出太阳了，我决定骑车去镇上喝杯咖啡。从地下室里推出山地自行车，骑上地下车库的斜坡，然后沿着小区茂密的树林骑行。梧桐、榆树、槐树、枫树和银杏的树冠都被染成了层层叠叠的金色，灿烂得辉煌；鬼爪槐依旧绿油油的向下耷拉着满身的枝条，只是绿色已褪去了春夏的润泽；柿子、山楂和海棠红晃晃的果实闪耀在树叶中间。快到大门的时候，有一潭碧绿的湖水，亭台掩映在疯长的芦苇中，枯黄色在阳光下从容地泛着苍凉的光。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小镇是与一岁一枯荣的草木相连的，但通常都有一个庭院和一幢普普通通的别墅，容纳安宁的童年和与世无争的老年。从我的这段描写里，你一定读出了小汤山镇上有一些满足这种想象的居住地。的确，这段骑行的路程里，除了一草一木，我所见的还有藏于它们中间的别墅，人为营造出一种北美生活的园林效果。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些居住地像封闭又彼此隔绝的孤岛一样，漂浮在小镇上，分离出一个个根据想象营造的世界和一个自然生长的现实世界。

骑了大概一公里，出大门，如果向右转，大概100米左右，就是北六环高速的入口。个别时段这个入口会有拥堵，私家车混合着货车，在这里淤积成一团。一过入口，转过一道两边树林茂密、风景如画的大弯，就可以飞驰在通向城市的高速路上了，车速通常在进入五环四环之后才会因拥堵而缓慢下

来。我曾在早晨5点半出发去东三环的亮马桥办事，一路畅通，20多分钟即达，罕见地体验了一次美国式郊区生活。周末，大量的私家车从这条高速公路上涌入郊区，我所在的小区里也冒出很多平时看不见的人家来。大多数人在城里的公寓度过工作日和学习日，周末和假期则来郊区别墅度假，耕种着各自的花园，晚上再开一场露天派对。

不过要去镇上新开的咖啡馆，此刻我应该向左转。这是一条通往小镇中心的两车道小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被车道压缩得很窄。这种修路的思维，反映出道路设计者已经默认我们是个“车轮上的国家”了——在几乎人人都有私家车的美国，小镇的道路分配才是这种比例；行走在那种小镇狭窄的人行道上，是很引人注意的行为，以至于常会有人停车下来问要不要搭车。小路一侧，是一片100多亩的苗圃。我搬到这里的时候，苗圃还没有围栏，柏树、白皮松、马尾松、大小叶黄杨无忧无虑的生长着，现在规规矩矩地被圈了起来。几年过去，那些小树苗已不知不觉长成了秀美的树。在小汤山打车，如果遇上本地司机，时常会听到些这片苗圃的传说，“那片苗圃里发现过好几次尸体，都是过了好久才发现的，案子基本没破”。这些未经核实的口口相传让那片苗圃在我意识中罩上了些不可告人的隐秘色彩，以至于有一次我发现一辆小黄车躺在苗圃深处的树林间，便不自觉地想象了一出小镇上的凶杀案——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描写的平静小镇的罪恶一样。

可惜我从未目睹过什么罪恶。在我眼皮子下发生的最能让我产生遐想的事件，就是小镇广场前那条修了又挖、挖了又修的路，造成交通不便的修路工地就那么横陈在镇中心一两年。镇上的人私下议论说，在这一修一挖之间，一笔笔工程款就落进了与镇领导沾亲带故的关系户工程队的腰包。这些都只是传言，没有任何证据。但就像所有小镇一样，传言是生活的重心之一，笼罩在现实之外，又与它若即若离。

骑过那片苗圃，再骑过一片新建的回迁房，再骑过小汤山小学，镇中心的咖啡馆就要到了。小学宽敞的操场上响着喇叭，老师正在组织孩子们排队放学。学校外面停着一排蹦蹦车，都是等着接孩子的老人。这所公立小学在北京市排不上什么名，就读又需要户籍，所以在这里读书的，基本都是镇上居民的孩子。在小汤山小镇不远的北七家镇和南邵镇，有一些学费较为昂贵的名牌私立学校，比如王

府学校、汇佳学校等。那些住在孤岛般漂浮在镇界内的别墅社区里的人，基本把孩子送进这些私立学校，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双重隔绝。这些地理位置落于小汤山镇地界内的“高档住宅区”，好像还没有什么机会和这个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小镇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紧密联系。城里人看中了这儿的温泉、果园、自然环境和休闲生活方式，但人们的迁入和房地产的开发却还未让小镇换上新颜。经过房价疯狂上涨的2016年，小镇的商业别墅动辄身价千万，小镇的时间却并没有因此加速，依旧悄然缓慢流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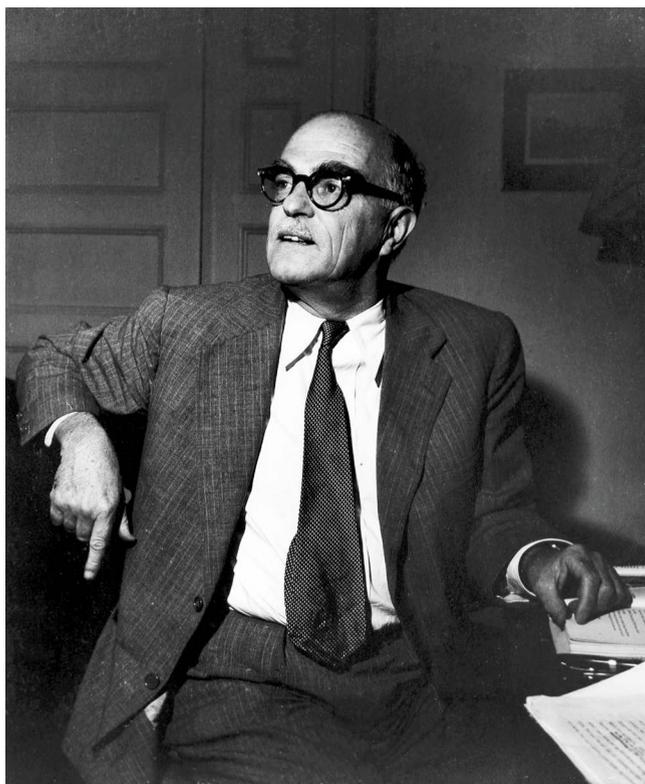
咖啡馆到了。它位于一个大约五年前开发的公寓楼盘的底商第二层，一层是一个卖白酒和各种进口红酒香槟的酒店，与咖啡馆相通。咖啡馆的室内装修有一种城乡接合部的杂糅风格：一方面，有洋气的吧台、圆桌卡座和单人沙发，大型咖啡机和西餐菜单；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行头又有一些笨重的味道，挤在一起就略显臃肿，空间也因为中规中矩地被四面墙壁围合起来，只剩一扇小窗，少了些城里咖啡厅通透的质感。我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

咖啡机机械化生产出的味道，与城里的咖啡馆相差无异，老板成功在奶泡上拉出了一片秀美的秋叶。我又要了一份黑椒牛排。老板好像是为了让我有一些心理准备，专程解释说，因为咖啡厅刚开，牛排的口味还没有经过调试，所以给我一个折扣价，还希望我多提提意见。

牛排很快端了上来。分量很足，都快溢出那块小小的铁板了。在行动略微局促的铁板上，我用轻薄的刀具切好牛肉，尝了一口，首当其冲的是嫩肉粉化学反应的踪迹，可惜在表层的润滑之下，肉的纹理却是粗糙杂乱的，那是老龄的印记。这似曾相识的口感，让我想起镇上三年前开的物美超市里价格亲民的澳洲牛排，不过婕妮璐这种洋气的购物点在小镇尚是不存在的。厨师这时从后厨走出来，像高级餐厅的厨师都会与食客聊盘中餐一样，询问我对牛排的感受。不过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大约50来岁的阿姨，系着围裙。我猜测，大概是她的职业轨迹突然间从中式煎饼转型到了西式烤肉，所以很迫切地想要向每一位有兴趣点牛排的顾客学习经验。我说了很多鼓励之辞。

这个时候，咖啡馆里已热闹了起来。一桌中年人围坐在咖啡馆中心的圆桌边，高声商讨着一个给孩子做私教的创业计划，混杂着天南海北不同口音的普通话。一位中年女性几乎是愤愤地说：“现在的孩子有教养的太少了，首先我要教他们基本的做人礼仪。”另一个显然更实际的中年男性兴奋地说：“还要带他们去游学，家长没时间，得有人陪着，游学一次收个几万元没问题。”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女性附和道：“那我们去找语文、数学、英语老师，按市场价付钱就行。”男人越说越昂扬：“我看一个人收20万简直是良心价，收三五十万也不为过。”“那就干吧！”不知是谁提议了一句。“干吧，我有信心！”其他人应和着。不知怎么的，和城里咖啡馆的互联网圈或电影圈的投资谈话一样，小镇的咖啡馆谈话也成功感染上了浮夸病。

小镇上的阳光还是暖的。我想起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布罗小镇上，也曾路过一个小咖啡馆，上面写着“*Our Town*”，大概是向剧作家桑顿·怀尔德致敬，没准儿他在那里写过《我们的小镇》。那天太阳也和今天一样好。只不过在巴掌大的彼得布罗小镇，阳光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显得光秃秃的，让人有身处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在桑顿·怀尔德的小镇里，有着几代人家庭谱系的幽灵深情注视着活着的人的生活，他们彼此熟悉。安宁的彼得布罗小



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他的剧作《我们的小镇》在美国开创了描写日常生活的戏剧新风格

镇上有一个藏书品位不高的小型图书馆，以侦探和惊悚小说为主。我曾在那里翻看镇上的唯一一张报纸，头版整版隆重介绍了镇上新开的一家餐厅。那是一个没有新闻事件发生的小镇，但日常生活的温情在世世代代相熟的小镇人中间缓慢累积。周末的晚上，唯一的一家小酒馆坐满了镇上的人，他们好像全都从家里涌出来，聚到这里聊家长里短。对了，这个巴掌大的小镇还有一个小小的电影院，就是半个世纪前在这儿短暂住过的张爱玲所描述的电影院，毫无变化。那也是一种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想要逃离的小镇，人人相互窥视着隐私与苦楚，被牢固的关系网罩住，死水微澜。或者，像理查德·耶茨的近郊中产阶级生活，安稳、富裕，却陈腐和了无生趣，一种无法超脱的庸俗。

但小汤山不是这样的小镇。它在以不易察觉的速度变迁着，标志性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陌生而疏远的关系。从咖啡馆出来，我在楼下的酒铺买了几瓶德国进口啤酒。由于已经过期了三五天，老板又给了我一个折扣价。走出酒铺，回头一瞥，这里的底商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街区，超市、药店、生活馆、美容馆，好像全都在一夜间冒了出来。这个小区的旁边，总装部的大型老干部社区刚刚竣工。街对面，餐厅云集的美食街不久前新开了一家重庆老火锅，老板是重庆人。我不确定是否应该把这里称作“我们的小镇”，实际上，我和他们互不相识。我的小镇并不是稳定秩序的象征，相反，它充满变数。

小镇所能容纳的宇宙

说实话，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小镇上，倒是一直认为自己住在北京近郊的昌平。当发现自己竟然在小镇上生活了快五年时，我就像发现了生活的新大陆一样兴奋。认为自己生活在近郊和认为自己生活在小镇，有什么精神世界的不同指向呢？生活在郊区的人，心始终是朝着城区的；郊区是城区裙边，是它的附属，它的边缘，围绕着它，与它连成一片。生活在小镇的人，则把小镇视为一个容纳生活的小宇宙，它可以与城市发生关联，但也向内生长，自成一体。

比如，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郊区的时候，我最大的白日梦，是有一天小汤山附近能有一个高速铁路站点。没错，是铁路站点，不是地铁或城铁站点，就像欧洲城市的区域铁路交通一样，能把人一站送到另一座城市的枢纽火车站，再去换乘地铁。柏林

西南郊有一个城市叫波茨坦，波茨坦的铁路是柏林铁路枢纽的一部分。从波茨坦坐区域火车(Regional Express)，可以直达柏林的重要枢纽车站，亚历山大广场、柏林中央车站、动物园车站、舍内费尔德机场、勃兰登堡，这些都是地铁或城铁的换乘站。虽然波茨坦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柏林的郊区，但柏林的面积和北京的海淀差不多大。这意味着，从波茨坦到柏林市中心的距离，大概和从昌平区南部与海淀区接壤的回龙观镇或阳坊镇到海淀区的颐和园差不多。昌平有几条地铁线，老牌的5号线，开通不久的8号线和即将开通的17号线，他们的站点都很密集，是按照城内交通的思路来设计的。但如果参照欧洲经验，其实足以按照城际交通的思路来规划了。对于我来说，从波茨坦到柏林，显得比从回龙观去颐和园还要便利不少。这种白日梦，是源于一种渴望更容易进城心理。城里的生活才是永恒的，郊区则是变动不居的，是暂时的，是一段生活的假期。

我就这样带着城市的视角审视自己居住的郊区。郊区周围广阔的田野，是填补城市生活缺憾的绝佳憧憬之所。春天的第一场雨到初夏，田野里生长出一茬又一茬的马齿苋、清明菜、蒲公英，这些野菜都是城市人的“土葷”，去那些田野里去挖野菜，满足了城市人对田园牧歌的向往。郊区也满足了城市人对大自然的想象：开春，黄色的迎春花和连翘第一批开放，然后是桃花、樱花和榆叶梅；第二波还没完，海棠、梨花和苹果花又开始了；夏天更是花团锦簇，棣棠花、喇叭花、睡莲、锦带花一齐开放，热闹得像赶集一样。冬天，这里的温泉是城里人涌入的休闲场所。这个时候的小汤山，如果登高远眺，一定能看到一股股的热蒸汽分散在小镇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像一条条白绸缎子往天上飘。这里离北京的群山也是近在咫尺的，去蟒山、凤凰岭、鹫峰或阳台山、松山、红螺山，是郊区生活的日常部分，周末睡个懒觉起来再前往也不迟。但我打算将这幅郊区风景画无时无刻地一辈子欣赏下去吗？似乎它还只是城市生活的调剂，是工作之余的闲暇。我会在这番对大自然的欣赏之后想，等孩子上高中的时候，注定还是要搬回城里的。

然而，一旦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小镇的时候，白日梦的内容就发生了改变。我第一次想散步去镇上转转，想沿着小镇的地界骑行一圈，以对小镇的空间了如指掌，想去小镇的咖啡馆尝尝还不够成熟的西餐新菜单。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梦

想我的小镇也能像彼得布罗小镇一样，有一个小图书馆，哪怕品位乡土，也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安静写作的靠窗的位置；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不必放最新的影片，定期上映一些老片就好，结束后还可以组织一场镇上居民的主题讨论；最好再有一个剧院，除了邀请不必太著名的剧团来演出，还可以组织小镇的居民每年自导自演一场戏，自己请导演，自己做道具和戏服，演给小镇居民看，自娱自乐就好；要是不嫌我欲望太多，我觉得要再有一个小音乐厅，有一份《小汤山日报》，那就真是太棒了，还要有一个体育馆——2016年，我就是去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小镇的体育馆里与三万人一起观摩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演讲的。这些欲望的根源，都来自一种“我们的小镇”的社区梦想，小镇就是生活的完整小宇宙，自我管辖的家园，心安于此，不再依附和守望城区。

也许拼凑成白日梦的马赛克，都来自记忆碎片的黏土。十几年前，我曾在哥本哈根郊区的小镇法翁（Farum）住过半年。那是一个哥本哈根大学的交换项目，学校给我安排的寄宿家庭在离市区约20公里的郊区小镇上。从哥本哈根市中心乘地铁，往东北方向坐，到最后一站法翁下车，还要步行大约20多分钟，才能到他们的家。这个家庭的房子是半分离式的联排别墅，和其他联排别墅组成了一个小镇中产阶级社区。可能因为哥本哈根的纬度很高，秋冬季节的黑夜总是来得很早，日照时间短，这些别墅的客厅都有巨大的落地窗，在里面活动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透明玻璃房里的植物，任由社区里的其他人观看。周末，社区的人常会组织在公共活动室聚餐，各自带来一份食物，分享每周的新见闻，无非是谁又旅行回来了，谁家又来了客人，谁最近换了工作，结婚离婚之类的家长里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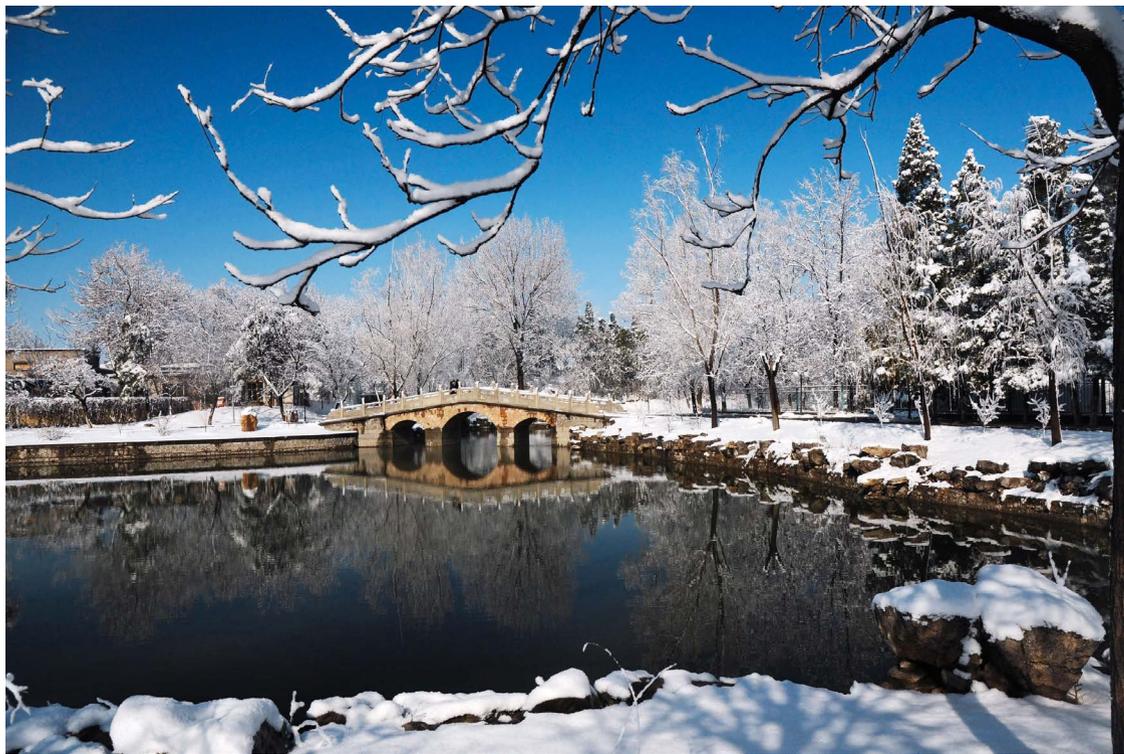
我住的这家人，女主人离婚了，和上初中的女儿住在一起。虽然生活在小镇上，她们的生活节奏却很紧凑。每天上班上学回来，女儿就骑车赶去镇上的舞蹈学校学跳舞，妈妈则匆匆赶往镇上的剧院排练小镇的年度话剧，通常都很晚才回来，生活很丰富。小镇上有一个购物中心，除了超市大卖场，还集中了镇上居民开的各种小店。我第一次骑车去，从一个斜坡骑下去，购物中心的自动玻璃门就打开了。丹麦的自行车都是脚刹，往后踩踏板就是踩刹车，我却到处找不到手刹。眼看着玻璃门里都是蜿蜒的小道，只好一头撞向了玻璃门旁边的墙，否则就该在购物中心里秀车技了。

法翁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很多个5点刚过天已黑尽的下午，我从地铁站下车，沿着随缓坡起伏的镇上的小路，穿过一个个宁静的小镇社区，路边一幢幢小房子透明的客厅里总是映照着暖黄色的灯光和点缀气氛的烛光，像置身于童话世界。我常常独自一人走在小镇的旷野，却从未感到过不安，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这个古老的小镇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铁路将它与歌本哈根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城际地铁线将它变成了哥本哈根的郊区通勤小镇。

我还曾在柏林西南郊一个叫拉特湖（Schalachtensee）的地方住过一年，离万湖（Wansee）很近。万湖就是纳粹德国召开“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会议的地方，听起来与大屠杀相连，有点恐怖的意味，实际上是个风景秀美的富人别墅区，万湖上还常年停泊着私人游艇。拉特湖和万湖，都属于柏林的斯蒂格里茨—策伦多夫（Steglitz-Zehlendorf）区，可以叫作镇或大城市里的自治行政区。从柏林市中心乘地铁3号线到西南部郊区的终点站Krumme Lanke，下车后步行20分钟，就是我的住所。沿路都是碎石小路，路旁是数不尽的一幢幢小别墅和精心打理的深深花园，有一些石头建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这些别墅楼里，有住宅，也有律所办公室、芭蕾舞学校和私人牙医诊所。小型超市是相当密集的，我住的学生公寓对面，就有两家超市，亲民平价超市旁就是一家较贵的有机食品超市。万湖和拉特湖的地铁站旁，还有相当多的小酒馆、咖啡馆和餐厅。每到周末，城里的人就提着盛满香肠、面包和啤酒的篮子，乘地铁涌向万湖，在那里郊游和野餐。

过去作为学生，我从未有意留心过小镇的学校和医院。小镇于我，仍然是远离尘嚣的逃避之所。某种意义上，我感到现在的新概念“特色小镇”也是以城市为中心来审视小镇的，它有一种弥补城市不足的意味，因而强化了某种单一功能——养老，温泉或度假，却未把它视为自我管辖、自给自足的完整生命体来对待。毕竟，世代生活在小镇上的人，要生儿育女，经历生老病死，作为一个定居之地，而不是临时居所，它的功能应该是全面综合的。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我的生活里被提上了日程，我才注意到让小镇运行起来的内在力量。

今年夏天，我去美国罗德岛州一个叫东格林威治小镇的旅行。镇中心就一条主干道，两旁是餐厅和超市。沿着主干道往州立公园方向走，州立公园对面散布着庭院深深的庄园和别墅。州立公园非常



(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小汤山疗养院雪景（摄于2013年）

辽阔，除了大片大片的绿地和魁梧的古树，还有不少高尔夫球场，湖面上则停满了私人游艇。这是一个富裕的小镇。我住在一家前庭后院都打理得很精致的镇上人家里。房东太太告诉我，她曾经接待过一个中国女孩，父母专程送她到这里来读中学的，因为她家旁边就是一所罗得岛州顶尖的私立学校，叫洛基山学校。我这才注意到，东格林威治镇也是一个学区，学区内还有六所不错的公立学校，新英格兰技术学院的主校区也在这儿。

就美国来说，有很多东格林威治这样的小镇，小镇上通常都有很好的学校和不错的公司。比如，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小镇，不仅是教育水平很高，还有洛克希德·马丁的雷达系统分部、计算机科学公司以及PNC银行等大企业常驻；弗吉尼亚州的维也纳小镇，学校质量在全美排名靠前，也有IBM、美国第一金融资本和美国在线等公司的厂房；威斯康星州的米德尔敦小镇，因为是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主要学院的所在地，教育水平也是一流的，小镇上的主要就业领域包括教育、法律、生物技术和医学。听起来，与小汤山镇毗邻的北七家镇，在未来科技

城和地铁17号线建成后，既有高科技大型国企的进驻，也有一些不错的私立学校，好像与这些美国名镇有一些相似。不过不同的是，美国这些小镇这么高的教育水平，是由这些小镇的居民积极缴纳的房产税和教育税来支持的；小汤山镇和北七家镇还没有这种将镇上生活的居民和小镇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生态。

和我住过所有小镇比起来，北京的小镇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我倒觉得我住的小区更像一个小镇，或者可以叫“小镇中的小镇”。它的规模就在方圆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不大，也不小。它有一条围合的主干道，主干道两侧分散出迷宫一样的岔路小径，人与人刚好可以熟识。这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栋房子里住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那栋房子里住着一位孤独的老太太；你家的黑背可以在我家寄居一段时间，李家帮张家从学校接回了孩子；晚饭后隔壁阿姨又来叫妈妈一起散步了，秋天到了大家一起在河边烧烤喝酒……有时候，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亲近的关系，会在我心中滋长出暖意，那种小镇生活独有的暖意。☑



(张雷摄)

1



2

奥伦达：生活在部落

文 / 钟晓武

在原乡和海坨山谷，业主不仅是居民，更是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者。共同的文化让小镇拥有了不息的生命力。

重新掌控的生活

10月的延庆，秋高气爽，空气清冽，红绿夹杂的树叶还有摇曳枝头的果实，浮隐在山脊中的长城，无不吸引着城里的人在闲暇之余外出散心。像往常

一样，刚过50岁生日的刘晓黎，每到周末，便会带着急迫的心情驱车前往延庆。

与一般游客不同，等待在古崖居西侧原乡家中的，除了美景，还有一群和她一样喜欢唱歌演戏、热爱艺术的邻居。

位于京北延庆和怀来交界处古崖居山下的奥伦达部落·原乡，是一处美式西部风情的度假区。背依燕山余脉，面对官厅水库，这里三面环山，溪流潺潺。在占地5000亩的小镇上，街道两旁排布着西镇酒店、心身健康（医学）博物馆、花友会、足球

(张雷摄)



(张雷摄)

3

俱乐部、茶馆、淘宝屋、扒房、红酒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建筑。

最有特色的是这里的房子，居然没有围墙，这里的人们自称“乡民”，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原乡没有陌生人”。这里没有CEO、合伙人、教授，只有画友、酒友、茶友。十几年来，已经有3000多户像刘晓黎这样的家庭长住在这里。

“现在院子荒着，是我先生没空打理。”刘晓黎笑着说。坐在她家中的客厅，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没有围墙的院中，山楂树与枣树上结满了鲜艳的果实，地上横生的杂草，倒平添了几分野趣。

2011年，刘晓黎住进了延庆的家中，过完周末再回城里。先生退休以后，仍被聘为能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她却开始将更多时间放在这里。

今年年初，她决定从事业中抽身，只在一个朋友的创业公司担任合伙人，每周花一天集中处理工



(张雷摄)

4

1. 在海坨山谷享受自由的苗振宇和杨庆欣夫妇
2. 用画作记录原乡的高子
3. 还没入住就加入戏剧社的韩雪峰
4. 在原乡身兼数职的刘晓黎

作，剩下的时间便用来发展兴趣，掌控生活。她甚至对人生再次做了规划：25岁前，求学成长；50岁前打拼事业；之后就是自在生活阶段。

而真正让她脱离工作惯性的，是奥伦达部落在原乡组织的丰富多彩的聚落活动。房地产狂飙突进的十年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尽管多数地产开发商正在悄然完成从开发到运营的身份转换，但像奥伦达部落那样全力打造社群文化的运营商并不多见。更关键的是，业主们由兴趣联结形成的社群网络，正逐渐发酵成某种乌托邦气质的聚落文化。在原乡，每个院落都是不设围墙的空间，每名业主都是不再陌生的乡民。

“除了合唱团、话剧社、歌舞团，还有足球、羽毛球、骑行团、花友社、油画苑等等，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聚落，百趣聚落，相当于近百个社团。”2011年起，刘晓黎连续加入合唱团、话剧社，后来还被推举为歌舞团的团长，如果不是精力有限，她还想

参加更多的团体。

活动最初由奥伦达部落组织，并为每个聚落设立一个TO (Tribe Organizer, 部落大使)，为团员提供服务。参照企业管理的办法，奥伦达部落每年还会评出十大精品聚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服务。“今年的评比特别多，光考核办法就有14页。”刘晓黎用手比画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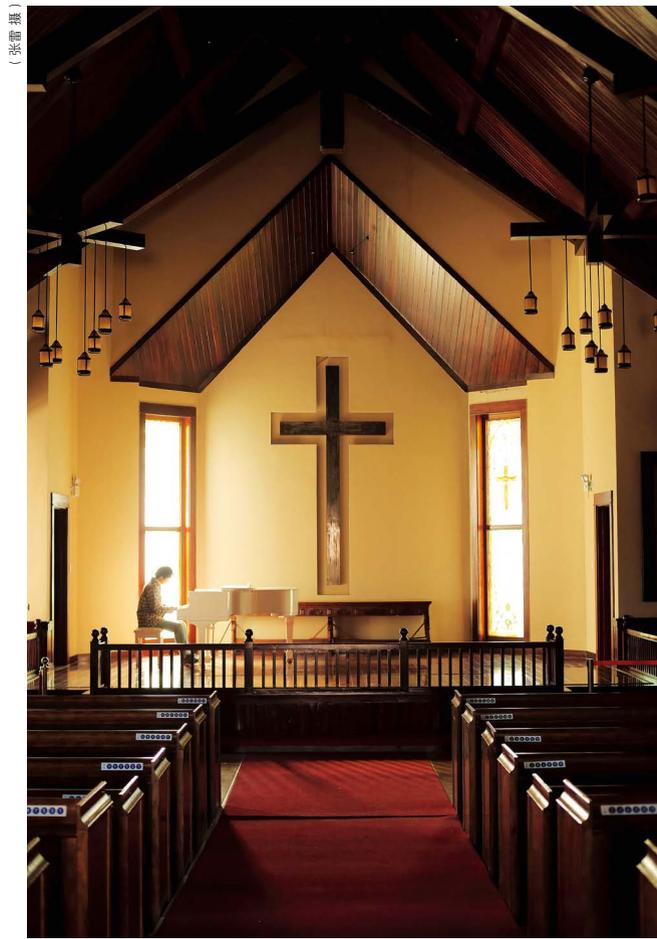
文艺是最好的心灵疗愈

刘晓黎正是在这里找回了儿时的梦想，开始发现全新的自我。小时候她喜欢弹琴、画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更希望她从事学术，至少也是会计师、教师这样务实的职业，这些爱好便不自觉地遏制了。2011年到原乡后，刘晓黎便参加了目前已有50多人的奥伦达部落合唱团。随后，她加入了主打现代舞的映像舞团，由于热情积极，去年被大家推举为团长。她不仅带领大家排演了《奥伦达映像》系列歌舞剧，还发挥她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优势，包括老年舞社、儿童舞社、精品舞社、牛仔舞社在内90多人的舞团，被她组织得井井有条。

让她最全情投入的爱好，无疑是话剧表演。在著名导演徐松子的指导下，从开始的配角，刘晓黎一直演到《原野》中的女主角金子。“每个人都喜欢释放自我，或者说发现另一个自我。”话剧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奥伦达部落创始人刘向阳先生（人称向水）也无意将话剧纳入自己倡导的“心身大健康”体系，希望做成国内第一社群话剧社。他自己也投入到话剧的演出中，扮演完《雷雨》中的鲁贵后，向水经常重复一句台词：“哎呀，有什么忙，人生不就是赌点、吃点、喝点、玩点。”

今年7月才加入奥伦达部落的韩雪峰，原本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合伙人。办购房手续时，正好遇见刘晓黎和另一位邻居在背《原野》的台词。“你们这还有话剧呢？”因为多说了一句——我上学时也演过话剧，没想到被话剧社社长徐松子看中，“嗯，胡四就是他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接连演了《贵妇还乡》中的列车长、《奥伦达映像II》中的美国记者，还没入住，已和乡民打成一片。有时排演节目到凌晨，韩雪峰的劲头依然不减。

刘晓黎还记得自己在2011年中秋第一次登上舞台朗诵诗歌的感觉，化完妆穿上旗袍，先生感觉她完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给她拍下那张照片的



(张雷摄)

高子，拥有同样神奇的身份转换。

来原乡之前，高子曾长期担任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早在十多年前，她就在昌平买下一座院子，小桥流水，按照理想设计了一番，但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村人异样的眼光，一直让她觉得格格不入。2007年，到原乡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绘画，并在三年时间里拉起一个40多人的油画苑。“在油画苑办下午茶，画架子支一排，然后沏点茶，黄瓜下来打一杯黄瓜汁，滴两点蜂蜜扔一克玫瑰，大家边喝边聊，每次都有一个主题。”

不止于普通的兴趣，追求更高的舞台，是奥伦达部落，也是乡民身上的共同特点。高子定期为画苑邀请专业老师讲课，还组织大家在原乡街道房屋画画，办画展。一位美院教授看完他们的画后，不禁感叹：“看了你们的画，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作品。”



2



3

引入身心健康的专业医疗康养服务，塑造丰富多元的社区文化，是奥伦达部落规划国内 10 个小镇，国内外共 100 个特色小镇的标准配置。在刘晓黎看来，科学的康复医疗手段固然要依赖，好山好水的环境也有助于健康，但心理健康更重要。丰富多彩的文艺，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疗愈，因为“你每天都很高兴”。

从乡民到谷主

从原乡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触目皆是绿树红叶，日头一点点升了起来，弥漫山林的雾气逐渐褪去，在山腰形成一条迷人的分界线。

经过 20 多公里的行程，我们已经爬上了山麓的高点，眼前处于群山环抱中的一片谷地就是海坨山谷。位于延庆和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交界处的海坨山谷，距离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仅有 10 分钟车程。

还在建设中的海坨山谷，已是一座拥有海坨 CLUB、山顶咖啡馆、房车露营公园、大湖公园、帐篷营地等初具规模的小镇。山脚下层层叠叠的松林、白桦林，美不胜收，这里也是居住在原乡的乡民经常来写生的胜地。

一路往下，远处上百辆房车组成的营地，前方

的骑行道和环山慢行道，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座以运动医养为主题的特色小镇。海坨山谷有亚洲最大的房车营地，到夏天“一车”难求。清晨可以踩着露水登山徒步，晚上可以点燃篝火，把酒欢歌。四周白桦林环绕，虫鸣嘤嘤，仿佛世外桃源。

在奥伦达部落，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称谓，大家把原乡的业主叫作乡民，把毗邻原乡新开发的海坨山谷的业主叫作谷主，而在年龄背景相仿的乡民与谷主之间，则以姐姐或姐夫相称。苗振宇就是刘晓黎时常挂在嘴边的姐夫，由于苗振宇的爱人杨庆欣和她在一个舞团，她也感受到这位姐夫发生的变化。

在海坨山谷阳光明媚的咖啡厅中，我所见到的苗振宇着装挺拔，儒雅而沉稳。由于之前在央企工作了近 20 年，15 年前出来创业，他身上还保留着严谨与理性的气质。用他的话说，自己并不像商人。“如果说原乡是一首悠扬、舒缓的田园牧歌，而海坨则不一样，海坨富有朝气与活力，它充满动感。”刚刚坐定，苗振宇便分析了两个社区的差异。

由于工作关系，苗振宇经常去国外出差，有时候他会被邀请去朋友们在山中或海边的度假小屋玩，一边欣赏自然美景，一边烧烤喝啤酒，那种生活一度让他非常羡慕。等自己有条件后，他便开始寻找环境优美的居所。跑了好多地方后，他到了原乡。2009 年，原乡还在建设中，早春山野萧条，房子周

1. 奥伦达部落·原乡·西
镇文化中心

2. 奥伦达部落·原乡·梦
惜湖

3. 奥伦达部落·原乡·秋意



围工地环绕。

“当时真正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相识之后，感觉他们都很实在而且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苗振宇说。

喜欢安静的苗振宇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起了菜，“春种秋收，夏天异常忙碌，也学到很多园艺知识”。爱人杨庆欣是医务工作者，两人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用苗振宇的话说，自己是地面的，夫人是在空中的。“我比较喜欢花草，有时候也和大家一起打打球，我爱人喜欢动和跳舞，原乡的各种活动，比如热气球、飞行，她都要去。”

由于乡民们年龄背景相似，都能聊得来，渐渐地，那种城市生活中长期建立的隔膜被打破。苗振宇整个人也变得更加“open”了。生活节奏降下来之后，他的事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上一层楼。每到周末，夫妇俩都急着回来：“我惦记这边的朋友，惦记我的瓜果蔬菜，她则惦记舞社的姐妹们，真的就像向水主席所讲的‘先天带来的兄妹，真赶不上后天的亲人’。我们这个朋友圈特别纯粹，大家都变成小孩了。”

在成为乡民后，苗振宇也投资了海坨山谷，成为了“谷主”。比起原乡，海坨的自然条件更为得天独厚。山谷长达18公里的纵贯线，不仅面积开阔，而且景色宜人，温暖舒适，前期对标瑞士小镇，设计规划为以运动医养为特色的小镇模型。

一期建设的核心是滑雪场、儿童产业谷与社区

中心，此外还有一个国际医学中心；二期的核心则是以温泉养生为主的康养中心。“我们一家都喜欢滑雪，每年都要滑几场。如果一、二期配套全部完成，这里什么都可以找到，将来一定是北京郊区一颗璀璨的明珠。”说到这里，苗振宇也透露出作为投资者精明的一面。

尽管海坨的酒店还没建好，但苗振宇差不多每周都要带家人和朋友来这里一趟。从原乡到海坨，对他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更大的释放与拓展。有时候赶上云海，赶紧用手机拍下发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羡慕。秋冬之际，笼罩京城的雾霾即将来袭，只有在这里运动，他才能更放心地自由呼吸。两人已经商量好，等可以入住行权，每天早上都要绕着山谷的环山慢行道走一圈。

前段时间，苗振宇去了瑞士。在世界滑雪锦标赛所在地圣莫里茨小镇，他在咖啡馆见到两位看起来只有三四十岁的当地人，一聊才知道对方都已经60多岁了。他们就住在山下，退休之后每天都来滑雪。运动带来的深层次快乐与享受，让苗振宇非常羡慕，无疑这也是海坨山谷最吸引他的地方。

虽然去过很多国外小镇，苗振宇还是能感受到奥伦达的独特之处。“美国一些西部小镇，主要由原住民包括少量新移民构成，尽管气氛也非常好，但毕竟与这里乡民的结构不同。”其实这不难理解，不论是原乡的乡民还是海坨的谷主，多半都由朋友口耳相传介绍而来。同为各行业的精英，相似的教育



左图：奥伦达部落·原乡

右图：奥伦达部落·海坨山谷

与成长背景，成为社群文化的发酵剂。

用刘晓黎的话说：“虽然都是舞团，但是我们跳的舞都是萨萨舞、摇摆舞、啦啦操、旗袍舞，不是简单的广场舞。”更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并非止于吃喝玩乐，除了专业的文艺活动，还可以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投资理财等主题沙龙活动，学习讨论各种问题，其氛围大概只有在活跃积极的高校才能见到。

而所有一切，并非作为运营商的奥伦达部落单方赋予，更多体现为一种资本、文化、运营在内的“共同创造”，也就是奥伦达部落人说得最多的“同创”。“同创是什么？一起赚钱，一起开发，一起运营。”

长出来的乌托邦

在一种联结密切的生活网络中，乡民们渐渐塑造了颇具乌托邦气质的部落文化。在苗振宇看来，这是奥伦达部落成功的基因，也是目前各地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难以效仿之处。归根在于，“它是乡民们创造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不是开发商硬性植入的”。

去年，刘晓黎带着大家排了一部原创歌舞剧《奥伦达映像》，全剧分为传说篇、开拓篇、丰收篇、丰富篇四个篇章，以歌舞形式诠释了奥伦达部落的历史。舞团的副团长一个是来自某大学的博导，一个是某保险集团高管，大家在一起不断研究讨论，如何通过一个歌舞剧的形式，表达思想。乡民们在一

起每日自发研究与探讨，完全出于对歌舞的喜爱。

在聚落的每个领域，业主中间常有专业高人，抑或通过聚落的社会关系发掘出来。而在平常，请到这样的“大咖”非常难。“但在业主中请，咱就不谈利益，只谈乐趣。”让韩雪峰诧异的是，在排演话剧《日出》时，他还遇到了自己的同行，联想公司的一位副总。

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卸下了平常的“外壳”，完全以兴趣联合在一起，收获意想不到的知识与乐趣。由于本身就是资深理财专家，在排练节目之余，刘晓黎还发动舞团成员去学金融知识，她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这个团队有财经头脑，能挣钱，还能玩到一起。”

前段时间，苗振宇受邀参加了奥伦达国内10个小镇的发布会。让他兴奋的是，未来不管作为原乡的乡民，还是海坨的谷主，都可以作为会员，去这些正在建设中的小镇度假。不但可以领略那里美丽的自然景色，还可以享受当地各种各样的美食、休闲娱乐设施、心身康养度假体系。

“大家在一起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后半辈子恐怕就跟着奥伦达了，在它网络化的体系中享受丰富多彩的体验，也许都没必要单独外出旅游了。”苗振宇开着玩笑说。

继去台湾骑行、瑞士小镇度假、婺源写生后，2017年冬天，奥伦达部落又将行权体系带到了海南。跟随奥伦达部落的特色小镇拓展之路，会员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奥伦达部落·海坨山谷 1473 咖啡馆

小镇运营，非一日之功

文 / 钟晓武

在奥伦达部落的特色小镇，一切都是以身心健康和社群文化为核心而组成或是延伸的。

房子不仅是用来住的，更是生活的归宿

目前，奥伦达部落的社群运营已经成为全国小镇运营的典范，而探究其发展历程，不得不从奥伦达部落的“前世”说起。早在全国地产大军全线涌入城市之期，奥伦达部落的母集团居易国际就完成了第一轮全国化的进程。十几年前，正当城市住宅的开发如火如荼之时，居易国际已经开启了第二轮的全国化，即远郊度假大盘的全国布局。随着开发产品从城市的“鸽子笼”到郊区度假别墅，当时的居易国际已经开始构想房子之外的事情。于是，在那个全国人蜂拥抢购城市房产的热潮期，居易国际便提出了“心灵地产”的概念：要做走心的、有归属感的家园。不光要求房子要在生态环境绝佳的远郊地域，更需要关注房子之外的事情，例如邻里关系、社区氛围等和生活相关要素。

众所周知的北京延庆的远郊项目——原乡美利坚，即是出自于早期的“心灵地产思潮”的产物。

原乡美利坚风格几经变换，最终定位为美式西部风格，没有围墙和小房子大花园的设计，其本身就意味着开放、自由之地。奥伦达部落花友汇会长糊涂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选择原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有花园，有花园就意味着有生活。因花园衍生出的原乡土豆节、花友会聚落以及梦想小馆，让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们成为“后天亲人”。

梦想聚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原乡美利坚起初只有几十户业主，然而这几十户业主却对这里有着深厚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形成不仅仅是山美水美的自然生态带来的，更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生活价值观，并且经常性地自发组织活动。发现这一现象后，居易国际开始真正将“心灵地产”的内涵落地，成立奥伦达部落的前身泊爱委会俱乐部，发力社群活动，满足业主和会员的兴趣爱好。随着业主和会员的日益增多，活动也日渐丰富，方向也逐步清晰。直至2011年底奥伦达部落品牌正式创立，以会员制健康与幸福系统运营商的身份进驻于其开发建设的各个小镇中，进行小镇文化的运营及会员服务。

在小镇社群文化运营初期，奥伦达部落发现业

主和会员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社交需求。他们鼓励业主和会员们依据兴趣与爱好结成各种社团（在奥伦达部落被称为：聚落），并给予扶植和资助。此后，奥伦达部落为每个聚落设立 T0（聚落亲善大使），尽心尽力为聚落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支持。于是，上百个梦想聚落在奥伦达部落遍地开花，他们玩在一起，创造在一起。在原乡有句话叫作“原乡没有陌生人”，梦想聚落作为奥伦达部落社群运营的抓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新常态的生活方式。正如原乡乡民、社会学家“梦里原乡”所说：“仔细探究下来，这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回归，更是人与人距离感的消融，升华之后，就成了奥伦达部落的独特文化现象。”

与会员同创，让会员成为合伙人

奥伦达部落不仅希望会员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能玩儿在一起，也通过共同投资、共同创造、共同运营，让会员都能分享到奥伦达部落小镇发展的红利。于是，“三同创”的运营模式在这个时候被提了出来：“资本同创、运营同创和文化同创。”简单来说，就是“会员作为合伙人投资于小镇的项目发展中，并将项目委托给奥伦达部落进行运营，获得相关收益”。事实上，这也是奥伦达部落在特色小镇运营上成功的关键：会员不仅享有奥伦达部落运营带来的幸福生活，亦可称为合伙人参与到小镇的发展中。

“资本同创”的逻辑并不复杂，难点在于对会员信任的获取，而这正是奥伦达部落长期培育社群文化的结果。小镇会员彼此间建立起深厚的关系，也对运营商奥伦达部落更加信任。奥伦达部落位于张家口赤城的海坨山谷项目，打造了全亚洲最大的房车营地。这不是奥伦达部落以企业之力实现的，而是全部由会员投资完成。

而在通过聚落实现自己的梦想兴趣之外，会员与奥伦达部落共同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 IP，并成为小镇运营的一部分。在奥伦达部落油画苑，我看到了以成员画作为图案的服饰及家居饰品等创意产品，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能够将聚落成员的梦想落地变为实物，承载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价值传递给更多人，更重要的是能够变现，使聚落成员在创造、实践梦想之后分享成果；而这正是“文化同创”的结果。

“运营同创”让业主和会员成为小镇的运营者。业主固定资产的运营可以委托给奥伦达部落，共同分享收益。比如在原乡，很多业主将自己的居所托付给奥伦达部落打造成带有业主个人博物馆色彩的

“博墅”，再通过酒店系统的运营出租给不同需求的度假访客。

这样结果是，文化同创成为小镇独有的文化机体与生活创意源泉，使得小镇的居住者和度假者能够有一个平台来创造生活美好的各种可能性；运营同创和资本同创，让会员变成了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地为小镇的发展贡献能量。

小镇的发展，健康可持续才是根基

有了社群文化做根基，获取了会员“同创”的支持，奥伦达部落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需求。满足了自我的精神生活需求，健康就成为每个人对于生命状态的最终追求。

今年7月，奥伦达部落十大小镇联合发布。我们发现，在奥伦达部落打造的所有特色小镇中，一个核心元素就是身心健康。奥伦达部落从WHO（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医学新范式入手，以生理、心理、社会（社群）的心身医学解决健康问题，打造“让人不生病”的小镇。为了提升身心健康服务的质量，奥伦达部落全线引入了MTT（运动康复治疗）、PNI心理神经免疫学、传统中医、生机饮食等全球顶级的心身医学产品和服务；并签约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提升小镇的基础医疗服务。在奥伦达部落心身健康（医学）博物馆内，这些心身医学康养服务串联形成闭环，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为会员提供完整的心身健康生命服务。而与心身健康（医学）博物馆一路之隔处，奥伦达部落正在打造一个集3.5万平方米的康养酒店和33个康养酒庄为一体康养小镇，其将引入欧洲顶级的康养设施及医学专家，打造一个代表未来的康养作品。

谈及未来战略布局，奥伦达部落品牌发展中心总经理王斌告诉记者：奥伦达部落将在全球打造百座特色小镇，国内重点布局京津冀、华东区域和粤港澳大湾区；海外则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地进行布局。而这些特色小镇都具备一个共同点，即满足会员文化创造与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

支撑奥伦达部落小镇模式的关键是身心健康和聚落文化。文化的浸润显然需要时间，小镇运营，并非一日之功。在奥伦达部落，会员与小镇形成了深度互动的关系，他们不仅是居住者和度假者，更是投资者和运营者，是小镇真正的合伙人。他们为小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成为奥伦达部落各个小镇可持续发展的根。■

度假的终极是生活

文 / 谭双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 2016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指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促进了消费升级。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2016 年 7 月 2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计划到 2020 年，培育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

官厅公共艺术小镇，早在 2015 年就已悄然启动。借助 2022 年冬奥会的契机，瞄准北京区域的度假升级市场，布局官厅湖畔，为大北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度假生活体验。

如今，经过两年的建设发展，初具规模的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不仅受到市场追捧，更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成为旅游地产运营的经典案例。

从城市化到小镇化

在当今中国社会，如何解决城市病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国家提出的“特色小镇”发展方向，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特色小镇将会成为高端产业发展、高级人才聚集的一个重要空间载体，形成与大中城市协作互补的产业链关系，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特色小镇的发展不是要建旅游小镇，而是要引入旅游的元素和功能，使小镇成为一个宜业、宜居、宜游的社会空间，通过与中心城市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的比较优势，吸引高端产业以及相应的高端人才在小镇落户。

因此，特色小镇要通过旅游化改造，形成具有一定文化、历史、艺术、科学、养生等价值的景观节点、建筑风貌。特色小镇通过旅游化改造，形成独有的魅力和鲜明的主题文化，拓展高端产业辐射的边界，通过旅游的流动产生更大的消费力，让特色小镇更具生命力。同时，通过旅游化改造，使特色小镇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强调优质的生活环境，是特色小镇存在的关键。特色小镇通过旅游化改造，形成休闲业态的多样化，构建生活化的服务系统，应在吸引社区参与、带动就业、促进居民增收等方面发挥较强的作用。

从资源度假到内容度假

众所周知，旅游度假类小镇的开发，不应该仅仅把眼睛盯在资源上，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借助资源，梳理出独特的产品内容。真正优秀的旅游度假小镇应该是一个内容小镇，而不是一个资源小镇。

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之所以落户官厅湖，这里绝佳的自然条件是关键因素。

尽管直面 235 平方公里湖面，拥有全北京最优美的 6 公里湖岸线和苍翠起伏的山岭，但这对于官厅公共艺术小镇的雄心而言，还远远不够。

把偶发性的旅游行为转变为周期性的度假行为，再把独特的度假体验转变为人文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官厅公共艺术小镇的初衷所在。

于是，经过前期大量的多方论证与调研，最终

确立的以健康养老、产业驱动、山水运动、人文休闲这四大产业为核心，全面对位北京高知阶层的山水度假生活，便慢慢铺陈开来。

从开发创新到产业创新

对于大多数开发商而言，官厅公共艺术小镇的操盘手法有些“自找苦吃”。摒弃了传统地产开发中的拿地、建房、销售模式，广安控股从规划之初，就深入周边，全面考察现有产业，深入村镇田间，摆脱了单纯的开发商角色，把自己视为当地经济组织中的一分子，希望与当地政府配合。通过广安控股的大力投入，实现当地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切实落实国家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意图，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北京市国企的身份，也对得起官厅湖边这片不复再得的土地。

于是，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便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气势恢宏的规划，沿着自然的山岭与湖岸有序排布；被天然地分为十二道湾，每一湾都有独特的产业形态与定位，十二道湾既彼此呼应又各自成趣。

目前基本建成的一岭和二岭，集休闲、游乐、拓展、餐饮、居住、艺术、运动等功能于一体，初步实现了全栖化度假体验。

在一岭、二岭中，小镇营建了十二大人文休闲配套设施，涵盖酒店、餐饮、会所、酒吧、书局等。在官厅湖畔，小镇的人文之光犹如一道彩虹，在山水间熠熠生辉；释放都市生活中的紧张情绪，用最能激发生命激情的方式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此外，官厅公共艺术小镇利用宽山、窄谷与冲沟等极具特色的地形地貌，引入丰富的运动项目，通过跨平台整合，在山水运动板块构建四大主题阵营、三大IP体育赛事，让水上运动、山地运动、徒步越野、山地骑行、高空挑战、体育赛事等成为山水间的运动休闲新时尚！运动产业为湖山美景注入缤纷与活力，让每一个假期都能赋予生活无限的能量！

从度假小镇到共享社区

时下最流行的“共享社区”，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精神和物质的和谐化交往为目标，通过居民之间互惠互利的“社区交往模式”，在公共空间里，邻里之间不仅能共享三餐、家务、家居用品等生活要素，

更可以分享各自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等。

基于“共享社区”理念，官厅公共艺术小镇倡导的全新度假体验，以社群为依托，通过产业形态的设定与公共空间的规划，形成一种以聚合、分享、传递为特征的共享式度假模式。酒吧、书吧、健身房、棋牌室、K歌房等功能业态，让我们拥有了更充分的社交空间。小镇希望培养一群热爱生活和自然的居民，通过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实现整个小镇的和谐共生，让小镇的价值不断升值和提高。

从历史纵深到城市更新

官厅公共艺术小镇项目的投资方是北京广安控股，一直以来广安控股心怀家国责任与使命，藉由强大实力致力于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与运营，承袭中华历史与文脉，打造人文居住自然之美。

定位于城市更新服务商的广安控股，承担了北京老城区大量的棚改和城市重建项目，包括金融街、大栅栏、菜市口等项目。不同于传统的旧城改造、推倒重建的模式，城市更新，含义也有所变化。随着城市格局的变化、城市肌理的发展，原有旧城区的功能区需要重新梳理、更新和改造。城市更新既要保护好历史城区的传统风貌和整体环境，又要提升功能、焕发活力。

通过城市更新工作，广安控股既掌握了北京城的核心文化资源，又熟悉如何将其外延、外溢，并输出到项目中去。这个理念，也被输出到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中，成为主导小镇开发的重要思路。

此次联手国际知名设计、物业管理、商业运营团队，引入国际、国内优质资源，于官厅共筑特色度假小镇，是广安团队在官厅湖岸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与大胆尝试，也为城市更新生活、注入活力，跨入广安辉煌事业新纪元！

左图：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二岭实景图

右图：官厅公共艺术小镇集装箱岛屿实景图



中美经贸的新时代

主笔 谢九

美国总统特朗普需要尽快缩小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而中国的资本输出也需要打破美国的投资壁垒，以订单换投资，或许会成为中美经贸的新玩法。

特朗普访华，带着 2535 亿美元的超级订单满意而归，这也预示着中美之间的贸易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2535 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去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 520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此次特朗普访华签订的订单，已经接近中美全年贸易额的一半。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如果不考虑欧盟和东盟这两个区域联合体，2535 亿美元的订单，仅仅略小于去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而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单一贸易国别（美国除外）的全年贸易额。某种程度上而言，中美之间仅仅通过这一次超级订单，就将其他贸易伙伴予以“秒杀”，这种级别的贸易方式，无论在中美贸易还是全球贸易史上都属罕见。

这种贸易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特朗普对于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一直耿耿于怀，早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谈及中美贸易时，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在竞选成功之后，特朗普也积极兑现承诺，今年 8 月份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推向近年来最复杂的局面。就在此次启程访华之前，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令人尴尬和可怕。

作为一个被贴上“贸易保护”标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扭转中美贸易逆差的决心绝非虚张声势。过去很多年以来，中美贸易尽管摩擦不断，但两国之间基本上还是有很强的默契和管控力，使得贸易摩擦尽量在磋商的框架之下解决。但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开始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新玩法，特朗普对于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更加没有耐心，或者说更加务实，美国不再过度寻求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长期机制，转而更加注重短期效果，希望中国能够释放出大规模的订单，让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今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开始呈现出很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今年 4 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美国海湖庄园会晤，提出中美经贸合作的“百日计划”，这是中美两国元首为解决贸易问题的首次携手合作。“百日计划”（4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共分为三个类别：一是早期收获；二是在百日内可取得重大成果的领域；三是在百日之内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在这次合作框架之下，美国财政部没有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而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对美国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在 6 月份重新开放了美国牛肉进口。2003 年，美国爆发疯牛病疫情，中国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长达 14 年的禁令解除，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特朗普政府释放出来的诚意。今年 7 月份，中美在华盛顿举行全面经济对话，在“百日计划”到期之后，中美决定实施“一年计划”，将“百日计划”继续延伸。

此次特朗普访华，也让美国追求短期贸易效果的努力达到高潮。特朗普访华带来 29 家企业代表，其中科技类的仅有高通一家，十多家来自能源企业。对于高科技企业“缺席”此次访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此前表示，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关税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磋商，我们期望能达成直接成果和具体协议。言下之意是希望通过此次访华能够对中美贸易带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十多家能源企业随行访华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从此次 2535 亿美元的订单明细来看，除了传统的波音飞机采购大单之外，能源领域的合作金额约为 1400 亿美元，超过了全部合同金额的一半，其中，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签署框架协议，对后者页岩气、电力和化工生产项目投资 837 亿美元。同时，阿拉斯加州政府、阿拉斯加州天然气开发公司（AGDC）、中国石化、中投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一项协议，以促进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开发，这项协议将涉及最多 430 亿美元的投资，建设期间将在美国创造最多 1.2 万个工作岗位，使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年度贸易逆差减少 100 亿美元。仅仅这两项合作，金额就已经接近 1300 亿美元。

从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来看，以能源作为突破口也的确存在双赢的潜力。为了治理大气污染，中国致力于减少煤炭使用量，增加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

用,目前我国天然气消费量超过三成需要进口。而从美国来看,页岩气革命以来,美国天然气产量爆发式增长,已经远远超过本土需求能力,从去年以来,美国首次成为天然气出口国。对于中美两国而言,一方存在巨大的进口需求,一方存在巨大的过剩产量,以天然气作为解决贸易失衡的突破口,可以算是一个很理想的解决方案。不过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大量从美国进口天然气,有可能会对现有的进口格局带来影响,比如俄罗斯等国,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也需要考验中国的智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6年以来,已经逐渐熟悉了WTO下的游戏规则,并且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任,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一反传统做派,扬言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坚定退出TPP,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丝毫不惧贸易保护的标签。可以说,在特朗普的影响之下,全球贸易已经进入后WTO时代,作为WTO时代的最大赢家,中国也需要尽快适应时代的转变。

从这次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单来看,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在通过大额贸易订单减缓美方逆差压力的同时,也借机为中国资本投资美国开拓渠道,以贸易换投资或许是中国对美的新思路。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流量创下196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5%,在全球占比达到13.5%。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36万亿美元,在全球占比提升至5.2%,位居第六。尽管中国资本输出快速增长,但是对美投资规模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2016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169.81亿美元,尽管同比增速高达111%,但是和两国的经济体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比重也不足10%。

中国对美投资规模偏小,很大程度上在于美方对中国资本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由于美国国内对于中国投资的不信任,经常以安全审查为由否决来自中国的投资,中海油、华为等中国企业都是这种不信任的牺牲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双方都意识到打破投资壁垒对于各自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于当年首次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BIT已经历了9年近30轮的谈判,但是距离最终达成协定仍有相当的距离。

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而言,经济利益的考量或许会高于意识形态,一方面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贸易订单需求,同时可能会适度降低对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审查门槛。从这次2535亿美元的合同来看,已经有1400多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允许进入美国的能源市场,这或许意味着中美之间经贸合作的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爱乐》2017年第十一期要目

封面话题

“要创作有调性的音乐”：再访德穆斯
德穆斯谈艺术歌曲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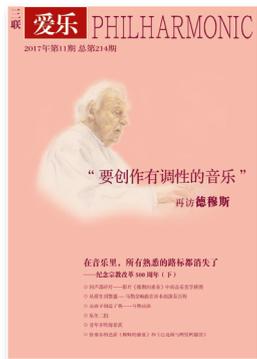
恒常变奏 四声部碎片：影片《晚期四重奏》中的音乐美学拼图
斑狐说乐 在音乐里，所有熟悉的路标都消失了：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下）
话题 从萌生到繁盛：马勒交响曲在日本的演奏历程
爱乐笔记 希曼诺夫斯基八十年祭
是曲子创造了我：马勒访谈
乐冬二拍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上）
20/21世纪音乐 勃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阿多诺-韦伯恩：一个复杂的心理群（中）
乐史空间 1890年爱德华·施特劳斯在美国（上）
浮生碎乐 廿年不听海菲茨
作曲家与作品 对罗德里戈《阿兰胡埃兹协奏曲》、法雅《三角帽》和维拉-罗伯斯《巴赫风格巴西组曲》的解读

人物 当代澳大利亚作曲家林瑞玲访谈
歌剧物语 鲁塞尔的芭蕾《蜘蛛的盛宴》和《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
音乐之旅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二）

作品精读 前卫创新的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
唱片说明书 富尼埃在Archiv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书房 《古典音乐那些人》和《古典音乐那些事》书评
资料库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十）
听购收 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版本集赏（上）
专题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众多艺术家的回忆（九）
爱乐往事 北大爱乐故事（七）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店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辽宁运钞车劫犯被审：三角债的深渊

记者 刘畅 实习记者 林默

一桩巨额的运钞车抢劫案于2017年11月9日宣判，却引来舆论对罪犯的惋惜。劫犯李绪义抢钱还债的背后，是三角债之下道德和金钱的双重深渊。

非典型抢劫事件

“营口大石桥市运钞车司机李绪义抢劫运钞车案今日一审宣判，判处李绪义有期徒刑15年。”11月9日晚，宣判消息从李绪义母亲王艳家中的电视里传来。屏幕里36岁的儿子穿着灰黑色毛衣，头顶的短发稀疏，鬓角发白，神色木然。李绪义一家人彼此招呼，观看这个他们已在现场得知的消息，又陷入沉默。“15年太重了！”王艳心有不甘。

从犯罪行为上来看，他们的希求似乎有些苛刻。2016年9月7日13时许，在辽宁省大石桥市，运钞车司机李绪义在执行押运任务途中，故意未按押运路线行驶，持枪状物劫走约600万元现金。“持枪抢劫，且数额巨大，可以判到无期。”李绪义的援助律师王殿学告诉我。这样看来，法院似乎已经宽大处理，“但他的抢劫和人们意识中的抢银行行为毕竟完全不同。在1月份的一审开庭时，我们表达的意见，法庭都没有采纳”。

他们的呼声是什么？这需要回溯一年多以前的那一天。是日，李绪义所在的押运队接到任务，把3500万元现金运往大石桥农业银行。中午12点半，他驾驶的运钞车在本该左转的路口绕行，开到一个僻静的小区旁停下，李绪义从后腰抽出一把没有子弹的塑料手枪，枪口对准车上的车长、押运员和携款员，缴了他们的械，逼着他们自己用透明胶带把手绑住。同事一场，大家劝他别做傻事，李绪义只说：“我不想好了。”

随后，李绪义将车开到弟弟李绪亮住的丰华颐 and 村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他从携款员的脖子上取下车里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里有14个方形的粉色袋子，他随机拖了三袋钱出来，上楼到弟弟家。在弟弟家留下一袋钱后，他背着双肩包下楼，从之前

留下的两袋钱里往包中装钱。根据王殿学对李绪义的询问，他自始至终不知晓钱的数额，他停手的标准是装满一个正常大小的双肩包。

李绪义抢钱，是为了还债。离开小区，他背着钱，辗转两个地市，找到三个债主，用一下午的时间，还债42.9万元。之后，他回到家中准备自首。“他本来想在家待一宿，第二天去自首，但那时已来不及了。”王殿学告诉我。地下车库里，运钞车中的四人待李绪义离开后不久，见没有动静，自行挣脱手上的胶带，报了警。当李绪义从债主处回家时，通缉令已遍布全城。晚上8点，李绪义的妻子陈莉带着警察来到自家小区，在家中将他抓捕。李绪义被带到派出所，供认全部事实。运钞车劫案当日告破，从事发到破案，历时8小时，出动百余名警力，抓捕的过程却在三五分钟内结束。赃款600万元随后全部追回。

王殿学向本刊介绍，在最高法院对抢劫罪的司法解释中，抢劫如系因生活所迫，属于从轻情节。而按照法律，案发后李绪义的妻子带领公安人员到家中将其抓获，应该参照自首从宽。“有期徒刑15年是有期徒刑中的最高年限。”在他看来，虽然一审判决书中，有“依据近亲属配合办案，且李绪义平时表现良好，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法院酌情可以从宽处理”的表述，但那是以判到无期为前提，这个前提量刑过重，相当于没有考虑特殊的从轻情节。“我们准备下周再上诉。”

李绪义被捕后，一直关押在大石桥看守所。除了开庭时，只有律师能和他见面。11月份的审判是相隔10个月后，他与家人的第二次见面。相比第一次时他情绪失控，与亲人抱头痛哭，这次显得克制得多。母亲在法庭后面向他招手，他点头示意。直到宣判结束，他与家人短暂团聚，王艳没有克制住，恸哭起来，他才落泪。“他怕上诉再花钱，不想上诉，所以法官问他时，他说‘再考虑’。”王艳告诉我，“我说不必考虑钱的问题。他去抢劫还债，全是因为跟着我。我如果当初不去做工程队，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冲动之前

王艳一家仍住在李绪义被捕时的旧楼里，那是亲戚闲置的房子，给他家借住。我到她家时，除了李绪义，祖孙三代都在，电视里放着逗乐的美食节目，主持人的笑声撞到家人木然的脸上。屋中陈设未变，门厅一侧的隔墙被一面巨大的镜子占满。镜子旁的沙发上，李绪义曾因为债务辗转反侧。一年多以来，呆坐的人换作他年近花甲的母亲。平时，在这座陌生的楼里，老伴和儿媳上班，孙子上学，她只能面对镜中的自己。“我会看手机里关于我儿的新闻，”她告诉我，“其实我挺抵触的，因为每次看到儿子被押着的照片，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但还是忍不住看，希望能看到奇迹。”

在李绪义的家人看来，从小到大，就没有人说过他不好，仁义、勤快、善交际是我采访到的人对他最普遍的评价。“数这孩子仁义。”李绪义一家本是李大屯村人，我在这个相距大石桥市不到半小时车程的村中，见到了李绪义的伯父李恩波。他告诉我：“他十几岁的时候，村里的同学得白血病，他主动组

织同学捐款，对他说‘即使你明天死了，今天也要拿钱给你’。”

17岁入伍，李绪义在边防部队表现优异，当上班长，获过三等功。张大伟是李绪义的兵，他向本刊回忆：“班长从来没有架子，做什么都身先士卒。有一次清理粪池，我们怕脏，在后面躲着。他自己跳下去，里面特别臭，他也不在意，一个人在下面清理。”义务兵不管分配工作，退伍后需自谋生路，李绪义对他的战友十分关心。“我退伍时，他帮我介绍过工作。后来我开货车，每年他都会打电话问我的近况。”而与他同级的战友，关系更是亲密。王艳告诉我，每年大年初六，他的战友们都要到他家聚会。“哪儿也不去，就去他那儿。平时战友一招呼，他也是随叫随到。一年他们能聚五六回。”

退伍后，李绪义回到家乡，想方设法致富。李大屯村是东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主要种植玉米。“在村里就富不了。”李恩波说，“就拿种苞谷来说，刨去种子、化肥的成本，种苞谷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才200多块钱。”伯父的话千真万确，李绪义在自家的五亩二分地里种过西瓜，养过羊，开过小卖部，



(中新社/视觉中国供图)

11月9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李绪义抢劫案，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李绪义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同时没收作案工具

但效益都不好。

2006年一个偶然的时机降临，王艳在大石桥市里的朋友请她做工程，所幸家中有些家底，又有亲戚帮衬，她拉着儿子一起组建工程队。王艳和儿子互有分工，熟谙人事的王艳负责决策，年轻力壮又擅交际的李绪义负责带领工人进材料，与各方人士接洽。母子二人配合融洽，生活渐有起色。2010年，他们卖掉村中老宅，在学府家园购房，举家搬进城里；2013年，又贷款在丰华颐和村给李绪义、李绪亮兄弟俩分别买了一套房。

做工程的同时，李绪义也尝试自己创业。但如今回想，却几乎都是年轻气盛的鲁莽之举。“他会觉得身后有父母依靠，想事情不会太深、太远。”王艳告诉我，2013年，儿子卖掉学府家园的一处房子，贷款买下小区临街的三间店铺，让两个儿媳妇开洗车行。但据李恩波讲，洗车行的位置实在偏僻，很少有车路过，生意惨淡。尾款一直拖欠，三间店铺都被收回。

而洗车行的生意失败后，他又要承包山沟里的一处鱼塘，做休闲垂钓。但同样因为位置偏，一家人全反对。可他看中塘主不要承包费，执意要做。可是房子和井要自己建，建好井还要买泵，这些后续的工程都要花钱。王艳说，儿子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钓鱼，朋友圈里几乎全是约朋友钓鱼的信息。鱼塘成了他的“游乐场”，“因为太仗义，朋友去玩儿不要钱，他花一两万买进的鱼苗，全都跟朋友一

起钓光了”。最终，算上建鱼塘的成本，一共亏了5万多块钱。

不过，李绪义的小打小闹，并不至伤筋动骨，农民包地做工程，可能是他们致富最稳妥的途径。“这工作也不需要什么资质。”李绪义家民事案件代理律师刘志民向本刊介绍，“就这些活，挖完就得了，即使不合格，监工的时候，再按要求挖到合格就行了。”然而，农民出身的工程队没有深厚的家底，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便沦为水中的浮萍，包工头的神经和抉择要经受更严酷的考验。

2011年，王艳通过朋友认识大连商人徐永平，他把从中国东亚投资有限公司承包来的20栋楼中的4栋转包给王艳施工。这是由政府牵头的保障房项目，在大石桥市北的虎庄。王艳想离家不远，她比较放心。11月浩大的奠基仪式更令王艳和徐永平信心满满。他向本刊形容：“放礼炮都不算什么，市长讲话，红旗招展，警车开道，比演戏还真。”但动工后，她却发现拿不到工程款。她的上一级徐永平同样受害。作为第三级承包商，开工一个月，他发现第一级承包商东亚公司是皮包公司，“不但没有实体，连人名都是假的”。徐永平自己背了上千万元的黑锅，其中欠下王艳18.4万元。

王艳一家栽了跟头，但并不甘心，反倒加倍奋斗。2012年，通过在黑龙江包工队的朋友，她了解到黑龙江鹤北林业局天水湖小区A4标段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虽然亲戚劝阻，人生地不熟，怕她受骗。但王艳却说：“我看那位朋友已经干了一年，也没有拖欠的情况。”王艳承包了四栋楼的建设，最终却因为动迁的问题只盖了两栋。据她讲，这两栋中，一层被要求搭建的框架结构又与招标书中的砖混结构不符。“我是按照盖四栋楼进的材料，而每平方米框架结构的材料比砖混结构的材料贵得多。”工程需由她先行垫付资金，而这些多出的近300万元工程款无人向她支付。2013年底，没有资金，王艳被迫停工。但停工不要紧，工人一个月近10万元的工资却发不出来。

“我们绝不允许自己欠别人钱。”王艳告诉我，起初，李绪义只是抵押自家的房、自己的车，或向朋友零星地借。但欠款的黑洞，除了其本身，还有它似乎随时可以还上的幻影。鹤北林业局一直许诺“下周还钱”，李绪义开始冒险。李恩波告诉我：“想到既然几百万的钱能马上追回来，他觉得零星地借

一点儿高利贷也没什么。”但欠款未到，他们过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王艳回忆，李绪义出事前，借了5家高利贷，有150多万元，又向合作社借了45万，朋友零星星的钱还有几十万，一个月得还五六万。而那时，陈莉正在彩票站工作。她告诉我：“彩票站离钱近，李绪义为了还钱，让我从那里挪了两万多块钱。想着等欠款到位了再还上。”李绪义出事后，彩票站的钱还不上，陈莉跑了。老板找到她，王艳把事情揽下来，向老板说明家中情况，请求拿到欠款后再还，获得了老板的同意。

如此看来，李绪义的抢劫更像是还债压力下的一次莽撞发泄。“第一次和他接触，感觉他有些大大咧咧的，虽然一开始嘴上说很后悔，提到家人也会懊悔，也会哭，但对于抢劫，却表露出些许轻松。”王殿学回忆，“他向我表示过，当时他觉得，‘我把欠了的钱还了，自己进监狱就得了’。”

三角债的夹缝

李绪义的行为极端，但王艳家面对的问题，绝非孤例。我从营口的高铁站出站，辽阔的荒地迎面而来，坑洼的地基、修建一半的烂尾楼遍地，裸露的钢筋像一簇簇麦秆，在秋风萧瑟的午后，孤独地耸立。房地产市场活跃时，政府卖地、开放商卖楼、工程队建楼的模式可以持续，一旦无人买楼，资金链条自上而下开始瓦解，项目“层层分包”变成了工程款“层层拖欠”。每个烂尾的楼盘背后，几乎都有夹在三角债中的包工队，以及被三角债压在脚下的工人。

“现在欠的钱，利息已不知多少，根本没法算，只能算本金，大概还有小200万要还。”王艳向记者说这些时，表现出无奈到极致后的轻松。“反正现在是一分也还不上。”儿子出事后，她在家接孙子上下学，年过花甲的老伴到工地打工。“每天5点出门，工作11个小时，一天能挣120，赶上下雨还干不了。冬天要停工，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儿子被捕，一贫如洗后，王艳从三角债的夹缝里缓了出来。她难以忘记借高利贷以来，李绪义承担的压力。李绪义抢劫前半年，他的父母到鹤北讨债，高利贷主天天催李绪义还钱。他抽烟也越来越重，一天能抽两包，经常坐在沙发上发呆，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向父母询：“钱什么时候能要来？我快支撑

不住了。”而战友知道他缺钱，欠了多少，他却不说话。赖唯告诉我，战友们聚会，他过意不去总是战友掏钱，慢慢就不爱参加了。

李绪义抢劫运钞车被通缉后，他还的赃款便陆续被债主送回。还债压力落在王艳身上。“一开始，有的债主打电话威胁我，要在我家门口泼油漆。律师说泼就泼吧，不行就报警。”她告诉我，“喝醉了债主还会骂我，后来我就把手机放桌上，等他骂完了挂掉。”现在，对于她家来说，最急迫的是一笔30万元的高利贷，李绪亮和他老丈人的房子的抵押在这笔高利贷里。事发后，债主将王艳一家告上法庭，法庭从中调解，如果年底还不上，两处房子都将收回。

王艳一家所有的期盼都集中在讨债上。“欠我们的钱，足够还我们的债了。”李绪义的父亲李恩海告诉我，“我们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把钱要回来还上，我们不欠别人，儿子也能在牢里安心改造。”除了虎庄项目的十几万元，他们的主要精力都在鹤北的保障房上。

讨债的生活从2013年便已开始。王艳和老伴最初住在10元一天的地下旅店，房间只容安置一张床，经常一天只吃一两顿饭。“见林业局局长要排队，经常是上午见不到，下午也见不到，一天天就耗过去了。”她对我说，趁着闲工夫，她甚至织了一条两米多长、一米多高的刺绣。无可奈何，他们把鹤北林业局告上法庭。

经过争取，王艳要求开具框架结构使用费用的评估报告。王艳告诉本刊：“评估报告去北京开，要4万块钱的评估费。开始林业局答应出。但报告出来后，他们又反悔。我们只能自己筹钱。”李绪义出事后，王艳向朋友借了2.4万元，剩下的1.6万元遥遥无期。“拿不到评估报告，官司就打不了，欠的钱就拿不到。”本刊联系鹤北林业局，林业局回复，按照招标书，林业局与润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对工程改造行使权力，其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讨债迟迟没有结果，审判当天，王艳一家在客厅里商讨策略，陈莉要出去打工，老两口不让。“孩子上学，我们辅导不了，又是叛逆期，我们也不敢说。”下周，两位老人打算拿着农药去鹤北，一人一瓶，他们告诉法官，不还钱就死给他们看，“一了百了”。而此时，他们的孙子就在隔壁，咳声时断时续。■

（文中李恩波、陈莉、李恩海为化名）



豫章书院：一场荒诞沉重的闹剧

记者 / 王珊 摄影 / 蔡小川



2



3



4

1. 11月5日是家长接待日，图为家长在豫章书院外等待学生下课

2. 在豫章书院等待了四个月的许平

3. 学生口中的“龙鞭”

4. 小黑屋，每个学生刚进入书院都要在里面关3~7天

虐待学生、打戒尺、体罚、关小黑屋……豫章书院事件被曝出来后，家长不仅没有声讨学校，还拉起横幅，在书院里面高喊：“书院加油！书院挺住！”一场灰色沉重的闹剧，打着拯救问题孩子的名义，将父母的无知、无奈，孩子的叛逆、反抗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嘴脸显露到极致。

两种面孔

许平好像有两张面孔。在媒体和学生组成的豫章书院微信群里，他是最活跃的学生。他积极声讨豫章书院“不人道”的行为，诉说自己的经历；会去查一些类似“黑监狱”“集中营”等具有明确指示意义的词汇，然后将其概念分享到群里；他甚至还在微博上联系了一个律师以寻求援助。然而，现实



左图：豫章书院
院校长任伟强

右图：豫章书院
的一名前教官

世界中的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

见到许平是在南昌医学院，初定的见面地点是操场上。然而，刚一谋面，他就变换了主意。“我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地方，不然没有办法交谈。”他有点抱歉地告诉我。在我看来，偌大的操场上零零散散坐了几个人，已经足够空旷。而且，阳光洒下来，照得人暖洋洋的，也算是个不错的聊天地。许平执意带着我和摄影记者从一座教学楼的底层一层层探寻到了楼顶——几乎每个自习室都有两三个人，不能让他满意。在近半小时的仔细筛查下，他最终将我们带到了食堂二层一个角落。这时正是下午3点钟，午饭的人群已经散去，距离晚饭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吁了口气，选择了一个背着入口的椅子，坐了下来。

“我敢保证进入豫章书院前，我是一个阳光的小孩。”许平今年24岁，2013年9月，他被父母送去豫章书院学习，待了四个月左右。他的整个身体前倾着靠在桌子上，脑袋低垂，双手互相用力握着，整个谈话的过程都未曾松弛；一项仿佛永远都不会摘下来的鸭舌帽遮住了他神色慌张的眼睛以及不断

跳动的下眼睑。显然，他很难平静下来。就在刚刚寻找采访地的路上，他路过了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简易棚，门是七八十厘米的铁栅栏。他迅速地冲了上去，摸着铁栅栏上的门锁指给我和摄影记者看，“（豫章书院的）小黑屋就是长这样，只是这个栅栏上没有蒙塑料膜。”他的身体在颤抖，恨与怕都写在脸上。

豫章书院全名豫章书院修身学校，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濡溪村。从市区开到书院需要40多分钟。我们的司机师傅开了三年多的出租车，却从未来过这里。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难说清楚学校是干什么的，“很神秘，大门天天关着，听说是改造学校”。

南昌青山湖区官方通报中称豫章书院为2013年5月16日成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豫章书院的官网介绍中提到了学院的招生类型：沉迷网络游戏、厌学辍学、离家出走、早恋叛逆、习惯不良、性格缺陷、暴力倾向、心理偏差等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一般不良青少年行为。凭借着国

学育人的名义，豫章书院曾以风光无限地正面形象上过央视等多家媒体。

面向村庄的大门仅是学校的第一道防线，进去之后，一堵四五米高的高墙和红色的大门又将书院划分成内外两个世界，外面是校委会以及家长等候和接待区，里面是学生上课、吃饭、军训的地方。红色的大门很少打开，也不需要，只有男生出去扔垃圾或者有重要领导和记者采访的时候大门才会开启。平常的时候，学校老师经由校信息会的一侧小门进出。

在这个关起来的大门内，书院的负责人吴军豹被尊称为山长，这是历代对于书院讲学者的敬称。山长之下有校长，其次是副校长、主管、导师等，学生里还会选出女生校长、男生校长。“在这里，吴军豹是国王，他的老婆是王后，而我是最底层的奴隶。”许平说。



被抓进去的问题学生

许平是被抓进豫章书院的。他记得很清楚，2013年9月的一天，晚上8点钟有人敲门，他父母过去开了门。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说有人高空坠物，有目击者称看到了他，警方请他配合去调查一下。许平觉得没事，就跟着出去了，家里人也没阻挡。

两个人架着许平的胳膊上了一辆七人座的面包车。在车上，警察模样的人将手中的电棍打开，发出啪啪啪的电流声。“我当时觉得，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坏人。”车子一路行驶，并没有到所谓的公安局，而是停在了书院的门口。对方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他要在这待上一年。许平在门口激烈地反抗，却敌不过对方人多力量大，他最终被丢进了小黑屋。“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存在。”

一位豫章书院的前教官也证实了许平的描述。他在豫章书院待了半年，曾多次出去抓人。“我们不会主动说自己是警察，但就是要给学生这种错觉。这样，我们冲进去抓人的时候，他们会很懵，来不及思考，只能跟着我们走。”这名曾经的教官告诉本刊，抓人的理由多种多样，比如如果学生沉迷于网络，就说他们发布了一些言论，需要做调查。这些都是跟家长商量好的，双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开门时佯装不认识。“家长会说，孩子马上就要出去了，出去就找不到人啦，我们就会即刻上去。”

教官们乐意出去抓人：书院工资低，抓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奖金，奖金几十到上百块不等，根据学生家距离的远近设定。“刚开始我们也不适应，但在奖金的激励下，也就这样了。有时候遇到活儿多，有的教官还会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

许平被抓进去的那天，与他一起生活的姥姥和姥爷被支出了家里。老人家有些不舍，但是又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里，女婿说了算。“他们父子俩就像仇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算命的说他俩命里水火不相容。”

许平从生下来就是“黑老二”，没有户口。都是公务员的父母将他放在姥姥家抚养，一直到了五六岁上小学才被接到家里。他羡慕姐姐，能够跟父母一起成长，但又对家充满了不适应。有一段时间，他每次一放学就会往小姨家跑，连续跑了一个星期。后来他的父亲在小姨家门口堵住了他，将他拎回了家，冲着他吼，还打了他，“这里才是你的家！”

他也看不惯父亲的一些举动，比如说给老师送礼。这让他觉得不舒服，且认为由于父亲找了与校长关系不好的老师，直接导致老师对他态度也不好。在他被同学欺负做出反抗后，父亲会当着老师的面打他。“他跟我没有感情。”许平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他希望获得支持，却又没有办法相信除了姥姥姥爷之外的其他人。他总会提到5岁前被父亲打的一段

经历。“他一只手拽着我的领子将我举到头顶，一只手拿着剪刀伸到我的嘴里，磨我的牙齿。”

对于父母，他的心中只有怨恨。他拒绝与父母交流，也不会去称呼他们，必要的时候才会用“你”指代。他换了好几所学校，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去上课。这愈发增加了他和父母的矛盾。“他这么大了，我总不能一辈子养着他吧。”他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平的姥姥说告诉本刊，“女婿从小就是被打大的，他觉得棍棒之下才能成才。他用皮带抽他（许平），疼得在床上打滚”。

许平变得暴戾而脆弱，他砸家里的墙，有一次还将凳子扔在姥爷的头上，“眼睛里都是凶气”。有一次，他爬到了楼上，站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哭，“我不敢死，不敢跳下去”。父母晚上睡觉都要检查门窗，因为害怕儿子晚上会杀了他们。从豫章书院回来后，许平的姥姥觉得他问题更严重了，“他每天就抱着一本英语书在那呆坐着，说要学英语，但连动都不动”。

和许多接受采访的学生一样，许平试图去淡化自己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很固执，但现在这样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跟父母都有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然而他们不愿意。”

在描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时，学生们会毫不吝啬地使用词汇。“豫章书院里就是一本宫心计，钩心斗角、打小算盘。”一个学生这样告诉我。他说学生里有吸毒的，有暴躁狂，还有混社会的，“还有一个是把人家女生肚子搞大了，家里没有办法，只能送到学校里躲一躲”。每天寝室熄灯之后，学生之间都会吹牛，“他们会说自己以前在外面多牛，去过哪里，打架的时候多么勇猛，交过多少女朋友”。打架在书院也是家常便饭，比如说，有的父母寄了好的衣服、鞋子过来，有人眼红，就会过去抢。

还有一个小姑娘告诉我，她逃学、不去上课，父母要把她送到武当山学武术。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她撕开床单，绑成绳子，从三楼爬了下去。她蜻蜓点水地描述了这个我只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情节，“我觉得父母大惊小怪了，谁青春不叛逆、不早恋啊！”

小黑屋里的恐惧

这群与父母和社会为敌的孩子，他们的阅历和经验尚不足以支撑他们看到未来生活的现实和真相。必须要承认，如果不加以约束，他们极有可能

步入歧途。2013年的一组数据显示，14~16岁年龄段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已经突破了50%；此外，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比重达到83.6%。但是，以暴制暴，真的有效吗？

小黑屋是学生进入豫章书院的第一道关卡。这是学生的通俗说法。在书院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烦闷室”。凡是进入书院的学生，都要被关在里面3~7天不等（自愿入学的除外）。几乎每个进来的学生都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内经历了反抗、挣扎到最终妥协的过程。

校信息办的章伟告诉本刊，“烦闷室”的设置学自日本的“森田疗法”，设置小间，学生独处，是为防止问题青少年“自杀、自残、伤人、毁物”。“通过这个环节，能够让孩子的心态和情绪进行一个沉淀，对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和行为进行一个反思。好比盛有浑浊水的杯子，慢慢地浑浊物沉淀下去，上面的水会变得纯净。我们会安排24小时的老师陪护，还会安排心理老师进行干预。”

在采访中，本刊发现学校承诺的心理老师辅导几乎没在小黑屋出现过。学生多数刚进到学校就被关了进去，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会有学校的教官在旁边的办公室看着他们，以防止有自杀行为出现。“教官们基本是在隔壁玩手机，没有人去管他们。你就听着他们在屋里叫喊、踹门，然后渐渐没了声音。”一个曾经的豫章书院教官告诉我。

每个人在小黑屋的经历又有些不一样。许平进去的时候，小黑屋的灯坏了，他只能依靠墙上一个小小的窗户透出的光亮来判断白天与黑夜，到了第四天之后，他再也分辨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一个在里面待了大半年的女生则在灯光照射下待了七天，“开关在外面，我要求关灯，他们不同意”。为了打发时间，有的人会选择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踱步，有的则是对着早晨发的一个鸡蛋讲故事，还有的则是躺在肮脏的军用被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女生想办法将墙上的空调拽了下来，利用摔下来的零件划了自己的动脉。

“我称这里是地狱。我觉得只要等到我出去，接触到外面的人，就可以回到文明的社会。”许平不断地安慰自己。在豫章书院的四个月内，许平彻底崩溃了。她的姥姥曾去看过他，“他哆哆嗦嗦地挨着墙边，都不敢看我。接回家的时候，又脏又臭，站都站不住”。

在11月5日的媒体和家长开放日，我参观了

小黑屋，这个在学生口中惧怕、憎恶的地方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墙上新刷了一层浅绿色的漆，但依然遮不住斑驳的墙面。一个学生告诉我，原来墙上写满了“放我出去”“这里好可怕好恐怖”“我要离开这里”等字眼。地板是新铺上去的，原来水泥地上的老鼠洞已经不见了踪影。小小的蹲坑厕所被一块板子遮住，肮脏的军用被也已经被清除出去。在这里，很多人做过类似的梦，梦见自己出去了，但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在这里，“很绝望”。

参观完后，我收到了学校负责人吴军豹的一条短信，他说：“王老师，（小黑屋）两间都有厕所，你可能没有看到，你微博说一间有，一间没有是不准确的。”短信有些莫名，我也不使用微博。但那种语气，好像禁闭室因为多了一个厕所，就变成了高档酒店似的。

戒尺与龙鞭

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所所长郭开元带领团队做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状况调研的时候已经发现，大批的类似于戒网瘾的特训学校就已经出现，不少存在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最为常见的即是用欺骗的手段将孩子送到矫治机构，并采用封闭式管理限制其自由。当时，一家知名机构的负责人曾告诉郭开元，其接收的95%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进去的。“豫章书院跟当时的戒网瘾学校换汤不换药，现在只是把招收学员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戒网瘾，还接收吸毒、逃学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虽然包含国学教育的内容，但其实质仍是一种特训学校。”

“一些矫正机构会将孩子的问题单纯或者过多地归结为未成年人自身的问题，认为孩子要为自己的行为偏差负责。”郭开元的团队曾遇到过一个小女孩，她在哭的时候被教官这样批评：“有什么好哭的，在这儿明明就是受折磨的，谁让你在家不好，再哭也没人会相信你。”而他们接受的惩罚则包括关小黑屋、教官的殴打、利用戒尺等工具的体罚等等。

豫章书院也不例外。接受采访的每一个学生都向我讲述了他们被打戒尺的经历。一个在书院待了一年多的小姑娘挨了10个打戒尺是因为《豫章书院修身科讲义》的内容没有背出来。另外一个小女孩则是因为早起了几分钟违反了书院的规矩。最为常见的原因是男生和女生之间有眼神接触，便被视为

“眉目传情”，只打女生。“书院崇尚男尊女卑，比如说吃饭要男生先打饭，随后才是女生。”

女生要学习女诫：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女生向我展示了她需要多次学习的课本，在女诫这一张，“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2个字被列为重点写在文章的开头。“每次考德（即考试）的时候，老师会问文章重点是什么，是什么意思。答不上来就戒尺伺候。”很多人的背诵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行的。双手撑在地上，双脚搭在床沿，背不下来，就不能停。在多种手段的督促下，我接触过的每个孩子都能对这本书做到信口拈来、倒背如流。

李峰曾在书院担任教官，第一次使用戒尺打人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对方是一个小女孩，吃了男生给的东西，被判打15戒尺。他没忍心，装作很大劲打下去的姿势，手上却留了力气。校长任伟强看到了，一把夺过去了戒尺，冲着女生的手心打了过去。“刚开始我们也不忍心，但是别人打你不打的话也说不过去，毕竟我们拿别人的工资。”李峰在担任教官期间，主要负责“破零班”的管教工作。这个班级是把一些特别难以管教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进行训练，包括跑步、深蹲、蛙跳等体罚，“体罚时间的长短，完全看教官的心情”。

让学生们学乖的另外一个工具被称为“龙鞭”。在众多学生的口中，这是一个长度在一米二左右、有小拇指粗细的钢制品。在豫章书院开放日，我在陈列台看到了传说中的“龙鞭”，上面标注了具体的构造成分，竹碳纤维。龙鞭在豫章书院是权利的象征。在这里，只有两个人有决定使用龙鞭的权利。一是山长吴军豹，一个则是校长任伟强。只有在他们俩签字之后，才能够“开龙鞭”。

魏宏挨打是因为自杀。和其他学生被抓或被骗进书院的情节不同。她是主动要求进入书院读书的。读初一的时候，她遭遇了校园欺凌，有社会小混混要她交保护费，每次100块钱。魏宏两个星期的早餐费用是109元，为了交保护费，她不敢吃饭。后来时间久了，她连学校都不敢去。父母只是觉得女儿变得暴躁不可理喻，双方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也是无奈的情况下，她跟父母一起选择了豫章书院。来考察的时候，他们看到学生弹古筝、写书法、跳舞，“觉得生活好丰富”，父母一口气给她签了三年的协议，每半年需要缴纳三万元的学费。然而，家人走后，什么都变了。老师收起了笑脸；老生郑

重地给她介绍了学校的三大高压线：不能辱骂顶撞师长、不能打架、男女生之间要保持距离。作为新人，她在寝室要承担其他老生的劳动，包括擦地板、打扫卫生，她还帮女生们洗过内衣。略有反抗，就会被打小报告挨戒尺。“坐姿不端正也会被抓，军训的时候汗流到了眼睛揉一下也会被记过，我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我。”

两个月后，魏宏尝试自杀。那天，学校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他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里，每个人发了一个小瓷杯子喝盐水。魏宏打碎了瓷杯子，用碎片在胳膊上划，血瞬间流了出来。“我本来以为学校会重视送我去医院。没想到直接被关了小黑屋，也没有给处理伤口。”第二天，她就被拉出去打龙鞭。她趴在水泥地上，两三个人按着她的手脚，任伟强亲自打。“我现在还能记得他笑的时候的表情，我当时发誓出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炸平。”

都是演戏

书院校长任伟强显然很满意这种封闭带来的效果。“如果把教育和医学类比，那么中考高考是养生的话，我们的教育可能就是针对疑难杂症的教育。”他还举了两个案例：一个14岁学生有网瘾，每个月在上面有几万块花费，在跟父母要钱未果的情形下，他将刀架在了父母的脖子上；另外一个女生早恋，离家出走，再次回到家里已经怀孕。官网声称，书院已经有3000余名成功案例。

接受采访的多数家长都觉得书院是有用的。李玉来自青岛。她的孩子15岁，进到豫章书院已经两个月。此前，她的儿子因为不情愿去看心理医生，将驾驶座前移，把正在开车的她困在座椅上。“我能够感受到孩子给我打电话时的谦卑。”她已经很久没有接收到来自孩子的善意了，以前没说两句孩子就觉得她叨叨。“我在孩子眼中看到了希望，他眼睛变明亮了，胖了十几斤。”

李玉说，每次来探望，孩子都会拉着她的手介绍书院的老师给她认识，“他充满了感恩之心，会一一详细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是怎么帮助他的。”她还讲了一个例子。一次开放日，家长带来了比萨。李玉的儿子把第一口给了她，第二口给了妹妹，然后给同学分了分，“最后剩了很小一口才塞在自己嘴里”。更多的家长沉浸在儿女主动的拥抱里，“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和她妈妈注意身体”。



不过，在学生的描述中，这些都是演戏。一个学生将豫章书院比作《飞越疯人院》里面的五六十年的美国精神病院。他提到了可怜的主角麦克·墨菲，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他的很多功能，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性格也因此丧失，不再能跟社会规范作斗争。豫章书院的孩子按照书院的要求起床、吃饭、说话，给父母写信，只是为了及早能够从这个王国逃离。“我真的很努力地去表现好，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我只想被父母接走。”一个女生对本刊说。

没有人愿意相信，孩子在豫章书院受到了暴力



家长当众读信表示对书院的支持

对待。即使抽打孩子的戒尺和“龙鞭”就摆在门口的展柜里。11月5日是豫章书院的家长接待日，李玉指着媒体激动地挥着手，“你们说惩罚体罚，我们都了解过。我不管违法不违法，我愿意。我们知道这个度在家长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相信你们说的不是事实。”

一个家长则认为是孩子在说谎。他举了女儿的例子。他的女儿18岁，在书院想逃出去，就佯装吃了药，并把肥皂水涂在嘴巴上。学校的老师带她去医院洗肠，她想要逃走却被老师发现。老师只好将

两人的手捆绑在了一起。“书院如果关门了，我的孩子去到哪里去，他能够适应学校吗？他会被打回原形的。”几乎每个父亲或者母亲都忧心忡忡地，“我们真的拿孩子没有办法啊。我孩子送这里好好的，过得挺好的，现在突然要说关门，那我们往哪里送，送你家去啊！”

一名女性家长又流起了眼泪。她的女儿喜欢打游戏到了不吃饭不睡觉的地步。这位家长低下头，突然抬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满是敌意，“我女儿就是这样看我的！”我发现，事实上，很多家长在

将孩子送到豫章书院接受洗脑教育的时候，本身就已对自己进行了一轮洗脑，即相信书院可以拯救孩子。“孩子小，不知道将来要面临什么，但我们作为家长不能看着孩子流浪在外，过一天是一天。”

郭开元理解父母所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和无奈。“现在青春期孩子面临的问题比以前更加复杂。比如说逃学，他不只是单纯的逃学，可能去上网、吸毒或者从事其他不良的行为，这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方面跟孩子的性格有关系，一方面涉及成瘾的问题。”

然而，一些曾经将孩子送到豫章书院的父母，基本选择了沉默。“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错了也已经发生了，提起来还有什么用。”他们的孩子则偷偷地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却很少跟父母去提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可能其中一个化名就是我。”一名学生如此说。

选择专业的矫正

事实上，家长们并不知道，他们眼中救世主一样的吴军豹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名曾经在豫章书院做内务的年轻人告诉我，学校的肉菜是他们去菜市场捡最便宜的买的；洗发水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都是假冒伪劣的；学生们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都已经传了好几拨人；书院大门旁边的烂木头是用来给学生修床板用的。“我自己从来不在书院吃饭。”他说，在对待学生上，吴军豹是典型的糊弄。“女生浴室没有门，我曾经跟吴军豹说过，装扇门，最终只钉了两块布。如果有人上去，是能直接看见浴室里面的。”

学校没有清洁工，所有的卫生都是学生负责。一个女生最喜欢的事情是洗盛食物的大餐盘，因为“可以吃到剩下的菜”。学校也不提供洗洁精，清洗也只能是冲干净上面的菜叶、米粒，“反正也吃不死人。”女生这么安慰自己。因为吃不饱，她经常跟同学一起去食堂偷东西，西红柿、黄瓜甚至白糖，偷来就立刻吃掉，不然被发现要挨打，“放在肚子里最安全”。她还吃过用生了虫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很多人以为是杂粮，直到有人惊讶地发现有虫子，她还是吃下去了，“不吃会很饿”。

在这次采访中，只有一个家长选择站在孩子的这边。2015年6月，李凤将儿子送到了豫章书院。两个月后，她去看儿子，发现儿子的体重从200斤

掉到了150斤。她执意把孩子带走，回到家却发现儿子陷入了极度恐惧的状态。李凤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儿子会随身带个刀，大声问她“要带他去哪儿”。有时候，他会突然掐住心理医生的脖子，质问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装的？你是不是想把我关进去？”

“我的儿子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她打电话质问吴军豹。吴军豹蜻蜓点水地回她：“你这是生米做成了夹生饭，还没到时候。我叫你不要提前接回来，提前接回来没有好的，你再给送回来吧！”后来，她追问得越来越多，吴军豹索性回复她：“我们就是少管所，我们是为社会做贡献，让社会上少了那么多犯罪的。”“我的孩子是罪犯吗？”她没法接受吴军豹的说法。

在调研中，郭开元的团队发现。“很多父母其实知道孩子在矫治过程中受到惩罚，甚至是很重的体罚，却大都接受或者同意。他们觉得孩子自控能力差，做错了就应该得到惩罚。而他们却忘记，孩子的问题跟家庭和社会都分不开。”郭开元说。

事实上，很多矫正机构反而会起到负面的作用。郭开元等人发现，一名15岁的少年在接受矫治之后，又沾染了抢劫、敲诈、吸毒等新的恶习。他告诉郭开元的团队，每次有新学员加入，老学员都会对新学员进行敲诈勒索。“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正应该是全面和专业化的，应该由专业的专门学校来进行。”郭开元说。

专门学校，过去称为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教育矫治的学校，始于1955年。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0多所专门学校。《宪法》和《教育法》规定，未成年人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未成年人一旦出现了严重不良行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就不适合在普通学校上学。这种不适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需要进行矫治，而普通的学校没有专门的矫治手段；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学生继续留在普通学校，也会干扰正常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不过近年来，专门学校逐渐减少，到2016年底，全国专门学校有90余所。

郭开元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专门学校严格的招生制度。一直以来，专门学校坚持的入学标准一直是“三满意”，即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建议，家长同意，孩子本人愿意。然而一般原就读学校推荐

之后，家长和学生方面很难同意。“专门学校很大程度上被标签化了，很多家长认为那里是关少年犯的地方。学生进去之后会学得更坏、交叉感染，所以不愿意将孩子送进去，而会选择打着国学等名义的机构。不良行为的纠正很困难，需要专业的手段，以及父母、学校、孩子三方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即使家长同意了，学生的同意问题也很难解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在某些情形下，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然而法律对于孩子坚持不来就读的情形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对于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而没有来就读的，应该规定强制性的就读条款。”这也是郭开元等人一直呼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专门学校甚至没有学生就读。这很可惜，专门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专业的能力。”

从豫章书院出去后，许平才知道，书院还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给他下蒙汗药。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几乎每次探望的时候，他都要给父母或者外婆手中塞纸条，让他们救他出去，但是父母并不搭理他。他们坚信学校的说法：这是孩子的正常反应。最后还是因为外婆的苦苦哀求，父

母才将他接了回来。

自豫章书院出去后，他几乎不跟他们讲话，从来没有主动去叫过他们，必要的时候，都用“你”来指代。每天晚上，他都会从噩梦中醒来，然后在房间里大叫。“我恨，如果不叫出来，我觉得自己会炸掉的。”而他的父亲，依然坚持，“如果豫章书院不出事情，我还是会把他送进去”。

从豫章书院回来，李凤的儿子曾三天三夜没睡着觉。他觉得太不真实了。他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书院寝室的灯管，他觉得自己又回去了。然而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自己房间的吊灯，“这种转变的差异太可怕了。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梦见回家了。然而醒来却还在里面”。他正在和同学寻找律师，起诉学校。他们接受不了学校仅是被关停的结局，“我们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李凤看着儿子，很是心疼，她站出来接受采访，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从她身上吸取教训，“不要像我一样傻”。她开始认真地去想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教育方式。她会去上一些课程，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孩子。她的儿子却告诉我：“我不恨我妈，但是我们之间确实有了一些隔阂。”

（文中许平、李峰、魏宏、李凤、李玉为化名）

《读书》2017年第十一期目录

- | | |
|---|--------------------------|
| 吴真 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敖波先生 | 冯志阳 江南慈善与近代工业化 |
| 田本相 话说“话剧皇帝”石挥 | 钟志辉 齐梁新论 |
| 党圣元 赋在当代：体制、语言与夸诞 | 吴向廷 诗人如何忠于自己的时代？ |
| 申霞艳 “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 甘阳 张祥龙 吴飞 家与人伦关系
读书圆桌 |
| 李行健 遏制“语言台独” | 石小军 中世纪英国学校教科书里的世界 |
| 短长书 | |
| 娱乐与市场（曹南山）·《花甲忆记》中的人名误译（赵晓晖）·董时进的“乡村乌托邦”（熊培云） | 王洪喆等 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 |
| 赵京华 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 | 汪民安 艺术批评何为？ |
| 沙红兵 “开关脉络的历史抽屜” | 李皖 草东有多厉害 |
| 许纪霖 “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 孟昭连 再谈“之乎者也非口语” |
| | 读书短札 |
| | 写影本和摹帖 北窗读记（刘涛） |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1968年4月，聚在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听歌的人们。1967年嬉皮士运动爆发之后，美国突然涌现出一大批自称“潮人”的年轻人



(视觉中国供图)

嬉皮士运动 五十年

主笔 / 袁越



【视觉中国供图】

1967年3月26日，一些嬉皮士聚集在洛杉矶艾丽西亚公园参加活动，庆祝“爱与和平”

今年是嬉皮士运动爆发五十周年，虽然当年那场运动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宣告失败，但在随后的这半个世纪时间里，嬉皮士精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国人一定听过这首名为《旧金山》的歌，当年很多中小学校的英语老师都把这首歌用作教学辅助材料，在课堂上放给学生们听。不过，这首歌曾经被教育部禁止过，据说是因为某位官员发现这是嬉皮士运动的圣歌，而那场运动是美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标志，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必须承认，那位官员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这首《旧金山》出版于1967年5月13日，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排行榜热门单曲，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受到这首歌的诱惑，从美国各地赶往旧金山，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大型行为艺术表演，向全世界宣告了嬉皮士运动的诞生。

今年是这场运动爆发50周年纪念，让我们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看看嬉皮士们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波及到整个世界的。

被嬉皮士改变的美国

嬉皮士运动之所以被某些人认为是美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标志，就是因为这场运动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

这三样东西当中，摇滚乐的确是美国特产，但它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比嬉皮士运动早了将近20年；毒品这东西的涵盖范围很广，如果算上毒蘑菇的话恐怕得追溯到人类起源的年代，即使我们只讨论现代意义上的大麻，最早也是在欧洲首先火起来的。一批法国作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大麻的尝试，巴黎甚至有一个“印度大麻俱乐部”，其会员包括波德莱尔、大仲马和巴尔扎克等许多著名作家。至于说性解放，那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看跟哪个时代或者哪种文化相比，美国人在这方面可绝对不敢说自己走在别人前面。

既然如此，嬉皮士们凭什么说自己是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的代言人呢？这就要从嬉皮士的英文名说起。

嬉皮士的英文名Hippie其实就是Hip加上后缀ie，意为“小一号的Hip”。而这个Hip在字典里的意思是指人的髋部，但它曾经还有另一个含义：被用于形容那些吸鸦片烟的瘾君子。这些人通常都是侧躺在床上抽鸦片，髋部总是高高突起，因此得了这个绰号。

上世纪40年代，Hip这个词突然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流行开来，被用于形容那些经常站在流行风潮最前沿的“潮人”。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词的流行必须要感谢爵士乐，美国爵士乐手们喜欢把技术高超的同行称为Hip或者Hipster，原因很可能与当时的纽约爵士圈流行吸毒有点关系。

上世纪40年代的纽约爵士圈以黑人乐手为主，但粉丝则多半是白人文艺青年。他们从爵士乐中找到了灵感，开始写一些极具自由精神的诗歌和

小说，这就是文学历史上著名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的由来。

垮掉派作家们自称“垮掉”，其实是一种自嘲。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沉闷无聊的，人们在为世俗的东西，比如金钱、汽车和房子等拼命劳动，结果却生活在一种被世俗所规定的乏味生活中不能解脱；他们不相信人为的道德标准，而是认为个人自由是崇高而不可侵犯的；他们吸毒不是自甘堕落，而是为了寻找人类潜意识的奥秘；他们之所以崇拜黑人爵士乐手，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有一种比白人更自由的精神，爵士乐是对传统艺术的叛逆。

叛逆是垮掉派的精神内核，这一点在垮掉派文学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把自己和好友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在美国流浪的经历写了出来，整本书采用了梦呓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似乎是没头没尾的故事，读者完全不知道两人为什么要上路，在路上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结果这本书刚写成的时候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它实在是太另类了，和大家熟悉的传统文学背道而驰。

除了凯鲁亚克之外，垮掉派另外几位主将，包括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以及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也都是非常小众的作家。外人借用了爵士圈术语，称他们为“潮人”（Hipster），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嘲讽，属于贬义词。

1967年嬉皮士运动爆发之后，美国突然涌现出一大批自称“潮人”的年轻人，宣称自己是垮掉派的后代。和前辈们一样，这些年轻人也吸毒，也不爱工作，也反战，也对现有社会制度表示不满。但和那些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的老垮掉派们不同，新一代年轻人口口声声说的只有一个字：爱。这是一种无条件、无节制的爱。他们反对一切组织，左派激进组织也不例外；他们反对一切清规戒律，讨厌被别人管，同时也对身外之事一概不闻不问；他们对所有人都十分友好，天真得在“正常人”看来几近傻帽；他们喜欢享受，尤其是性方面，更是格外开放。这就是为什么老垮掉派们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绰号，叫他们“嬉皮士”，即“小一号的垮掉派”。

换句话说，嬉皮士的本质和垮掉派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数的多少、年龄的差异、“垮掉”程度的深浅，以及大众媒体关注程度的高低。垮掉



(视觉中国供图)



1. “垮掉派”文学主将之一，诗人艾伦·金斯堡

2. 1967年12月9日~10日，大约4000名嬉皮士聚在柏林参加一场名为“嬉皮士鲜花”的聚会

3. 1967年，旧金山街头的嬉皮士

派元老们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终于在6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共鸣。

表面上看，嬉皮士运动很像一朵昙花，仅仅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有过一次短暂的绽放。但是，当年聚集在旧金山的嬉皮士们可绝不仅仅是旧金山本地人。事实上，1967年夏天涌入旧金山的10万年轻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的其他地方。没错，他们是被美国的媒体忽悠来的，但“爱之夏”结束之后，他们纷纷回到家乡，把他们从旧金山那里看到的景象、学到的知识和继承的精神扩散到了整个美国。从此美国不再是50年代的那个保守老派的美国，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成了美国人的新常态，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被嬉皮士改变的世界

“爱之夏”只持续了一个夏天就结束了，但是嬉皮士运动在美国掀起的风暴很快就扩散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被抗议的浪潮所淹没，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齐心协力，把1968年变成了历史学家公认的全球抗议年。

但是，无论是巴黎的“五月风暴”，东欧的“布拉格之春”，还是南美大陆巴西和阿根廷独裁政府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反战运动和以暴制暴的黑豹党，都是动机单纯、纲领鲜明、目标明确的政治运动，和嬉皮士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一场纯粹的文



2



3

化运动，针对的是欧美主流文化中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标准，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比如，过去的欧美主流社会对人们的穿衣打扮和行为操守有着严格的要求，男人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胡子和头发都必须每天打理，行为举止都要像个绅士。对女人的要求甚至更多，比如只能穿裙子不能穿裤子，出门前必须化妆，头发也要保持一定的长度，公开场合严禁举止轻佻，一定要表现得像个淑女。嬉皮士打破了这些规矩，从此男人也可以留长发了，女人也可以穿长裤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不再有人指手画脚。

再比如，嬉皮士不再把欧洲文化传统视为唯一“正确”的文化，而是主动拥抱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是受到欧美嬉皮士们的青睐，其结果就是瑜伽和禅宗在全世界的兴起。事实上，种族歧视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人人喊打，原因绝不仅仅是种族歧视政策的废除，更是因为广大普通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度越来越大了，这一思想的根源就来自嬉皮士运动。

不过，嬉皮士运动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文化观念的解放，而是环保思想的普及。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的，欧美国家从这种竞争中尝到了甜头，甚至

不惜用武力来捍卫这种竞争的自由。再加上一大批欧洲哲学家曲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其用于人类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残酷的竞争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了我活，自然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不存在。

嬉皮士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一套思维方式，不再把你死我活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结局，而是把博爱精神当作最高准则。就像那首《旧金山》里唱的那样：

在那座城市里
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
对于想去旧金山的人来说
这个夏天充满了爱的阳光

既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亲如一家，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便不再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而是如何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美好，现代环保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现代环保运动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们全都和嬉皮士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个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遗传学家琳·马古利斯 (Lynn Margulis) 在1966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内共生学说的论文，为现代环保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古利斯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 (Carl Sagan) 的前妻，她认为线粒体不是为了相互竞争而进化出来的，而是两种微生

物相互合作，各取所需的结果。由此类推，她相信不同生物之间绝不都是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互惠互利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主旋律，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个物种相互之间都有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为这篇论文提出的想法太过超前，至少被15家不同的杂志社毙了稿，直到“爱之夏”那年才被《理论生物学杂志》接受并发表。这篇论文和当时流行的新达尔文主义唱反调，后者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正是嬉皮士运动所要反对的世界观。因此马古利斯和她的思想迅速被嬉皮士运动所接受，并促使嬉皮士们把自己的诉求从简单的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转向了环境保护运动。

旧金山嬉皮士运动的一名元老级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是这一转变的发起者之一。他是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曾经主持出版过一本地下刊物，名叫《地球索引》(*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书和当时多如牛毛的嬉皮士出版物不同，没有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幻想之中，而是为那些正在尝试搬离大城市，远离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嬉皮士们提供一本生活手册。书中列举了布兰德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所需的各种器物，并附上了购买信息，非常实用。

他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旧金山发起了一次公民请愿活动，敦促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向全世界公布宇航员从太空拍下来的地球照片。阿波罗登月计划让NASA的宇航员得以离开地球轨道，从更加遥远的距离拍摄地球。1968年，NASA公布了“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拍下的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让大众意识到地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如果不用心保护，人类就没地方住了。

这张地球照片发表后的第二年，一位嬉皮士活动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旧金山例会上提出了“地球日”的设想。这一设想在当年的3月21日在旧金山变为现实。此事直接导致每年的4月22日被定为“国际地球日”，来自全世界的环保人士都可以借此机会向公众宣传环保理念。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70年，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PA)，并制定了第一部《清洁空气法》，正式向空气污染宣战。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正是当年的那张地球照片促成了西方工业国家开始环保运动，并让“环保”这个概念最终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被嬉皮士改变的未来

“爱之夏”为什么只持续了一个夏天就草草结束了？答案是：它居然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简直就是奇迹。

旧金山是一个多山的半岛，扩展潜力有限，直到今天也只有80多万常住居民。1967年夏天，这座城市一下子涌进来10万多人，而且大都是毫无经济能力和生活经验的高中毕业生，这就大大超出了旧金山的承受能力。多亏一些民间团体主动伸出援手，每天定期发放一顿免费餐食，这才没有发生大面积饥荒。

不光是旧金山，当年还有不少美国城市也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嬉皮士运动，但也都没能坚持下去，主要原因在于嬉皮士们的核心诉求太过超前，当年的美国社会尚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

前文说过，嬉皮士的精神导师是上一代的垮掉派作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家群体，其中包括吃政府救济的流浪汉、男妓、小偷、花花公子、继承了家族遗产而无所事事的毒品瘾君子，以及靠贩毒活着的街头小混混等等一大批社会边缘人。要说反传统，有无数前辈曾经反过，但这些人反得比前辈们更彻底，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原则都要反对，比如勤劳、勇敢、诚实、负责、忠诚、爱国、整洁、健康和自律等等，在他们的字典里都成了贬义词，这就是垮掉派和其他激进组织最大的不同。后者虽然也在抗议，但骨子里遵循的依然是相对传统的价值观，只是对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不满而已。

那么，这些垮掉派们到底要什么呢？他们要的是对身体的绝对控制和精神上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们提倡一种没有任何义务和牵挂的绝对自由，于是他们拒绝工作，甚至不惜放弃“体面”的生活而流浪街头，勇于尝试吸毒和自由的性爱……总之一句话：他们想要改变人的定义，他们希望人不再是一种只知道劳作却没有灵魂的低级动物，也不再是某个集体或者主义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存在，一种只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而活着的高级动物。

于是，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们垮掉了。

其实，说到反传统，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传统就必然会有反传统，这事并不稀奇。说到精神解放，物质和精神的对抗古已有之，同样也不稀奇。事实上，反传统和精神解放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一战”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莫德里斯？

埃克斯坦斯 (Modris Eksteins) 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精辟的描述。

在埃克斯坦斯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源于欧洲新旧两股势力在 worldview 上的巨大冲突。19 世纪末才崛起的德意志不满足于英法两强对欧洲秩序的控制和垄断，指责英国人和法国人是一群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提倡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等等都是虚伪的谎言。与之相反，德国人更为看重的是精神的解放和内心的自由，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状态，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可历史的发展证明，自以为反传统的德国最终却走上了反人类的道路，德国人刻意追求的所谓“诗意”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毒。

即使德国人的想法真的没有恶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足以支撑这种激进的想法，双方的矛盾最终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甚至一次战争还解决不了，需要打两次。“二战”结束后，欧洲元气大伤，美国趁势崛起，一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美国老百姓过了 10 年富可敌国的安逸日子，大批蓝领工人搬进了郊区新建的别墅，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就这样，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实现了全民共同富裕、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种安逸而又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让美国的年轻人心生厌恶，最终爆发了嬉皮士运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美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那种唯利是图虚伪浮夸的社会氛围的确会让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感到不爽。但是，当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挺不爽的，很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模仿垮掉派的文艺小群体，但为什么只有美国成功地把这种不爽扩大到整个人群当中，直至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呢？答案很可能在于当年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当中，只有美国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能让这么多年轻人一门心思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必担心找工作养家糊口。地球上那么多城市当中，也只有富裕和宽容的旧金山才能养得起 10 万个突然出现在街头的身无分文的高中毕业生，甚至还能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娱乐。

可惜的是，如此的高光时刻仅仅是一种假象，维持不了太久。一来美国的富裕得益于“二战”带来的战争红利；二来美国的黑人民众并没有富起来，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三来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

美国不可能一枝独秀，早晚会地球村里的其他村民拉下水。于是，美国对内开始了民权运动，对外卷入了“越战”，再加上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快就把美国人打回了原形。

因此，即使是富裕的美国也不可能让这么多年轻人长时间地不务正业，去追求什么精神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爱之夏”只维持了一个夏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嬉皮士运动也在苟延残喘了几年之后宣告结束，折腾了几年的美国年轻人们只好乖乖地回到学校读书，毕业后找一份传统的工作，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但是，虽然嬉皮士不存在了，但是嬉皮精神并没有死。相当一部分嬉皮士并不服输，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追求当初未能实现的理想。其中一部分人相信嬉皮士理想的破灭源于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他们试图利用新技术打破这一垄断，便搬到了旧金山南部的一座山谷之中，潜心研究信息的电子传播技术，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也造就了硅谷的辉煌。

另一批人则相信，人类之所以会被世俗生活所束缚，无法彻底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人类仍然需要有个工作才能养家糊口，而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毫无乐趣的纯体力劳动，人性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丧失掉的。于是他们潜心研究工业化和人工智能技术，设法把人类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加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批人的理想虽然还没有实现，但也已经初现端倪。事实上，已经有人开始思考“当人类不需要工作之后该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了。他们的答案是艺术。于是这些人每年都会在靠近加州的内华达州沙漠里举办一次艺术展，几万人无欲无求地聚在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在一片沙漠之中尽情展示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这就是已经举办了 32 届的“火人节”(Burning Man)。

虽然中文翻译为“火人节”，其实它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有很多人参加的大规模行为艺术，好似未来世界的一次沙盘预演。主办方每年夏天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的中央搭起一个巨大的人形木偶，来自全世界的参与者围绕着这个木偶创建一座临时城市，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临走前一把火将其烧掉，不留任何痕迹。这把大火极具象征意义，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嬉皮士心目中的乌托邦理想仍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只要坚持下去，这个理想世界终将到来。■



从“爱之夏”到“火人节”

主笔 / 袁越



（视觉中国供图）

9月2日，在美国内华达州黑石城参加“火人节”的民众

从1967年的“爱之夏”，到2017年的“火人节”，嬉皮士精神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丝毫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在新一代年轻人的手中发扬光大。

1967年夏天被历史学家称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因为那年夏天的旧金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爱”是那场运动的口号，故得此名。今年是“爱之夏”50周年纪念，我特意选在盛夏的8月来到旧金山，寻找当年那场运动的遗迹。

和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不同，美国很多大城市的街景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怎么变过了，旧金山即是如此。市内著名的旅游景点唐人街、九曲花街和北滩都没有太大变化，当年嬉皮士聚集的“海特区”更是保留了原来的样子，几家著名的嬉皮商店仍在营业，就连卖的东西也和当年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

“老嬉皮士们都搬走了，他们可付不起3000美元一个月的房租。”一位正在美景公园（Buena Vista Park）里遛狗的中年人对我说，“如今只有极少数有历史价值的老房子被划为古董建筑，房租没怎么涨，里面还住着几个老嬉皮士，其他老房子全都变成在附近高科技公司上班的年轻白领们的公寓了。”

这个美景公园其实就是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包，紧挨着当年嬉皮士聚居地海特区。旧金山市政府将其保护了起来，成了当地居民休闲放松的地方。不远处还有一个更大的公园，这就是著名的金门公园。公园呈长方形，几乎横跨整座城市一半的距离，和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座著名的城市公园内部都没有太多人工景观，保留了很多野趣，住在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们只要稍微走几步就可以置身于乡野之中，和大自然保持联系。

我从旧金山市中心出发，沿着公园内的一条步道一路向西，一直走到了太平洋海岸。途中经过了一个赛马场，我去的那天没有比赛，只有几个年轻人在玩山地自行车。这些孩子恐怕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视觉中国供图】

1967年，旧金山市区乘坐有轨电车，也就是有名的当车出行的市民。大量嬉皮士的涌入，引起旧金山当地居民的抱怨

件，由此揭开了“爱之夏”的序幕。

人类大聚会

1967年1月14日，天气意外地非常炎热。就在今天金门公园赛马场的这块草坪上，聚集了2.5万名各式各样的人。草坪的一角搭了个临时舞台，有几支乐队在表演，但大部分人根本不在意远处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要么和周围新认识的陌生人聊天，要么和心爱的恋人一起窃窃私语，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草坪周围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他们都想借此机会来旧金山看看传说中的嬉皮士都长什么样。组织这次活动的是一家名为《神谕》(Oracle)的旧金山嬉皮报纸，他们把这次活动称为“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也有人称之为“部落大聚会”(A Gathering of Tribes)，因为这家报纸把当时活

跃在旧金山湾区的各类地下组织都请来了，组织者想看看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能否聚在一起当面交流。

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2.5万个不同背景的人毫无缘由地聚在了一起，现场几乎看不到穿制服的警察，可人们全都彬彬有礼，气氛祥和，没有发生哪怕一丁点小摩擦。这个结果却让在场的记者们失望了，他们本来是打算来看热闹的，因为在他们熟悉的世界里，这么多不相干的人聚在一起，不是参加政党集会就是为了观看某个明星的演出。可眼前这个人类大聚会却看不出任何目的，大家似乎就是来这里坐一会儿，和陌生人唠唠家常，仅此而已。

记者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情况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了，因为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港口城市，19世纪中期开始的淘金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梦想家和冒险家来旧金山碰运气，复杂的文化背景使得这里没有一种宗教或者价值观能够主宰一切，居民们必须学会理解和宽容。

和旧金山遥相呼应的是位于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纽约，那座城市同样是移民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小联合国”，各种文化的充分交流使得新思想得以不断涌现，并在相对宽松的气氛里发展壮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新的文化现象都诞生在这两座城市的原因。

进入20世纪后，旧金山市中心也像纽约的曼哈顿那样慢慢发展起一个高楼林立的商业区。但和曼哈顿不同的是，这个商业区的西边保留了大量维多利亚式老建筑，尤其是以海特和阿什伯里（Haight-Ashbury）这两条街的交会处为中心的这片“海特区”，几乎全是这种两到三层的独门独院的小楼。这种维多利亚小洋楼原本是设计给一户家庭使用的，里面有许多不同大小的房间，后来阴差阳错变成了廉租房，吸引了大批学生和低收入者来此租住，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因为共用一个出口和厨房而不得不经常打交道，大家很快就亲如兄弟姐妹。又因为楼与楼之间距离非常近，邻里之间也相处融洽。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把整个海特区变成了一个大公社，旧金山的嬉皮士运动就是在这种和谐和宽容的气氛中慢慢发展壮大起来的。

“爱之夏”虽然只维持了一个夏天，但旧金山的这种和谐和宽容的精神却一直保留了下来。1986年夏至这天，一个名叫拉里·哈维（Larry Harvey）的旧金山居民和二十几个朋友来到金门大桥下面的贝克海滩（Baker Beach），当众焚烧了一座两米多高的人形木偶。哈维此举的动机不详，有人说是因为失恋，也有人说是为了艺术，但更多的人相信，这件事和当年的“人类大聚会”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所谓“意义”，就是一帮人闲着没事干，觉得好玩而已。

旧金山不但宽容了这个疯狂的举动，而且允许他们第二年又来烧了一次。这一次的到场人数扩大到了80人，人形木偶也变成了一座6米多高的巨无霸。第三年夏至那天，哈维居然召集了200人来参加活动。他为此制作了一个将近10米高的人形木偶，取名“火人”（Burning Man）。到了第四年，玩出兴致来的哈维又做了一个12米高的“火人”，可惜这么大的东西运输困难，途中把一条腿摔断了，因此1989年的那个人形木偶是跪着被烧掉的。

也许是因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或者是因为“火人”越做越大，旧金山警察局终于下了禁令，只允许哈维在海滩上举行仪式，不再允许当场烧火人了。

于是，1990年的“火人节”举办了两次，先是在贝克海滩上举行了个仪式，吸引了800个疯子到场狂欢，然后哈维把木偶运到内华达州的一处名叫“黑石”（Black Rock）的沙漠，在那里将其烧掉了，现场只有90人目睹了烧火人的全过程。

从此，这个每年一度的烧火人仪式便改在黑石沙漠里举行，参与人数逐年增加，今年一共来了7万人。大家都喜欢称其为“火人节”，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现代版的“人类大聚会”。简单说，这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陌生人每年去沙漠里共同生活一个星期，彼此分享一切，没有任何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展示自己最得意的艺术才华，一个星期后所有人员和物资都尽数搬走，绝不留下任何痕迹。

2017年8月底，我和几位来自中国的小伙伴专程飞到美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7万个“疯子”一道，合力上演了一场新时代的“人类大聚会”。

嬉皮导师和魔幻巴士

虽然主题是爱与宽容，但1967年的那次“人类大聚会”的主办方还是请了几位名人来压场子，其中一个身穿印度长袍的眼镜男最引人注目，他就是垮掉派元老之一的诗人艾伦·金斯堡。

金斯堡是个同性恋，有一阵子他疯狂地爱上了那个跟凯鲁亚克一起游遍美国的尼尔·卡萨迪，后者正是小说《在路上》的主人公迪恩·莫里亚蒂（Dean Moriarty）的原型。卡萨迪是个双性恋，当时正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卡罗琳住在旧金山南边的圣何塞。金斯堡一时冲动，从纽约开车到加州去找卡萨迪幽会，被卡罗琳抓了个现行。气愤的卡罗琳二话不说把金斯堡从床上拉起来塞进车里，一路开到旧金山，扔给他20块钱后把他丢在了那里。没想到这次“旅行”竟成了金斯堡一生的转折点，他很快发现旧金山的垮掉派运动不但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一家名叫“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平装书店。失恋的他正有一肚子话要说，便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长诗《嚎叫》（Howl），并在书店主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当众念了一遍。那次诗朗诵被认为是垮掉派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标志着垮掉派运动的核心从发源地纽约转移到了旧金山。

那天被请来压场子的另一位名人是一个身穿白



(黎越 摄)



1. 旧金山的反法西斯游行

2. 海特区有很多这样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3. 5月1日, 几名嬉皮士在旧金山北滩唱歌乞讨。今年是嬉皮士“权力归花”运动50周年

1

袍的中年人, 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他就是美国著名的致幻剂导师, 哈佛大学前心理学客座教授蒂莫西·利里 (Timothy Leary)。他对一种名为 LSD 的致幻剂尤其感兴趣, 甚至不顾校方的反对, 招募了一批哈佛大学的学生担任志愿者, 在他们身上研究

LSD 对人类精神状态的影响。

LSD 全名叫作“麦角酸二乙酰胺”, 是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 (Albert Hofmann) 在 1938 年发现的。这玩意儿又名酸剂 (Acid), 但它其实无色无味, 药效却又十分强烈, 只需几微克就能让人产生强烈



2



3

(摄影 摄)

出钱资助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下设的精神病研究所对其进行研究。一个名叫肯·凯西（Ken Kesey）的年轻作家应征去当志愿者，几个星期的临床试验显然给凯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他以清洁工的身份再次进入那家研究所，偷了很多LSD出来。他一边吃药一边观察医院里的精神病人，LSD帮助他进入了病人的内心世界，并启发他构思了一个关于精神病院的故事。

1962年，凯西创作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在美国出版，赢得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电影剧本这五项最重要的奖项，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的录像厅经常播放这部影片，宣传语上称“该片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医疗制度的黑暗和腐败”。这个说法有误导性，这其实是个寓言故事，那家精神病院代表的是传统的主流社会，尼克尔森扮演的男主角代表所有那些试图打破世俗世界清规戒律的垮掉派们，而那个酋长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

凯西用卖书所得的版税在旧金山以南约一百公里处的一个名叫拉宏达（La Honda）的山区买了幢独门独院的房子，把它变成了旧金山湾区垮掉派们开LSD派对的大本营。他还买来一辆1939年产的老式校车，在车身上涂满彩色花纹，车内配齐了一套乐器，车顶上则安装了无数个扩音喇叭，能够把车内的声音传出去。卡萨迪毛遂自荐担任了这辆“梦幻巴士”的司机，载着凯西和他的朋友们从旧金山一路开到了波士顿。这群人自称“快乐的捣蛋鬼”（Merry Pranksters），他们要去波士顿找利里，说服他加入他们的阵营。

当时利里已经因为私自拿学生做实验而被哈佛大学开除了，一位东海岸富商接纳了他，让他在一座庄园里继续研究致幻剂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但在凯西看来，这帮人成天打坐修炼，写实验笔记，简直就是一群刻板的老学究。他要把利里解放出来，大家齐心协力推广LSD。

这场不同风格的思想碰撞最终以凯西获胜而告终。利里在“捣蛋鬼”们的启发下突然开了窍，脱下西装换上长袍，摇身一变成了美国人民的精神导师。聪明的利里很会利用媒体，他知道一句响亮口号的力量要远大于长篇大论。那天面对台下2.5万

的幻觉，仿佛周围的一切物体都活了起来，随着声音的变化发出波浪般绚丽的色彩。更妙的是，LSD没有生理成瘾性，服药者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不留一点痕迹。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对LSD很感兴趣，



(杂志中国供图)

1

1. 1993年4月13日，肯·凯西与来他家拜访的学生们握手交流，他于1962年创作了小说《飞越疯人院》

2. “火人节”的创始人哈维

3. 美国著名的致幻剂导师、哈佛大学前心理学客座教授蒂莫西·利里（摄于1967年）

名听众，利里喊出了一句极有号召力的口号：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Turn On, Tune In, Drop Out）。他后来在一本自传中解释说：“审视内心”的意思是解放自己的感觉器官，审视内心世界，体会不同层次的知觉意识；“关注社会”的意思是关注周围的一切，让自己的意识与周遭环境相互和谐；“退出世俗”的意思是不再依靠外力，相信自己头脑中蕴藏的力量，依靠这股力量达到快乐的顶点。

美国的青少年们通过广播电视听到了利里的这句话，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三个短语背后还有那么多学问，他们只听出了两个意思：吸毒和逃避。其实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就这样做了，但从一个前哈佛大学教授嘴里说出来，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火人节”的创始人哈维显然也从利里那里领教了口号的力量，他为“火人节”制定了十项基本原则，即无条件接纳（Radical Inclusion）、互赠（Gifting）、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极端

独立（Radical Self-reliance）、极致的自我表达（Radical Self-expression）、社区精神（Communal Effort）、社会责任（Civic Responsibility）、不留痕迹（Leaving No Trace）、参与（Participation）和直接性（Immediacy）。

据“火人节”的另一位创始人哈蕾·杜布瓦（Harley Dubois）介绍，哈维最早只想出了九条原则，最后一条是为了凑整数而加上的，但后来却成了杜布瓦本人的最爱，因为这条原则道出了“火人节”的本质：只有亲身体验过才能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哈维的这个“火人节十项原则”规定得太具体了，比利里的那句口号啰嗦多了，一点也不利于传播。但也正因为如此，“火人节”得以保持了最初的状态，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偏离哈维当初的设想。相比之下，嬉皮士运动却因为缺乏管理而变得面目全非，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

虽然运动进行不下去了，但梦想还在。哈维本质上就是个老嬉皮士，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一次乌托邦实验，看看嬉皮士精神在新的时代里能否变为现实。事实证明这项实验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就连遥远的中国都有了很多人支持者。美国发达的公路网和方便的租车服务让我们这群从中国来的“火人”（Burner，火人节对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称谓）很方便地租到了一辆房车，买到了七天沙漠生活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我自告奋勇担任了司机，驾驶着这辆塞满物资的房车从旧金山湾区出发，一路开到了黑石沙漠。

到达时已是傍晚，我们跟随车流开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路上的浮土有十几厘米厚，像面粉般细软的尘埃颗粒从紧闭的窗缝中溜进来，很快就将大家的呼吸道填满了。小伙伴们纷纷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口罩戴上，但还是有人忍不住咳嗽起来，“火人节”的第一个挑战就这样突如其来地降临到大家身上。

酸剂挑战和迷幻摇滚

早年的旧金山嬉皮士运动是有门槛的，参加者必须首先通过一个“酸剂挑战”（Acid Test）才能正式加入。第一次挑战发生在1965年12月4日，那天恰逢“滚石乐队”在圣何塞开演唱会，演出结束后凯西带领一群“快乐的捣蛋鬼”在散场的人群中散发传单，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你敢来参加酸剂挑战吗？”

那天晚上凯西在一处借来的空地上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LSD派对，他把LSD混在饮料中免费发放给来宾，很多年轻人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这种致幻剂的厉害，为后来在旧金山发生的许多震惊世界的事件埋下伏笔。要知道，这些人此前只吸过大麻，那是一种较温和的毒品，药效远不如LSD。

在凯西看来，LSD药效强烈，又不容易控制，一旦服用就别无选择地进入长时间迷幻状态，因此服用者没法再像以前蹭别人几口大麻烟那么简单了，必须动真格的。为此他给这个活动取名“酸剂挑战”，一来通过挑战的办法吸引青少年来参加，二来也警告他们对待LSD必须格外认真，三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筛选出一批真心嬉皮的年轻人，保证了这项运动的纯洁性。事实证明这个门槛设立得很有必要，老嬉皮士们后来回忆说，真正的旧金山嬉皮士运动

开始于1965年的酸剂挑战，结束于1967年的人类大聚会，从那以后这项运动就变成了没有门槛的群众运动，质量每况愈下。

为那次酸剂挑战提供LSD的是一个名叫奥古斯塔·奥斯利·斯坦利三世（Augustus Owsley Stanley III）的怪人，此人年轻时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退伍后消失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去了



（视觉中国供图）

2



3

哪里。1960年初他重出江湖，搭上了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的女大学生，两人租了间公寓潜心研究，终于琢磨出了人工合成LSD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制造出的LSD比CIA拿到的样品还纯。

这个故事听着耳熟吧？没错，这个斯坦利就是美剧《绝命毒师》的原型。和剧中那个为了治病而被迫制毒的主人公“老白”一样，斯坦利也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坏人”。他入行的原因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推广LSD，他对LSD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相信这东西能把坏人变成好人。他给自己生产的LSD定价2美元一剂，从不涨价，而且他免费散发的比卖出去的还多。正是因为他的存在，LSD这才终于成为一种大众商品，普通人在大街上就可以买到。作为唯一的LSD供应商，斯坦利在旧金山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都叫他“旧金山市名誉市长”。

为那次酸剂挑战派对担任伴奏的是一支名叫“巫师”的乐队，乐队主唱兼主音吉他手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原本是一名乡村音乐爱好者，可自从他参加了一次凯西在拉宏达举办的LSD派对之后，音乐风格就完全变了。加西亚发现，进入迷幻状态的人最想干的事就是不停地舞蹈，这样的人是听不进乡谣的，他们需要的是节奏强烈曲调复杂的“助嗨”音乐，于是乐队改名“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摇身一变成了一支擅长即兴演奏的摇滚乐队，专门为湾区的各类LSD派对提供伴舞服务。

从此，一种崭新的音乐形式——迷幻摇滚诞生了。当年的旧金山涌现出一大批迷幻摇滚乐队，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感恩而死”乐队外，还有“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江湖骗子”（The Charlatans）和“大兄弟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等，后者的主唱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后来离开乐队单飞，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毒品和音乐是嬉皮士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助推器，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斯坦利同时也是“感恩而死”乐队背后的金主，他不但为那些派对提供了大量免费LSD，还花钱请高人为乐队制造了一套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舞台音响，音量极大却又不失真，长时间听也不伤耳朵。斯坦利还为乐队制造了很多新型的效果器，有时乐队成员自己也“高”得没法演奏乐器了，就让效果器发出各种怪声，居然很受听众的欢迎。

“感恩而死”乐队扩展了流行音乐的定义，从此流行音乐不再只是那种有旋律重和声的三分钟歌曲了，而可以是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即兴演奏，服用了LSD的听众反而会觉得后者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在这种音乐中彻底放飞自己。

这两个嬉皮士运动的助推器同样出现在了“火人节”上，只不过一个在明处，另一个在暗处。在暗处的当然是毒品，像LSD这样的强力致幻剂在美国仍然属于违禁品，名义上是不准使用的。大麻虽然已被内华达州政府解禁了，但黑石沙漠归联邦政府管辖，在这里吸大麻依然是非法的。不过据我观察，“火人节”现场仍然有很多人在偷偷抽大麻，也有少数人在使用更加厉害的毒品，巡警们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太嚣张就没人管。

在明处的自然是音乐。“火人节”现场能看到几十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花车”（Art Car），挂在车厢外的喇叭中传出的无一例外都是迷幻电子舞曲。此外还有一些固定的锐舞舞台，同样是以电子舞曲为主。这类音乐本质上和当年的迷幻摇滚是一样的，都是为迷幻剂服务的，不同的是当年需要乐队现场演奏，现在则是DJ打碟，音响效果比当年的迷幻摇滚好太多了，成本却大大下降了。

往大里说，“火人节”其实就是旧金山和圣何塞共同创造的一个新世界，本质上就是用硅谷的现代科技重新演绎海特区的嬉皮精神，两者的目标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火人节”现场能看到很多来自脸书和谷歌等高科技公司的员工。硅谷代替了海特区，成为了新时代的嬉皮士大本营。

从菲尔莫到蒙特利

当年的旧金山不但有垮掉派诗歌和迷幻摇滚，还有很多其他艺术形式也在这座包容一切的城市里生根发芽。比如漫画家罗伯特·克拉姆（Robert Crumb）创作的“仔普系列”（Zap Comix）风格独特，对后来的漫画风格影响极大。

戏剧艺术也在这座城市发扬光大，“旧金山街头剧团”（S.F. Mime Troupe）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剧团由一群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组成，专门在大街上表演讽刺戏剧，类似大家熟悉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剧团 members 们会像打游击一样突然出现在一处街角，用自己朴素逼真的表演讽刺某种现象，

宣传革命思想。观众不知他们在表演，经常会以为那是真的。最后，恍然大悟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教育。

这个剧团的经理人名叫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专门负责剧团的财务管理。其实剧团根本没什么钱可管，因为他们的演出没法收门票，只能靠演完后摆出来的捐款箱收些小钱，因此剧团成员都是些很有理想的穷光蛋。

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一直到1965年之前，旧金山的商业气氛还是很淡的，不但看戏不要钱，甚至那些迷幻摇滚乐队的演出也是不要钱的。像“感恩而死”这样的乐队经常会在他们居住的海特区举办街头免费音乐会，任何人都可以来听。“杰斐逊飞机”则在一家小酒吧担任驻场乐队，歌迷们只要买一杯啤酒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出了。

可惜好景不长，唱片公司岂能放过这块肥肉，前文提到的那些乐队很快就被大唱片公司签了下来，乐队成员摇身一变成了明星。与此同时，格雷厄姆也开始蠢蠢欲动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嬉皮士，一直在等待发财的机会。摇滚乐队的走红让他看到了商机，于是他租下了一幢破旧的老式舞厅“菲尔莫礼堂”（Fillmore Auditorium），将其改造成一家收费的迷幻摇滚演出场所，吸引了很多迷幻摇滚乐队登台献艺。

平心而论，商业的介入大大提高了这些乐队的音乐水准，为后人留下了好几张优秀的唱片。但是，商业化宣传扩大了听众范围，很多此前对嬉皮士没有概念的普通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场运动逐渐开始变味了。

这场商业化浪潮在1967年6月达到了高潮。著名的“爸爸妈妈”乐队主唱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决定在旧金山南部的一座小镇蒙特利举办一个摇滚音乐节，借此机会把这批旧金山迷幻摇滚乐队介绍给全世界。为了吸引更多的歌迷，曾经写出过《加州梦》（*California Dreaming*）的菲利普斯专门创作了一首宣传音乐节的广告歌，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旧金山》。

虽然只有七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蒙特利音乐节还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无论是音乐水准还是后勤保障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让到场的五万余名音乐爱好者大呼过瘾。音乐节结束后，很多意犹未尽的歌迷们不想就这么离开加州，于是他们听从《旧金山》这首歌的召唤，头戴鲜花来到了距离蒙特利

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旧金山，打算在那座宽容的城市度过一个充满爱的夏天，“爱之夏”就是这么开始的。

精明的格雷厄姆很快嗅到了商机，他居然把“爱之夏”这个名称注册成了商标。也许从这一刻开始，嬉皮士运动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回想起来，蒙特利音乐节是音乐史上的第一个大型户外摇滚音乐节，它创造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日后所有大型音乐节的模板。“火人节”虽然算不上是纯粹的音乐节，但它的组织形式、露营方式和志愿者制度等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几乎全都沿袭了当年的做法，凡是参加过音乐节的人都很容易适应。

当然了，“火人节”和普通音乐节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音乐只是“火人节”的一个次要元素，艺术才是“黑石城”的主角。从空中俯瞰，这座每年只存在八天的沙漠之城很像是一把张开的扇子，扇面部分是外围居住区，中间则是一个直径约2.5公里的中心广场（Playa），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会把自己的装置作品放在这个广场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中心广场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很多人选择骑自行车参观，否则根本看不完，这些艺术装置和穿梭其间的自行车构成了“火人节”最经典的场景。

夜晚的中心广场尤其热闹，很多艺术品都有夜灯照明，还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喷火装置，它们是“火人节”的主角。再加上几十辆响着电子乐的五彩花车，以及成千上万辆用荧光棒装饰起来的自行车，大家合力把黑石沙漠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儿童乐园。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火人节”的主题。据杜布瓦介绍，上世纪90年代的“火人节”曾经迷失过一段时间，被美国媒体描述成一个公开的毒品和性爱派对，几乎就要办不下去了。2001年组委会决定转型，把艺术确立为“火人节”的新主题，这才让“火人节”重获新生。

“从前人们常说，社会决定艺术，一个古代社会的好坏可以用它的艺术水平来衡量。”杜布瓦在“火人节”举办的一次讲座上对听众们说，“但我们认为，这个规律是可以倒过来的，艺术完全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一群好的艺术家有能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其次，音乐节的主角是各种明星，但来参加“火人节”的艺术家们大都没有名气。而且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艺术装置还是花车，主题也大都是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比如爱与恨、宽容与和解、历史与未

1. 9月2日，美国内华达州黑石城举办“火人节”，熊熊火焰照亮黑夜

2. 台湾艺术家制造的花车

3/4. 火人节的装置艺术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

2



(视觉中国)

3



(视觉中国)

4

来等等，缺乏民族特征。我在现场看到好几辆用金属管组装起来的汽车，未来感扑面而来。当它们咆哮着开进沙漠时，看起来像极了电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 中的场景。

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台湾艺术家制造的一辆花车。这辆车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用竹子做的佛祖，张开的大手似乎在说：无论是谁也逃不出我的掌心。即便如此创作者仍然担心观众看不出来，还在车上挂了两串红灯笼。后来我遇到了这辆车的设计者，台湾著名唱片设计师萧青阳，他承认之所以设计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获得大陆、港澳地区、台湾地区所有华人的认可。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虽然“火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营地很少看到国旗，只有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地上飘着各自的旗帜，打老远就能看到。

第三，如今绝大部分音乐节的商业气氛都很浓厚，不但票价高昂，场地内也会有很多出售高价食品和纪念品的摊贩，但“火人节”现场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行为，所有的演出和活动项目都是免费的。全场只有组委会安排的一个卖咖啡和茶的地方是收钱的，其余所有的饮食和纪念品需求全都依靠“火人”们的自由交换来解决。

当然“火人节”本身是卖票的，但原价并不贵，只是因为需求太过强烈，票价被票贩子们炒高了。“火人节”的组织者原本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运营，但从2014年开始改为非营利组织，门票钱被用于支付场地租金、流动厕所和安保，以及火人木偶和庙宇的建造。组委会甚至还为黑石沙漠的环境影响评估付出了100万美元的费用，这些钱当然也会从门票里出。

所有来“火人节”展示作品的艺术家们也都是自费的，无论是花车还是装置艺术，其制作费用也大都是个人所出，或者通过众筹等方式筹集。以前很多装置艺术品都会在“火人节”结束后被当场烧掉，如今这么做的艺术家不多了，因为很多作品都是用不易燃的材料制造的，造价不菲，艺术家们会在结束后将其运走，放到其他地方继续展出。

在这个方面，台湾的那个佛祖花车又是一个例外。据萧青阳介绍，制造花车的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台湾“行政院”下属的一个艺术基金会支付的，属于政府行为。不过呢，迄今为止整个大中华地区也只有这一件艺术品参展，也算是填补了空白吧。

总之，今天的“火人节”就是一个全世界艺术

爱好者相互展示才华的场所，而且无论是展示还是观赏都是自发的行为，不涉及金钱交易，这就保证了整个过程的纯洁性，让所有参加者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忘掉一切世俗烦恼，专注于欣赏艺术之美。

据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将来的人类不再需要工作了。那么，不工作的人到底干点啥好呢？答案也许就是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火人节”其实就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一次预演，是嬉皮精神的又一次尝试。

挖掘者们的两次游行

1966年12月17日，旧金山的海特街上突然出现了一列游行队伍，打头的是几个身穿黑衣的妇女，她们边走边哼唱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身后跟着三个戴着头巾的人，每人手里举着一个竹竿，上面绑着纸糊的美元符号。再后边是一副黑色的棺材，抬棺材的六个人头上都套着巨大的动物面具，棺材后面有一群人边走边向围观的人群散发哨子、笛子和棒棒糖等小东西。一时间，哨声、笛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交相辉映，好不热闹。到了傍晚，这群人又开始向群众散发小镜子，并鼓励他们爬上屋顶，把夕阳反射到大街上。与此同时，一群妇女开始在房顶上朗诵诗歌，街道上几千名群众也开始跟着朗诵。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所有参加者都成了演员，就连闻讯赶来的警察们也都包括在内。

这群人自称“挖掘者”(Diggers)，他们把这次活动命名为“金钱的死亡和自由的诞生”(The Death of Money and the Birth of Free)。他们告诉大家，私有财产是一切恶行的根源，要想改变现状，一切必须免费。

这些人原是“旧金山街头剧团”的成员，因不满格雷厄姆的商业运作而退出来，成立了这个松散的组织。“挖掘者”这个名字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制定法律允许地主随意圈地，把无人认领的公共土地划为己有。1649年，二十几个贫穷的农民在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抗议组织。温斯坦利认为金钱和私有财产是人类所有的罪恶来源，只有放弃私有制并共享财富才能消除贫困和战争。于是他们开始在废弃的土地上挖土开荒，种植庄稼，并自己动手盖房屋，在里面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公社里人人平等，一切财产按需分配。他们崇尚非暴力，当政府派警

察前来驱赶他们时，“挖掘者”们拒绝做任何抵抗，因此这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了。温斯坦利后来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理想，后来他被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许多激进人士视为鼻祖。

旧金山“挖掘者”们全盘继承了老“挖掘者”的思想，而且说到做到。早在1966年秋天他们就开始在海特区附近的草坪上免费分发食物，任何人都可以来领。这些食物有些来自商店的捐献，更多的是来自“绝命毒师”斯坦利的慷慨捐赠。他们每天下午提供一顿饭，一直持续了一年，许多嬉皮士就是靠着这顿饭才没有饿死。他们还经常组织“感恩而死”等乐队在草坪上举行免费音乐会，为嬉皮士们提供娱乐。后来又发展到免费提供钱和大麻，甚至还在海特区开了一家免费商店，提供衣服、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当越来越多青少年涌入旧金山后，他们免费为这些人提供住宿，并开设了第一家免费诊所。

媒体都把他们看作一个宗教慈善机构，其实是大错特错。“挖掘者”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要任何回报，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可以不必遵从这个社会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而生存下去，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并使人们的精神从中得到升华。为了维持供给，他们开始自己烘制不经加工的全麦面包，人们把它叫作“挖掘者面包”。他们还完善了扎染技术，自己设计制作T恤衫。后来这两样东西都在美国流行开来，成为人们回归自然的一种标志。

但是，像“挖掘者”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他们的做法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涌入旧金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食品越来越不够吃了，他们只好去商店里偷，结果自然不太美妙。很快衣服和住宿也不够了，大家只能裹着毯子露宿街头，那段时间旧金山大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臭味的年轻人，以至于旧金山嬉皮士报纸《神谕》上登了篇文章，嘱咐那些来这里朝圣的年轻人：“如果你要来旧金山，不仅要在头上插满鲜花，而且别忘了带上食物、毯子、换洗衣服、钱……”

更糟糕的是，来旧金山朝圣的可不都是天真无邪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心怀鬼胎的人。于是，LSD和大麻很快就让位于能让人迅速上瘾的硬毒品海洛因，“平等博爱”的口号也变成了性侵的借口，受害者几乎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那段时间“挖掘者”们开设的免费诊所每天都会接待大批怀孕的少女和吸毒过量的瘾君子，“爱之夏”变成了“噩梦之都”。

与此同时，旧金山当地居民开始抱怨这些外来人口带来了麻烦，嬉皮士和当地黑人居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打架斗殴事件频频发生，后来还发生了几起强奸杀人案，更是弄得人心惶惶，许多商店关门大吉，大街上堆满垃圾没人清理，巡逻警察穿上了防暴制服，海特区逐渐变成了一个贫民窟、一个大众媒体早就“预料”到了的人间地狱。

1967年10月6日，“挖掘者”们在海特街举行了第二次抬棺大游行，这一次棺材里面放的是嬉皮士们常用的物品，包括念珠、头巾和地下报纸等。他们把这次活动叫作“大众媒体忠实的儿子——嬉皮士之死”（The death of the hippie, devoted son of the mass media）。和第一次抬棺游行时的盛况相比，这一次围观的人很少。嬉皮士们死得如此彻底，大家甚至连葬礼都懒得参加了。

为什么“爱之夏”只维持了一个夏天，“火人节”却能持续地办下去呢？只要在露营区住几天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地方本是一个鸟不拉屎的沙漠，只要稍微有点风，空气中就弥漫着细密的沙尘，皮肤上永远沾着一层灰，再怎么洗也洗不掉。风力稍微大一点就会演变成沙尘暴，大白天也会伸手不见五指，宛如世界末日。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沙尘是碱性的，对皮肤的腐蚀性很强，时间长了会让人很难受，更不用说其对呼吸道的影响了。可是，“火人节”刚开始那几天我还看到有人戴口罩，但很快大家就把口罩扔了，不能一天24小时总戴着口罩生活啊，太不方便了。

除了空气质量差之外，这里的气候条件也不怎么好。黑石沙漠的海拔超过1200米，紫外线强烈，稍不注意很容易晒伤，可涂防晒霜的话又会粘上更多的灰尘，真是两个难的选择。这里白天的气温非常高，光膀子都嫌热，到了晚上却又很冷，没有厚的羽绒睡袋根本熬不过去，体质不好的人很容易生病。

还有，这里距离文明世界非常远，必须一次把所有东西都带齐，否则没地方补货。幸亏我们的领队之前来过一次，有经验，因此饮用水带了很多，没有出现缺水的情况。不过洗澡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擦身体。

食物方面我们准备充分，倒是没有挨饿，但因为房车的冰箱不给力，带去的蔬菜很快就坏掉了，最后几天只能靠面包、香肠和方便面度日。

总之，黑石沙漠几乎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即使像我们这样准备得如此充分，

也吃了不少苦。从生活条件上来说，“火人节”绝对不是一个节日，而更像是一次忆苦思甜的修行。茫茫沙漠就像是当年的那个酸剂挑战，大大提高了准入门槛，挡住了不少诚意不足的伪嬉皮士，让“火人节”永远不会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所占领。

当然了，露营区内也有人在偷偷吸毒，传说中的“性爱帐篷”也是存在的。抛开两者的是非不谈，性和毒品并不是“火人节”的主流，只是被无聊媒体放大了。事实上，露营区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主题营地，比如日本茶道、红酒品尝、越南咖啡、爵士欣赏、诗歌朗诵和环保讲座等等，不但质量很高，而且全部免费。还有一些营地的主题则有些“另类”，比如有个营地专门给人洗脚，参加者既可以是被服务的一方，也可以成为服务者。还有个营地是免费替人印制T恤衫图案，不过这可不是普通图案，而是把自己的屁股或者胸部的轮廓印上去，这种服务就只有“火人节”才能提供了。我还看到一个专门提供洗澡服务的营地，但是你必须要有勇气脱光了爬到车顶才能享受到这个免费服务。

说到裸体，“火人节”上确实有很多人大白天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一开始还有人大惊小怪，但没过几天大家就都习以为常了。在我看来，“火人节”上的裸体已经没有什么性的意味了，而更像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任性，有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潇洒。

在“火人节”上交朋友很容易，几乎所有的营地都是敞开的，任何人走累了都可以进去歇个脚，顺便讨碗水喝。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简单，不再有人在乎你平时到底是干什么的，挣多少钱，有没有买房子，大家只会看你这个人好不好看，是否有趣，或者有没有好故事可以分享。换句话说，“火人节”改变了“人”的定义，所有那些外在的光环在这里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这种状态在当今社会显然是无法持久的。虽然“火人节”用高门槛筛选出一帮志同道合的现代嬉皮士，但也只能把这个乌托邦之梦维持一个星期而已。

尾声

“火人节”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周六，竖立在广场正中间的那个木制火人将在这天的晚上被烧掉。那天下午的时候就有人去广场占位子了，大家都想离得近一点，但事实证明这是多余的，因为当大火

烧起来之后，方圆几公里之内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浪。

整个烧火人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组委会先是安排了一个多小时的舞蹈表演，风格近乎部落巫师的显灵仪式。然后是持续了数分钟的焰火表演，全场观众的热情在礼花的爆炸声中被点燃了。之后便是烧火人。由于今年的主题是“激进的仪式”(Radical Ritual)，主办方为了模仿古代的祭祀仪式，在火人的头顶加盖了一个类似庙宇的建筑物，导致大火一直烧了一个小时才终于熄灭。观众们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极度亢奋，大家在震耳欲聋的电子乐伴奏下又唱又跳，开了一个史上最疯狂的大派对。

就在大家疯狂庆祝的时候，有个人冲进了火堆，被当场烧死了。据说“火人节”每年都有人试图冲进火堆自杀，因此主办方在火人周围安排了两道人体屏障。今年这位自杀者冲了两次都没有冲进去，但因为烧火的时间太长，人墙放松了警惕，这才让他得偿所愿。

亲眼目睹有人自杀，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事情。但如果你当时也在现场的话，应该可以理解这人的心情。烧火人的过程太像宗教仪式了，肯定会有人希望借此机会结束自己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大火中重获新生。

很多没有参加过“火人节”的朋友都会对这把火感到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东西烧掉呢？但如果你来过一次就会明白，这才是最好的结束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大家在这一个星期里过的是一种完全超现实的生活，只有一把火将所有东西全数烧光，才能把大家从幻想中拉回现实。

周日是“火人节”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的重头戏是烧庙。“火人节”有个传统，在距离露营区最远的一个地方修建一座庙，供大家寄托哀思。在这七天的时间里，很多人都会把某个已经去世的亲朋好友的照片或者纪念品放在庙里，然后在最后一天目睹好友的灵魂随着火焰升入天国。

烧庙的那天，组委会没有安排任何庆祝活动，大家围坐在庙前，静静地看着它被大火吞噬。现场除了火焰的噼啪声，以及偶尔传来的几声呜咽，听不到任何声音，和周六晚上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个绝佳的安排，组委会似乎在告诉我们，不管将来人的定义如何改变，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感情。嬉皮士们可以打破一切清规戒律，但感情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动力，也是人和机器的唯一区别。☑



1

嬉皮公社探秘

主笔/图 袁越

在今天的美国还是能找到原汁原味的嬉皮士的，他们离开城市躲进了深山，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建立起一个个公社，继续过着他们想要的嬉皮生活。

令人失望的呀呼公社

1967年的“爱之夏”匆匆结束之后，失望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其中绝大多数人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但也有少数人一直没有忘记嬉皮士的



2



3

1. 黑熊农场的索菲亚、莱斯莉和金宝(左至右)

2. 呀呼嬉皮公社内一辆废弃的校车

3. 呀呼嬉皮公社的约翰·迪恩

理想，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荒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就是遍布美国的嬉皮公社的起源。

如果你在网上搜“嬉皮公社”(Hippie Commune)，会搜出来一个网站，列出了美国每个州现有的嬉皮公社的地址和基本情况。加州的嬉皮公社集中在北部，一来这是嬉皮公社的发源地，当初很多旧金山嬉皮士在逃离海特区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北上，因为加州北部有一大片未开发的森林，是最理想的隐居之地。二来北加州是著名的大麻产

地，因为这里气候条件好，产销网络也相对健全，最适合发展这种地下产业。在LSD被全面禁止之后，大麻成了嬉皮士们唯一的选择。

我从旧金山出发，沿着著名的101号高速公路向北行驶，7个小时之后便到达了著名的大麻重镇阿尔卡塔(Arcata)。这是个安静的小城市，因为附近有一所大学，因此大麻的需求量较大。

市中心有个广场，我到的时候发现那里聚集着一大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一边晒太阳一边兴

高采烈地聊着天，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大麻香气。广场旁边一家旅馆的服务生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外地来的“采摘者”(Trimmers)，不能算是真正的嬉皮士。

原来，大麻药效最强烈的部位是花骨朵，价格也最高，但这东西需要有人将其一颗一颗地摘下来，一旦花形破损就卖不出价钱了。阿尔卡塔附近有好几家嬉皮公社都在偷偷种大麻，每年夏天都会雇用很多流浪汉去摘花。

“虽然加州的大麻法律越来越宽松了，但起码现在还不是人人都可以抽的，需要医生开证明才能在指定的商店里买到，所以大麻的地下市场仍然非常活跃。”这位服务生指着广场上的那群流浪汉对我说，“所以这些‘采摘者’反而是最不希望大麻合法化的，那样一来他们就挣不到钱了。”

这位服务生还告诉我，阿尔卡塔附近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嬉皮公社了，但从这里出发往北再开15英里有个名叫特立尼达(Trinidad)的小镇，那里倒是有个嬉皮公社，名字叫作“呀呼”(Yee Haw)。

我按照他的指示很快开到了特立尼达，这是一个只有400名居民的小镇，101号公路从镇子的中间穿过。我稍一打听就知道了“呀呼公社”的地址，原来就在101号公路旁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下了高速公路，只开了5分钟就发现了隐藏在树林中的一幢小木屋。我立刻断定这就是我要找的嬉皮公社，因为屋子旁边有好几辆废弃的旧车。对于嬉皮士们来说，旧车上的很多零件都是可以拿来当工具使用的，稍微大一点的巴士还可以用来住人，一举两得。

我来到小屋前喊了一声“哈啰”，很快就有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走出来迎接我。原来他就是“呀呼公社”的主人查尔斯(Charles)，他在20多年前买下了这块林地，把它打造成了“呀呼公社”。可惜那天他正好有事要出门，就让一个叫约翰(John)的人陪我逛逛。

约翰今年60岁了，是个来自新泽西州的老嬉皮士。“爱之夏”那年他虽然只有10岁，但已经懂事了，对电视上看到的旧金山景象感到十分好奇。12岁那年他听说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吵着要去，可惜父母不让。几年后“感恩而死”乐队去新泽西州演出，他去看了，立刻爱上了这支乐队，从此便成了该乐队的“死忠”(Dead Head)，一直跟着乐队

走南闯北，靠在音乐会上贩卖大麻和乐队纪念品谋生。

“我年轻时喝了太多酒，服过太多毒品，把身体搞垮了。我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想在海边过60岁生日，就坐火车来到加州。”约翰对我说，“没想到加州的海边非常冷，我冻得受不了了，多亏查尔斯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睡觉的地方。”

他领我去看他的小木屋，屋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只剩下很小一块地方可以活动。但好歹屋里有个床，床上有足够厚的毯子，还有一块太阳能电池可以给他的手机充电。他的手机里存了不少“感恩而死”乐队的老歌，这是他平时唯一的娱乐。

约翰领着我在公社里转了一圈，这是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林地，里面零星散落着几间小木屋，以及好几辆公共汽车改装成的房子。据他说这里住着大约30个人，大都是像他这样的流浪汉。老嬉皮士们死的死，走的走，只剩几个了。不过那天除了几个小孩外我没有看到一个大人，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林子里有不少菜地，大都荒芜了，显然很久没人打理。营地中间还有一幢两层的木头房子，据说是公社的公共活动室，但最近查尔斯太忙，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组织大家一起活动了。

“查尔斯正在和当地政府打官司，忙得焦头烂额。”约翰对我说，“警察来过好几次，说这个公社存在违法行为。”约翰没有说到底是怎样的违法行为，不过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说实话，我对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失望。我原本以为嬉皮公社应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嬉皮士们应该是一群有趣的人，过着白天劳动、晚上唱歌的快乐生活，但眼前的现实和我头脑中的想象差距太大了。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个“呀呼公社”距离101号公路太近了，流浪汉们搭便车就可以找到这里，所以这地方会被约翰这样没什么文化的无家可归者占领，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虽然我很失望，但约翰显然对我的来访非常高兴，因为他很久没有和人聊过天了。我俩坐在他的那间小木屋里聊了一下午，他一边用手机放“感恩而死”乐队的歌，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那些故事相当琐碎，听起来很没意思。我不愿意扫他的兴，只能耐心地听下去。他一直讲到太阳下山，天渐渐黑了下来，我这才找到借口准备



黑熊农场第一个最古老的谷仓

告辞。

“你打算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吗？”临走前我问了他一句。

“这里条件不好，夏天还凑合，冬天又湿又冷，地上全是泥巴，经常有好几个星期见不到太阳，特别难受。”约翰的嗓音突然有些哽咽，他竟然在我面前哭了起来。“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再过几个月就打算离开这里去南方，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留我。”

我什么也没说，只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暗自祝他好运。

努力坚持的黑熊农场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黑熊农场（Black Bear Ranch）。这座农场创建于1968年，是“爱之夏”结束之后旧金山嬉皮士们建立的第一个公社。农场的创始人是一对姓马里（Marley）的艺术家夫妇，两人从好莱坞明星那里筹集到2.25万美元，买下了位

于北加州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废弃金矿，将其改造成了嬉皮公社。最初的几名成员大都来自旧金山的“挖掘者”组织，其中就包括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电影演员彼得·考约特（Peter Coyote）。

也许是因为考约特的原因，黑熊农场在嬉皮士当中名气很大，但却极为难找，连谷歌地图上都没有它的确切位置，只能先开到一个名叫“三文鱼岔道”（Forks of Salmon）的小村庄，然后再打听。这个“三文鱼岔道”本身就很难找，我沿着盘山公路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一位当地村民一听说我要去黑熊农场，立刻反问道：“你去那儿干吗？那是一群浑身脏兮兮的乞丐，满脑子不劳而获的思想！”

再一打听，这位一脸鄙夷神色的老太太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她父亲是居住在这片森林里的印第安部落的首长，一直对白人侵占了他的家乡感到不满。说来有趣，马里夫妇当初买下黑熊农场时用的口号就是“自由的土地还给自由的人民”（Free Land For Free People），结果却把当地原住民给得罪了。

虽然很不情愿，但这位妇女还是给我指明了方向。我顺着她的指引开上了一条没有路牌的土路，难怪谷歌地图上显示不出来。这条路全是石头，我租的小车开起来很是费劲，不得不经常下车搬石头。途中我还遇到了好几条岔道，因为没有路牌，只能靠猜，终于有一次猜错了，开进了一条死胡同，差点没倒出来。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到了黑熊农场。这地方位于一个山谷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同样是一大堆废弃的旧车和几个残破的木屋，看来天底下的嬉皮社区都是一样的。不过我立刻就发现了不同之处，这里的菜园子种着很多不同种类的蔬菜，说明黑熊农场的人比“呀呼公社”要勤快多了。

我喊了一声“哈啰”，很快就有两个人从一间两层小楼里走出来迎接我。两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叫金宝（Gimbo），衣着朴素，年纪稍大，性格淳朴得有些木讷；另一个年纪很轻，光着上身，留着一头染成橘红色的长发，性格张扬，却不知为何自称索菲亚（Sophia），听起来像是个女孩的名字。

“欢迎欢迎，到楼上坐会儿吧。”金宝热情地说。我发现嬉皮公社的人对于访客全都来者不拒，而且从来不问陌生人的来历，显然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了。不过我却像一个好奇的旅游者那样问个不停，很快就知道索菲亚是个流浪音乐家，金宝原来的职业则是种大麻。

“不过我现在不种了，黑熊农场里也不让我种大麻。”金宝补充道，“不过我们这里从来不缺大麻，因为以前在这里住过的老社员们经常回来看我们，每次都会给我们补货。”

我跟着两人来到楼上，见到了另外两位公社成员。一人名叫麦克，曾在美国海军服役，退伍后去俄勒冈大学读书，最近这段时间在这里过暑假；另一人名叫莱斯莉（Leslie），是个又高又瘦的漂亮女

孩，不过她一张嘴就露出了嬉皮士本质：她的一颗门牙掉了，却没有补上。

我和他们聊了会几天，感觉这里的气氛和“呀呼”完全不同。这几个人不但没有丝毫怨气，而且知识丰富兴趣广泛，大家从世界历史聊到当代艺术，几乎无所不谈，和我想象中的嬉皮公社相当吻合。不过，当我试图聊聊最近几天发生的新闻事件时，却发现他们一问三不知。原来这里没有网络，甚至连电话都没有，只有一台小收音机，平时也不怎么开，所以这帮人几乎相当于与世隔绝了。

“万一有个紧急情况怎么办？”我问。

“那就只能开车出去求救了。”莱斯莉回答，“其实夏天还好，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开到有人的地方。最惨的是冬天大雪封山，那就真的出不去了。曾经有两个人租了辆车开进来玩，结果突降大雪，两人只能把车放在这里，然后徒步走出去上班，直到第二年春天再回来取车，估计赔了租车公司一大笔钱。”

莱斯莉是个画家，屋外放着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水平相当不错。她一边聊天一边清理接骨木果实（Elderberry），果浆把她细长的手指染成了黑紫色。据说接骨木果浆能治感冒，在另类医学爱好者当中相当有名。这个山谷里盛产接骨木，把果浆收集起来可以拿出去换钱。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太阳下山，闹钟突然响了起来，莱斯莉站起身，开始分派任务。索菲亚去喂鸡鸭，金宝去挤羊奶，她为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劈柴。我后来得知，这个莱斯莉居然是黑熊农场的临时管家，因为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年了，最有经验。黑熊农场一直采取民主方式管理，没有社长或者管家之类的职位。但这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农场，有很多日常工作需要有人来做，这地方的人员流动性又很大，需要有经验的人把规矩传下去，莱斯莉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在她的管理下，黑熊农场的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保证大家都能过上基本正常的生活。

作为访客，我不用做任何事情，但我分别参观了三个人的工作，借机了解了这家农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原来，他们会定期出山去采购食品，所以面粉、面条、面包、大米之类的主粮是不缺的。蔬菜基本靠自己种，但肯定不够吃，所以经常吃不到蔬菜，好在山里果树很多，水果管够。蛋白质则主要依靠他们饲养的鸡鸭，以及十几头山羊产的羊奶，

这几个人不但没有丝毫怨气，而且知识丰富兴趣广泛，大家从世界历史聊到当代艺术，几乎无所不谈，和我想象中的嬉皮公社相当吻合。

足以满足十几个人的日常需求了。

这里不缺水，最初建造农场的老嬉皮士们把山泉引下来，安装了一套相当完备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使用的方便程度和城里的房子无异。电则主要依靠太阳能电池，但只管照明和手机充电，冰箱、微波炉之类的家用电器是没有的。做饭和取暖都靠柴火，这片山林里最不缺的就是木头，只需有人定期去山里砍就是了。

这里最缺的东西就是香烟和酒，因为这两样东西都得去文明社会花钱买，无法自给自足。

不过总的来说，这里基本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对于外部社会的物质要求是很低的。但是，要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下去，必须有点自娱自乐的精神和能力。这几位在这方面都还行，起码和他们聊天很愉快。索菲亚还告诉我，我的运气不太好，因为这里平时都会住着近10个人，昨天刚刚走了一批，所以只剩下他们4个人了。

“前两天还有几个流浪音乐家来这里住了几天，我们每天晚上在客厅里弹琴唱歌，好玩极了。”索菲亚拿出手机，给我放里面录制的一段音频。我注意到客厅里堆放着一大堆乐器，什么都有，看来音乐是黑熊农场的主要娱乐形式。

这里的晚饭是轮流做的，当晚轮到索菲亚，他给大家做了一锅意大利面，我不好意思吃他们的东西，便谢绝了邀请，靠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三明治凑合了一晚。

吃完晚饭大家继续围坐在餐桌旁聊天，话题从环境保护到宗教哲学，真的是海阔天空。这几个人的聊天能力都特别强，从来没有冷场的时候，听得我大呼过瘾。后来在我的引导下，话题开始转向了黑熊农场不好的一面。金宝似乎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告诉了我一些网上看不到的事情。原来，创始人马里夫妇的筹款过程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顺利，而是有些要挟的成分，那几个好莱坞明星是被迫捐的钱。马里夫妇思想非常激进，黑熊农场初创时期严格禁止夫妻同居，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和同一个伴侣连续睡两个晚上，结果反而导致了不少纷争，甚至爆发过几起暴力事件，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社员。

因为黑熊农场对任何人都开放，不少罪犯曾经来这里避过风头。就在今年年初，这里就来过一对男女，年龄相差很大，还开着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

不过他们还是让两人住了下来，直到那个中年男人表现得越来越诡异（比如居然提议用汽油做饭），大家这才把两人赶走了。后来得知那个男人是佛罗里达的一名老师，女孩是他拐出来的学生，当时FBI正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他俩，所幸不久之后两人就被抓住了，否则黑熊农场的责任可就大了。

“其实这样的事情非常少见，黑熊农场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欢乐的。”莱斯莉总结道，“我们这儿就相当于一个嬉皮士中转站，美国有很多嬉皮士一直生活在路上，我们这里就是他们落脚的一站。你待长了就会知道，这里的人来来往往，换得很勤，每次来新人都会带来很多好东西，以及很多不一样的故事，所以在这里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可惜我准备不足，没有带足够多的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只在这里睡了一晚就不得不告辞了。离开的时候我想，“呀呼公社”我应该是不会再去了，但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再来黑熊农场看一看的，而且我一定会带足食物，再带上几瓶好酒，和他们好好聊聊天，过几天真正的嬉皮士生活。

尾声

同样是嬉皮公社，“呀呼公社”和黑熊农场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原因就是人员的素质差异。“呀呼公社”就在高速公路边上，太容易找了，几乎没有门槛。相比之下，黑熊农场位置偏僻，一般人根本找不到。但也正因为如此，黑熊农场无形中设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把所有不好玩的人都挡在了门外。

所谓“嬉皮精神”，说白了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不影响其他人的前提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句话说着容易，实行起来却非常难。老一代嬉皮士以为只要心里有爱，其余都不是问题，但是美国黑人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光有爱还不够，还要有权力（Power），即实现目标的决断力。他在《我们从此该走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爱和权力总是针锋相对，爱被认为是一种不需要决断力的感情，权力则被认为是一种不需要爱的决断力。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和恶意的，没有权力的爱只是无力的感情用事而已。■

《东方快车谋杀案》 如何重演一场经典谋杀

记者 / 宋诗婷

在过去几十年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作品被反复搬上大小荧屏。197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已成经典，43年后，这桩经典谋杀案再次被搬上大银幕。这是一个更年轻化的版本，企图开启新的侦探波洛系列。

重塑经典

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影史来说，197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都是部经典作品。这部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的电影有一个好悬疑片的基础：一趟神秘的连接欧亚大陆的豪华列车，一桩堪称完美的密室杀人案，一位滑稽的大胡子侦探，以及一个出人意料的经典结局。

当年，这部演出阵容豪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入围多项奥斯卡奖，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成功的电影改编作品。

43年之后，这部经典作品再次以全新的面貌重返大银幕。“这在欧洲从来都不是个问题。”谈到将一部结局不再是秘密的经典悬疑片重新改编时，导演肯尼斯·布拉纳说，“我是个在剧院工作的演员，出演过很多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去年还指导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是个观众更耳熟能详的故事，结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呈现这个故事。它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结局，重塑这个过程，可以让观众有全新的观影体验。”

重拍《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念头是制片人马克·戈登和西蒙·金伯格不谋而合的心愿。一开始，两人还是竞争关系，他们通过不同渠道，都希望可以购得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风靡全球，至今已有数十亿本的全球销量，因此，版



权方对任何一部小说的版权买卖都尤为慎重。这是块难啃的骨头，戈登和金伯格最终决定携手合作，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取得版权这件事上耽搁了五年，为了保证电影的艺术品质，他们又拉来了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后者曾指导过《异形》《末路狂花》《银翼杀手》等经典作品，对悬疑片的悬念处理有独到的见解。

雷德利·斯科特为《东方快车谋杀案》带来了与自己合作多年的编剧迈克尔·格林。后者很快确立了电影的改编原则：“我们希望将这个故事带入现代社会，同时又不改编它的本质和精神内核，这样一来，当代影迷才能原汁原味地体验这个故事，相信这个故事。”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有两个核心元素，一个是案件本身，另一个就是侦探波洛。后者是原著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喜欢的小说角色，这位比利时侦探曾出现在她的33本小说、50个短篇故事中，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经典侦探形象。

在剧本创作阶段，编剧和导演最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一个全新的波洛。在老版本电影里，阿尔伯特·芬尼饰演的波洛是个有点滑稽的喜剧形象，这也符合克里斯蒂原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编剧格林和导演布拉纳希望赋予他更复杂的性格。“可以把波洛看成一个喜剧角色，但在某些场景下，我们必须将他刻画成与之相反的人。”莎士比亚戏剧出身的布拉纳希望波洛不仅是个



侦探，在某些时刻，他也是个拷问者，可以让电影带向更深刻、更彰显人的复杂性。

但在这一切呈现性格特质的设计之前，布拉纳最先解决的是波洛的胡子问题。1974年，《东方快车谋杀案》上映，当时已经84岁的克里斯蒂参加了首映礼，那部电影也是她唯一观看过的自己小说改编的作品。首映结束后，克里斯蒂对电影很满意，为数不多的抱怨就是波洛的胡子。她觉得，电影中波洛的胡子与自己小说中的设计相差甚远。

尽管克里斯蒂早已不在人世，再也不会抱怨波洛的胡子。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布拉纳依然想在这个小细节上让克里斯蒂满意。他和团队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公司的帮助下，收集了所有小说中关于波洛胡子的描写经过9个月的调研，终于制作出了电影中那副“全英格兰最考究的大胡子”。

在克里斯蒂的身份设定中，波洛是比利时人。导演布拉纳同时也是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的扮演者，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这桩密室杀人案中，各个人物的国籍、语言甚至是口音都是案件侦破的重要环节。为了呈现波洛的比利时口音，布拉纳还请了一位方言教练，每周上三次培训课，即便在有戏剧演出的档期里，他也会通过 Skype 上课。

导演同时也是电影的主演，这为编剧格林的创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在一起工作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一场戏怎么拍，还要考虑他怎么去演绎一些瞬间。

我们不仅可以看着一句台词，讨论这句台词的语气，或者是镜头的角度，还可以听着他直接将这句台词读给我听，那我就可以立即为他修改台词。这是一段非常有趣、非常有效的过程，拿掉了许多臆测的东西，因为影片的导演非常清楚主演将怎么去读出这些台词。”格林说。

除了重塑波洛这个经典人物，如何给这桩已知谜底的谋杀案带来新鲜感也是让布拉纳和格林费尽心思的事。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调整就是，他们用一些新角色替换掉原著小说和旧版本中出现过的经典角色，通过这种可以让观众丢失线索的方式，试图将悬念一直保持到故事最后。在所有新角色中，最亮眼的是舞蹈家夫妇。从前那对高傲，脾气古怪的匈牙利外交官夫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由谢尔盖·波留宁和露西·博因顿饰演的一对舞蹈家夫妇。两人行为举止怪异，看起来时刻都处于磕了药的状态。这对夫妻出场不多，但布拉纳对他们做了非常风格化的处理，让人印象深刻。

为了让这杯老酒卖相更好，他甚至请来约翰尼·德普出演受害者萨缪尔·雷切特，在小说原著中，这个角色的年纪在60岁上下。无论是新角色还是老角色，布拉纳设置人物的另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年轻化，他希望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吸引的不仅是原著粉丝和旧版本观众，更是那些甚至连爱阿莎·克里斯蒂都不知道是谁的年轻人。

左图：肯尼斯·布拉纳不仅是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导演，他也在电影中出演男主角侦探波洛

右图：东方快车上的三位乘客，推销员马奎斯，家庭教师玛丽·德本汉，医生康斯坦丁

影像升级

和43年前的电影工业相比，今天的好莱坞在拍摄技术和后期处理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因此，布拉纳在影像处理上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65毫米胶片下的精致影像和高水准的服道化设计也是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吸引人的看点。

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发生在东方快车上的这桩谋杀案是彻彻底底的密室杀人，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也集中在车厢内，波洛的推理过程，和在整个过程中呈现的众生相是原著小说和1974年版电影着重呈现的部分。除了继承传统，布拉纳也做了一个冒险的尝试，他把波洛引向了室外，打破了封闭空间，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增加了几场外景戏。

“在原著小说中，只提到了被大雪困住的列车。所以书里因大雪滞留的列车，在电影里就多了一些惊险元素，它最后停在了一座岌岌可危的铁道高架桥上。”布拉纳解释，老旧的高架桥，车窗外连绵不绝的雪山，没有人能从这里徒步离开，那些山峦也带来了不确定的危险，这种视觉化的外部环境处理恰好与车内的氛围呼应，能够将阴森又略带悲伤的故事情绪外化。

电影专门为这个场景设计了一座跨度在二三百米的桥，并在桥上造了四节真实的车厢，算上车头，这个场景重达150吨。电影中的皑皑白雪一部分是特效，但围绕在列车周围的雪都是真实的人造雪。接受采访时，设计物料的戴夫·沃特金斯说：“我们花了几周时间在这个雪景里，这可不是10米宽的雪景，这是100米、200米甚至300米宽。世上有这么多不同的人造雪，从雪粉、雪烛到雪烟。而在棚里的时候，他还得想出一种方法，让雪从窗边飘过，又不能打在窗上发出声音。所以我设计了一种很复杂的通风系统，这样在正式拍摄的时候，就能保证雪从车窗外纷纷飘过，但是不发出一点点声音。”

把观众引向山野的正是电影的主角侦探波洛。他因追踪一位疑犯而离开火车，并在途中与疑犯有场打斗。这场打斗戏不复杂，镜头也不多，但它大概是波洛侦探在电影世界里的第一场打斗戏。布拉纳从波洛曾经的军人经历中找到了这场戏的合理性，并为他的打斗技能设计为“戴着手掌的合气道高手”。

除了打斗戏，两场波洛盘问犯人的戏也在室外拍摄。“既然车已经停止不前，我们就该利用这一点，做一些改编。”布拉纳说。

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后期制作阶段，制片方曾在伦敦举办过一场小规模的电影片段放映，

其间展出了电影中使用过的道具和服装。其中那些暗藏身份信息又精致考究的服装都出自布拉纳的老搭档亚历山德拉·拜恩之手。在悬疑片中，人物的身份信息常常隐藏在服装和小道具上，因此，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拜恩的任务不仅仅是设计既有年代感又符合当下审美的戏服，还要为波洛的推理服务。威廉·达福饰演的哈德·哈曼德教授实际上是个美国人，但要伪装成德国身份，主创团队希望观众从服饰上发现这一点，但又不能太突兀，设计上的分寸感是拜恩最难把握的部分。

电影整体的摄影视角和视觉呈现都是现代的，但在摄影器材的选择上，《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前不久上映的《敦刻尔克》一样，选择了胶片拍摄。65毫米的胶片为这部电影带来了鲜艳的色彩和更高的锐度，这正是布拉纳所追求的影像气质。在今天，用65毫米拍摄很困难，但更困难的是后期处理。电影在英国拍摄，但整个英国都没有一家洗印店能处理这款大画幅胶片，唯一一家洗印厂在洛杉矶，但他们拒绝提供越洋服务。“所以，没有办法，最后我只好伦敦通过柯达开一家洗印厂。这可能是30年来唯一的一家65毫米胶片洗印厂。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个重大利好，而且对我们制片厂而言，我们也终于不用每晚这样费尽心思担惊受怕地送底片去地球另一端了。”执行制片马特·杰金斯接受采访时说。

室外场景的拓展，服装、造型的暗藏玄机，65毫米大画幅胶片的质感，以及导演布拉纳的舞台剧经验，这些新尝试都在悬念揭示的那关键一场戏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原作中，波洛把所有嫌疑人集中在车厢里指认凶手，但在布拉纳导演的版本中，指认凶手这场重头戏被安排在一个火车隧道前，12位嫌疑人坐在长桌前一字排开，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

整场戏的表演方式也是舞台剧式的一气呵成，这是布拉纳最个人化的导演风格，他允许表演上的即兴发挥，甚至某些特定情境之下的失误都被他视作符合人物性格和情绪的创作，这是一种完全舞台化的思维方式，得益于他多年的舞台经验。

通过悬念揭晓的那场戏，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希望把这桩经典谋杀案带向更深刻，甚至更宗教的层面。布拉纳饰演的波洛比1974年阿尔伯特·芬尼的版本更帅、更严肃，也更上帝视角。这是一场案件侦破，也是一次道德审判，更是追求平衡与秩序的波洛对善恶的重新评估。■

“我希望角色的动机更赤裸裸也更深刻”

——专访导演肯尼斯·布拉纳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你替换了一些人物，更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一些波洛的动作戏，这是基于人物和故事的设计，还是商业上的考量？

肯尼斯·布拉纳：当然是为故事本身考虑更多，在这个案件中，波洛是追踪者的角色，像个猎犬。他嗅到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打斗不是他的本意，但我们都知道他有军人的背景，所以，这种行为有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如果是商业上的考量，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加入动作戏才是危险的，在最终这个版本之前，我们拍了更多动作戏。我当然知道，对于这部戏来说，纯粹的密闭空间是更保险的选择，但我也希望把外部环境的寒冷、黑暗、潮湿呈现给观众。我希望用这个尝试让大家看到，我们可以用新的角色、新的场景设定让老故事焕发新的活力，重点是如何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整部电影都很有舞台感，你本人就是资深的舞台剧演员，这部电影是否从舞台剧和你个人的表演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肯尼斯·布拉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小说原著，整个故事具有一个经典的结构，有戏剧化的成分，所以肯定受到一些传统戏剧的启发。两年前，我去了一次米兰，看到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那幅画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最后揭晓答案，当波洛开始思考时，十二门徒的画面其实就是眼前这些人给他的感觉。这种图像转化的思考方式来自我的戏剧背景。其实，改编文学作品就是在寻找一种方式，将文字翻译成电影语言。电影语言不仅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的晚餐》式的设计让整部电影蒙上了一层宗教或哲学的色彩，我不知道对故事本身来说是好是坏。

肯尼斯·布拉纳：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角色的动机变得更赤裸裸也更深刻。我希望观众有这



肯尼斯·布拉纳

样的观影体验：一开始你踏上了一趟令人兴奋的旅行，然后走进了一场谋杀案，最后进入了一出古典戏剧，整个事件变得更原始、更宗教，更接近《圣经》里的善恶是非。就好像波洛在看着十二门徒，谁是叛徒？谁是犹太？我希望以这种方式带观众走进心灵深处，和波洛一起拷问灵魂。

三联生活周刊：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他是个非常擅长制造悬疑和惊悚氛围的导演，你和他合作感受如何？

肯尼斯·布拉纳：斯科特很早期就投入到这项工作。他本身也是一位艺术家，所以他理解创作这件事，给了我非常大的空间。对于我们最开始讨论的预算和现场安排问题，福斯有一点犹豫，但当斯科特加入时，合作就促成了。制作未完成时，我给斯科特看过电影片段，他会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他就像是一个图书馆，你想学习什么都可以去找他。☑



《离幸福就差半步》剧照



李乃文，一个“不正常”的演员

记者 / 黑麦

李乃文觉得，每个角色都得有点毛病才够真实，谁还没点毛病啊。

前一阵李乃文在家把胳膊摔了，缠着绷带参加了《特勤精英》的开播会，恰好他在剧中饰演的救火队长右肩有伤，于是“借花献佛”，告称：“为了配合宣传，我就在家也把自己弄伤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李乃文说话的时候嘴角总是上扬着的，像是含着一个快憋不住了的段子，这个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曾经演过的让人过目不忘的“小李美刀”，那是一种少年老成的劲儿，这让李乃文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

拍《特勤精英》的时候是夏天，李乃文裹着消防服爬上爬下，“把一辈子的汗都出了”。导演徐宗政爆料，亲眼见证了李乃文从胖到瘦的过程。前阵，电视剧热播时，有媒体提问，特勤精英队长郑志勇最后死了吗？李乃文暗自感叹，真死了就好了。

前不久，李乃文还在中间剧场演了出话剧《白

兔子，红兔子》，同台的是房子斌和柯蓝，这是伊朗编剧南星·苏雷曼波尔灵机一动的话剧方式，一切指令都不曾公开，没有排练，没有布景，甚至没有导演，演员在登台前才会拿到“剧本”，李乃文觉得演出很有意思，但是不能多说，随即露出一丝坏笑。

李乃文记得自己上一次登台表演话剧还是2004年，那是《恋爱的犀牛》的一次复演。在那之前，很多话剧观众还不知道李乃文这个名字，每次有人认出他时只会喊他“牙刷”。

在李乃文的印象中，话剧舞台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李乃文的母亲在天津人艺工作，有天妈妈问他，想不想上台表演，小乃文不解，母亲解释道：“演话剧意味着你从此以后不用去幼儿园，可以和我一起上班了。”自此，李乃文一连表演了四场大戏：《她》《火热的心》《吉庆有余》《天津战役》。

90年代中期，独立话剧和文艺青年还未盛行，李乃文凭借着“自认为很糟糕”的发挥考上了中戏，那时候表演系老师觉得他还不够灵，让他按收费生的标准入学。交学费的时候，李乃文看见同学交的钱少，一下子不舒服了。“当时是90年代，我爹是



《金水桥边》剧照

老中医，我妈也是拿死工资的，我哥刚结婚，为了我这一年5000多块的学费，老两口都去挣外快，累得慌。我当时就不想上了，我妈说：‘你上你的，我对你就一点要求，毕业的时候让主讲老师亲口对你说，当初让你自费是错的。’结果我第一学期就做到了。”李乃文说，“后来毕业很多年了，每次跟高老师一起喝酒，他就说后悔当初让我自费，我其实挺感谢他的，我当时就是一个得拿小鞭子勤抽的孩子。”

“我那会特别轴，一心想做话剧”，毕业那会，李乃文已经演过了孟京辉的《思凡》《坏话一条街》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正巧有个校友的爸爸，找他给电视剧演男一号，本来已经答应了的李乃文因为孟京辉的一句“咱最近有个戏要排”，就让给了一个叫丁凯的同学。

几个月以后，丁凯回来了，拿片酬请李乃文吃饭，席间问道他们的戏排的怎么样了，李乃文苦笑，还没开始拍呢。

这部剧就是《恋爱的犀牛》。之所以一拖再拖，是因为没钱。“真没钱，孟京辉两口子把房子押出去了，拿着小20万，带着我们到处排练，我们这帮人跟臭苍蝇似的让人哄来哄去，从电视机厂出来，最后落定在三联书店的地下室。”

李乃文演“牙刷”，一个圆滑的，欠了一屁股债的牙刷推销员，这个小角色也是整个剧中最讨喜的一位，几支牙膏广告，拼凑成了后来著名的舞台

剧台词，那会李乃文每天都在公共汽车上反复地叨念，很多乘客觉得他是神经病，和他刻意保持着距离。孟京辉评价他幽默感适中，李乃文自知，这种赖了吧唧又不讨厌，他挺擅长的。

彩排连带首演，安排在了实验话剧院。晚上7点演出，下午4点人就到齐了，李乃文、吴越一帮人照例坐在地上“敲三家”，不一会儿老孟就冲进来了，一边喊道：“你们都别打了！”一帮人抬头看了看他，接着出牌。孟接着嚷嚷：“我求你们了，出大事了。”李乃文这帮人才扔下手里的牌，随着老孟走到剧院门口。不一会，剧场探出几个脑袋，表情惊讶，李乃文记得，那是一个静悄悄的上百米长的队，从宽街的胡同口一直排到马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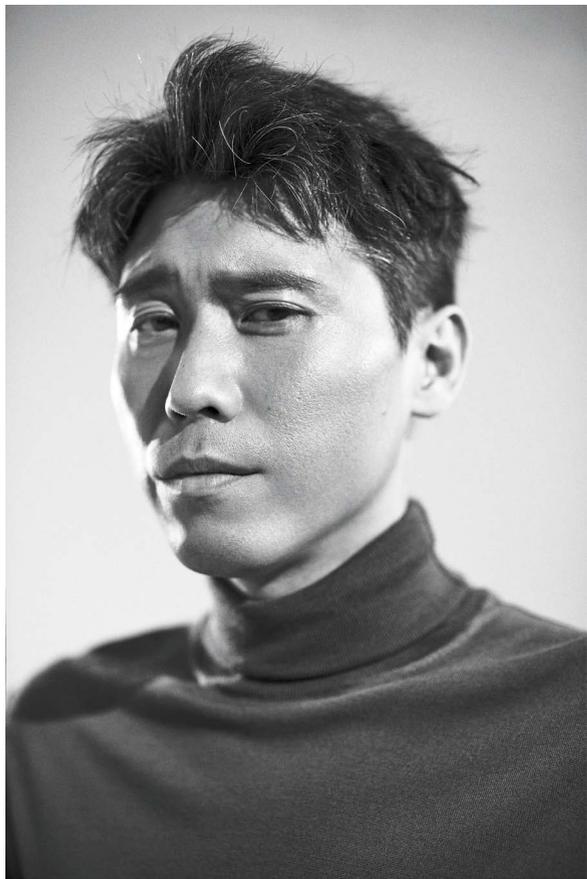
“好像就从这部戏开始，小剧场火了。”李乃文说。

“一场200块，还得上税”，国家话剧院的工资确实让李乃文活得像“牙刷”那样揭不开锅。分手了，欠了一屁股债的李乃文开始跑剧组、投简历，可导演们看见他的简历后像商量好一样统一回复：哟，光演话剧了，回去等信儿吧。于是，简历石沉大海。

后来他终于有了几个出镜的机会，开始接拍情景喜剧。多年后，很多观众看到李乃文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一种莫名的“喜感”，那或许是因为他曾经成功地饰演过一个“结巴”。据说这个结巴的原型是石康，那是2004年的电视剧《动什么别动感情》，这是李乃文正式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当年7000元一集的片酬，让他翻了身。剧中的“小李美刀”是一个喜欢聊姑娘的网络文学青年，说话口吃，逢人便笑，他明目张胆地在女友家饭局上录音，号称收集写作素材；再把女朋友家出的各种糗事写成小说，送给女友；他的那句“七，七，七他妈什么夕，就，就你，你这样，还跟我一块，七，七夕呢”，在多年后成为情人节段子。

粉丝对他的评价是“幽默、风趣、活泼、挺逗”，不过，这似乎并不能代表李乃文的戏路，随后，他在庄宇新的《爱情的牙齿》和冯小刚的《集结号》里，都找到了别样的状态。《借枪》里的杨小菊、《六块六毛六那点事》里的武越，以及再之后的《金水桥边》《钢的琴》里都有不少李乃文的思考。他坦言自己喜欢陈道明的演技，喜欢方鸿渐的唯唯诺诺和微不足道的孤傲，他也喜欢姜文，印象最深的是《末代皇帝》里打完老婆的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戒指，从里面抽出一根头发。他说演员自己的发挥，是对于一个角色的完善，刻画人物的毛病，会让观众相信这些角色的真实。☑

“我就喜欢演有毛病的人”



演员李乃文

三联生活周刊：说说你最近演的这个电视剧《特勤精英》吧。

李乃文：嗯，行。这是一行业剧，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次涉及消防员题材的片子，我是因为郑队长这个角色喜欢上这个剧的。我在戏里演是飞豹突击队的队长，林毅怀是我的队员，他一开始就跟我憋着口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姐姐，我的未婚妻，在一次救援行动中我没能给她救出来，所以这小子就变得恨我了，当然，我这个队长也是很纠结的，总之，这两个男人的梁子就这样结下来了，但是又没有人知道，这是他们心底的秘密。

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剧本有点问题，我也一直

在跟编剧聊，特别是这个结尾。我觉得我应该是相同的情况发生了，我被困在现场，林毅怀眼睁睁地看着我却没法给我救出来，我觉得这时他才能明白一切，于是我光荣牺牲了，他们生活继续。这多好。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呢。

李乃文：然后，导演死活不让我死啊，我说你就让我死了吧。最后的结局是，我受了重伤住院，眼看着就给我救活了，完美结局。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局对队长不算完美的交代。因为未婚妻遇难后，他的整个性格都变了，从开朗变成了一种压抑的病态，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的性格，我同情他，我觉得他有点想死。死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希望是留给那些年轻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动什么别动感情》里的小李美刀，让人印象深刻，当时你是怎么找到那种表演的感觉的？

李乃文：当时导演唐大年看过我演的“牙刷”，觉得我演肯定没问题，在和贺佳音这个角色试戏的时候，他说，乃文，我觉得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说哪儿不对，你告诉我。他说，我说不出来。我说，你要说不出来，那可就没办了。

后来吃开机饭的时候，来了好多人，王朔、石康都来了，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导演让我留意观察石康，我看了一会，心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石康基本就算“小李美刀”的原型了，我觉得这个角色很可爱，他说话总是笑着，仿佛有一种自己的态度。口吃的时候，也是自然流露的，那是属于他的一种叙事节奏，嘴上断了，可脑子完全没断。反正演完这戏，落下一大毛病，有一阵跟谁说话都结巴。

三联生活周刊：你接下来还准备拍话剧吗？

李乃文：没了，公司不让。我喜欢话剧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它最符合创作规律。

我接下来是一年代戏，主旋律的，叫《大运河》，之所以接这部戏，也是因为这角色有毛病。戏里的三个人物是济宁三杰，官商文，哥仨，我演这个文，当时我想的是一定把这个人的酸臭给演透了，让人觉得讨厌那种，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个人心中有大义，他可以为了保护文献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这个点撑着，这种反差能让一个人活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好像从小时候就开始演话剧了？那时候主要演的都是什么角色？

李乃文：主要演孙子呗。

当时有个老演员叫左杰，他特别怕我给他挑错，一下台我就跟他说，左大大，你又说错台词了。小时候上台一点都不紧张，因为啥都不懂，但是当时我就特别投入，记得我在天津战役里扮演一个小通讯员，后来牺牲的时候我躺在舞台上，提醒自己不能喘气。

我妈跟我说过一件事我都不记得了，有次开场前，她突然找不见我了，就急了，最后发现我在幕布后面呢，我妈说她当时就喊我，问我干吗呢，她说我当时特别不屑地看了她一眼，说检查道具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喜欢演什么样的人？

李乃文：说人性有点笼统。现在我们看好多人都是个符号，跟神儿似的，可能和我演过舞台剧有关，我觉得人的鲜活表现在他的多面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人之分，我们喜欢的那些牛的英雄人物都是有点毛病的，这样的人接地气，让人相信他的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姜文和陈道明，你还有什么喜欢的演员吗？

李乃文：达斯汀·霍夫曼、爱德华·诺顿，他

们都有一种往里收的劲儿，说话也是慢吞吞，但是你能看出来那种内心的强大。

我最近看《敦刻尔克》，我就想，最后的那个飞行员为什么就一直不跳伞，最后降落在敌占区啊？我觉得有很多考量，比如他需要毁掉飞机上的数据，比如他想远离撤离区降落，比如他对那架飞机是有感情的，我觉得，他不想让撤离的人看到他跳伞，他想保留一种希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恋爱的犀牛》里演“牙刷”的时候，觉得这个角色有什么特点。

李乃文：他这人，最大的原则就是没原则。你记得有句词儿没有，“如果我中了500万，都用来还债”，所以他这人随和。

想起一事儿，有次在人艺的大剧场演出：灯一亮，哥仨打牌，我走上台一摸，完了，包里没装牙刷，没辙，就生演，一边演一边给段奕宏他们使眼色，结果嘿，谁也没看出来，最后那段他们问我牙刷呢，我临时改了句词儿——“回头给你啊”。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问孟京辉看了吗。他说，看了啊，挺好的。我又问他，没看出什么来？他说，没有啊，怎么了？我说，哦，没事。☑

松果

手作

艺术

美酒

演出

亲子

旅行

松果是一个舞台，这里有：
有品质的文化活动
富含营养的生活知识
一万个迷人的生活家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松果生活

与一万个生活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扫描关注松果微信

扫描下载松果 APP



【视觉中国供图】

梅尔·布鲁克斯和第二任妻子安妮·班克罗夫特，二人育有一子。安妮在《毕业生》中扮演的鲁宾逊夫人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金牌制作人》和它背后的喜剧传奇

记者 / 驳静

1968年的电影和2001年的音乐剧，《金牌制作人》这个IP都获得巨大的成功。人们一方面好奇为何同一批笑话30年都不过时，另一方面又惊讶于这些笑话的坏品味竟然让人心生敬意。而梅尔·布鲁克斯就是这一切的缔造者。

脱口秀式音乐剧

西班牙人流传一句俗语，说有钱人笑得谨慎，因为他们有太多可失去，穷人就不同了，给点阳光就灿烂，因为他们有太多需要忘掉。

有点儿道理。笑的当下，至少可以逃避现实。社会学家乐意以此去解读某次喜剧风潮出现时的社会大背景。比如，为何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反而正是美国喜剧电影甚至整个电影发展的黄金年代？“神经喜剧”这个电影类型就诞生于此，发展了20年才走向衰落。比如，百老汇音乐剧《金牌制作人》（*The Producers*）2001年一口气拿下12项托尼奖，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打破，是否也跟纽约刚刚经历过“9·11”恐袭有关？

无论是否有关，《金牌制作人》终于巡演到了中国，而这大概是我看过的最好笑的音乐剧。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当晚，现场观众统统乐不可支，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正身处一个脱口秀节目现场。

它讲的故事今天看来挺俗套。百老汇制片人麦克斯·毕亚利斯托克（Max Bialystock）并不得志，里奥·布鲁姆（Leo Bloom）则是饱受欺压的会计师，两人发现制作一部失败的音乐剧，才能让制片人利益最大化。于是二人开始了寻找最差剧本、最差导演和最差演员之旅。哪知这二位连“失败”这件事都成功不了：名为《希特勒的春天》的音乐剧竟大获成功。

这部音乐剧后来传播最广的一首曲子叫 *Keep It Gay*。Gay 一词除了“同性恋”外，还有一个意思是愉快。这类双关语在《金牌制作人》里不少见，它或许需要一定英文基础才能欣赏得了，至少完全借助字幕，会失掉它一半精髓。但看上去这并未影响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金发瑞士女郎乌拉去麦克斯办公室里应聘，问道：“Do you have a position for me?（是否有适合我的职位？）”里奥见到美女油嘴滑舌起来，他说：“We have several positions for you.（他在这句里使用了 positions 另一个词意“姿势”）”

当然，双关语的精髓都在不言中，一旦较真解释起来，风味全无。

人物设置也是毫不掩饰的刻板印象。制作人通常不会很高，但一定壮，这样才能撑得起抽雪茄的

画面。在家穿的当然是夏威夷风情的艳丽浴袍，出门除了西装，还必须有顶绅士帽。会计师严谨木讷，连带着脸型都是毫无特色的四方脸，出门一定带着伞和公文包，卑微地怀有一个梦想。金发瑞士女郎名字必须长而拗口，在浓重的瑞士口音下讲出来是个笑点，身材玲珑而且单纯无脑。以至于后来在2005年再度改编的电影中，在昆汀的《低俗小说》里大放异彩的乌玛·瑟曼（Uma Thurman），其实并不非常符合这个角色，尽管她实在非常之美。

除此之外，导演罗杰（Roger De Bris）格外出彩，他被设定为“变装皇后”，外表艳丽内心戏丰富。两位制片人来到他们认为最烂的导演皇宫般的家中，想说服他来导这部音乐剧。罗杰一出场就是舞会晚礼服，他十分担心这身华丽的裙子会不会让他像克莱斯勒大厦（他的担心很有道理）。他的助理则是同性恋形象的另一种典型，高瘦，身材好于是穿着贴身，他行事扭捏，但走路像是在跳舞，除此之外还有点娘娘腔。这两种刻意的类型化，几乎概括了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戏精和娘娘腔。最后一幕里，冲突发生，制片人办公室里一片混乱，大家落荒而逃，胆小的助理喊：“Let's get back to the closet.（让我们回到“柜”中去。）”

串戏的阿道夫

麦克斯跟里奥正在办公室里挨个儿筛选剧本，他们试图找出其中最烂的一个。“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蟑螂。”如此明显的卡夫卡《变形记》模仿，显然跟“有才”离得甚远，但在麦克斯看来，这仍然“过好”。他丢掉这本，读下一本，不停地读，直至读到一个名为《希特勒的春天》（*Springtime for Hitler*）的剧本，他才觉得，不错，就是它了。

剧中逻辑是，还有比把希特勒当音乐剧主角更烂的主意吗？现实中，《希特勒的春天》则是一切的缘起。

最早，这个标题只是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在他参与的第一个音乐剧《全美国人》（*All American*）的记者会上随口讲出来的玩笑。不过他显然很喜欢这三个单词组成的意象。他头脑里有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希特勒形象：一个维也纳男孩年轻热血并热爱舞蹈。布鲁克斯试图在舞台上展现这个



上、下图：《金牌制作人》本次中国巡演剧照，第一站在上海，12月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奇特设定的人物，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于是他先写了一部小说，把“希特勒的春天”作为戏中戏放了进去，希特勒和音乐剧混搭未能给发表提供助力。小说发表失败。接着他又花了9个月时间，将故事改成电影剧本。在布鲁克斯的电影才华还未被世人见识过的上世纪60年代，制片厂都拒绝了他，认为跟希特勒有关的笑料品味实在太坏，《全美国人》实际上演了40多场后也匆匆收场。愿意给他投资的制片厂则表示前提条件是把他希特勒改成墨索里尼。

终于有位名叫西德尼·格拉齐耶(Sidney Glazier)的独立制片人决定投拍(后来这成了他人人生中最得意之事)，没想到这部预算才100万美元的低成本电影，第二年入围了奥斯卡。更何况这是布鲁克斯执导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在那之前他还只有点儿舞台导演经验。在当届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提名影片中，布鲁克斯迎面撞上的是库布里克和他的《2001太空漫游》，即便如此，他还是赢了。

直到2001年，时隔30多年，布鲁克斯将自己的成名作改编成音乐剧，并且自己作词、编曲，当年托尼奖中，《金牌制作人》获得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剧本、最佳曲谱等在内的12个奖项，上一个纪录保持者还是近40年前的《你好，多莉！》(Hello, Dolly!)。

戏中戏是整部音乐剧的高潮。原本扮演阿道夫的演员在开演前十分钟摔断了腿——“break a leg”原本是戏剧界常用的祝贺语，罗杰作为导演，只好亲自上阵。这样一来，阿道夫的扮演者成了整个纽约都闻名的“变装皇后”。纳粹首领和变装皇后从肌理到毛发，全方位产生冲突。戏中戏在戏中大获成功，《金牌制作人》也借助这个桥段在现实中博得美名。它在芝加哥首演后，很快转战百老汇，从2001到2007年共演出2500多场。2004年伦敦西区版本开演至封厢也有近千场。2005年，这部音乐剧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串戏的阿道夫履历绕了格外大一圈——以音乐剧为主题的电影被改编成音乐剧后又改编为电影——而阿道夫在所有的改编中都是戏眼。

喜剧之王

当然，《金牌制作人》携带的是梅尔·布鲁克斯风格标签。就像百老汇通常将制作人名字写在宣

传板最醒目处，梅尔·布鲁克斯这个名字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喜剧界大明星。由于他跟喜剧的粘连过于明显，当他后来也开始尝试给其他类型电影做制作人时，他得注意不让它们跟自己的名字挂钩。例如大卫·林奇1980年获得奥斯卡8项提名的《象人》(The Elephant Man)就是梅尔·布鲁克斯为其制作，为此他很小心地回避使用自己的大名。

1968年，电影《金牌制作人》获得成功后，布鲁克斯开始拍摄一些“恶搞经典”的喜剧，其中《灼热马鞍》(Blazing Saddles)和《新科学怪人》(Young Frankenstein)票房都很高。

1975年，《花花公子》给布鲁克斯做了一个长篇专访，至今仍是关于这位喜剧传奇人物的采访中最值得阅读的一篇。2015年，《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重新拿出了这篇报道，并用40年后总结性眼光将布鲁克斯跟弗朗西斯·科波拉相提并论。“1974年，科波拉有两部电影上映，《教父2》和《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很难想象还有哪位导演能在同一年内产出两部值得回味的电影。同年，布鲁克斯执导《灼热马鞍》和《新科学怪人》先后上映，这并不一定是他最好的两部作品，但一定是推他进入好莱坞巨星行列的两部作品。”

这两部喜剧片奠定了布鲁克斯在好莱坞的地位。也正是从《灼热马鞍》开始，这位出生在布鲁克林的小个子犹太人才开始真正赚到钱。这个描述立刻让人想到另一位同样出生在布鲁克林的犹太人伍迪·艾伦。实际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两位显然有许多共同点的喜剧人已经被公认为美国最成功的喜剧片导演。当然，布鲁克斯还是要老一些，讲的笑话也更露骨一些。

喜欢布鲁克斯的人觉得他的作品实在太好笑，就像在音乐剧《金牌制作人》现场感受到的欢声迭起一样，热闹。也有人认为布鲁克斯的电影粗俗。不过他总是用“bullshit”(胡说八道)这句粗话去回应记者的询问，正如他在作品里用粗俗应对粗俗，“我完全有另一套词语可以代替，但是我不，而且我引以为豪”。

粗俗意指明确。一类是性主题笑话。比如《金牌制作人》里就有类似桥段。来应聘的乌拉跳完一段身材毕显的舞蹈后，麦克斯和里奥都静坐于沙发不动，只表示说“部分的我其实已经站起来为你鼓

60年代是如此令人向往，那时候的观众可以轻松地享受性别笑话而不用遭受道德谴责，不像今天，随时随地都担心在冒犯谁，“人类堕落到需要严守政治正确”。

掌了”，现场笑声就发生在他说到“stand up”这个词之时。

另一类是排泄物主题笑话。这两类笑话实际才是最能够跨越国家和文化的类型。

1976年，梅尔·布鲁克斯创作了《恐高症》(*High Anxiety*)，讲一个患有恐高症的精神科专家去到疯人院当院长的故事。他给希区柯克写去一封信，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恶搞了大导演的《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迷魂记》(*Vertigo*)和《惊魂记》(*Psycho*)。“我专做类型恶搞(genre parodies)，在我的理解里，你本人就是个类型。当然，我说的不是你‘希胖’这个胖子的特殊类型，而是说你电影作品里独树一帜的类型。”

希区柯克收到信，召唤布鲁克斯去他办公室，帮他改了改剧本。“《群鸟》(*The Birds*)呢？为啥没有这部片子里的桥段？要不你就让鸟群们用它们的粪便攻击你，我的意思是，这也很好笑啊。”布鲁克斯当然觉得希区柯克说得在理。电影上映时，希区柯克还给布鲁克斯送去一箱61年的波尔多名庄葡萄酒。“后来我把这酒卖出了一个很贵的价格，希区柯克在天之灵应该会特别高兴。”

有些喜剧创作者在生活里严肃寡言，但布鲁克斯讲笑话的欲望一刻都停不下来。

为整个国家“放屁”

音乐剧《金牌制作人》上演后，许多人感慨，原来60年代是如此令人向往，那时候的观众可以轻松享受性别笑话而不用遭受道德谴责，不像今天，随时随地都担心在冒犯谁，“人类堕落到需要严守政治正确”。制片人、会计师、金发尤物、瑞士人讲英语、百老汇同性恋舞蹈演员，甚至有钱寂寞的老太太，这些都是《金牌制作人》里异常尖锐的刻板印象。他们被布鲁克斯转化成喜剧模型，效果则是，俗套

而刻板的人物设置本身就成了一种反讽。

但布鲁克斯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粗俗和反讽之间寻找到一处制衡点。恶搞传统恐怖片的《新科学怪人》1975年上映时，《纽约时报》记者记录他看到的景象：在旧金山的电影院里，观众们一边尖叫一边狂笑，这甚至在片头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后来制片厂为布鲁克斯敞开大门，21世纪福克斯公司在《新科学怪人》上映时，写着“梅尔·布鲁克斯新片，大师级作品”的广告牌铺满了公司停车场，事实证明，这部投入200万美元的电影，最后票房有15倍之多。

《金牌制作人》写满了对制作人功利、贪婪的嘲讽，但你又没办法说它是部“自嘲”之作。因为创作它时，梅尔·布鲁克斯离好莱坞大佬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其实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大佬”式的人物，那个时候的好莱坞比现在要清明一些，抽着雪茄的制片人房间里的红沙发并不像哈维·维恩斯坦一样明目张胆。

布鲁克斯虽然离过一次婚，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 Bancroft*)在一起生活直到后者2005年去世。布鲁克斯自己的说法是，安妮是百分之一千的演员，也是百分之一千的妻子。他们结婚时，安妮已经凭借阿瑟·佩恩(*Arthur Penn*)的《海伦·凯勒》(*The Miracle Worker*)获得第35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后来又因为《毕业生》中女主角名噪一时。

所以上世纪80年代，已经是小老头儿的布鲁克斯已经被许多喜剧人奉为领路人，卓别林之后，没有人比他启发过更多年轻人进入喜剧领域。等到2001年，时隔30多年重新创作《金牌制作人》音乐剧时，他又成了更老的老头儿。但创作依然不止，就跟人们今天感慨伍迪·艾伦一年一部电影的创作力一样。《金牌制作人》的成功还促发了另两部改编他早期电影的音乐剧，他在喜剧方面的想象力粗暴而没有边界，人们最终为布鲁克斯折服，认为由于他的存在，坏品味都有了令人尊敬之处，以至于人们称呼他“为国放屁的人”(the farter of his country)。

《金牌制作人》拿到12项托尼奖后，布鲁克斯成为为数不多的EGOT——艾美奖、格莱梅、奥斯卡和托尼奖大满贯——名单上的一员，这个名单上目前的人数总共才12人。今年他92岁，成了传奇。✎

去世界尽头 唠嗑和欢歌

#趁年轻 去南极#



LIFE+演讲南极专场

时间：2018.1.16-1.31

地点：南极飞猪号

演讲嘉宾

胡德夫：台湾民谣教父，代表作《匆匆》

张悦然：作家，著有《茧》《我循着火光而来》

谷岳：环球旅行者，著有《搭车去柏林》

郝景芳：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

扫码参加



1



2



3

1.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约1495~1498年,油画壁画,米兰恩宠圣母教堂

2. 传达·芬奇,《救世主耶稣》,约1490~1519年,木板油画,45.4×65.6厘米

3. 达·芬奇,《东方三智者朝圣图》,约1480~1482年,木板油画蛋彩,243×246厘米,佛罗伦萨乌非兹美术馆

挑战达·芬奇：《美丽的公主》之谜

文 / 龚之允

《救世主耶稣》是今年秋季国际拍场上最大的明星，最终的成交价格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抛开这些年围绕它的争议不谈，实际上英国还有一幅彩色手绘作品，与达·芬奇扯上了关系，那就是《美丽的公主》。

奇画奇人

最近达·芬奇的《救世主耶稣》在纽约佳士得公开拍卖，这无疑在今年艺术品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早在2011年，这幅绘画在英国国家画廊的参展就引发了现象级的争议，因为这是参展物品中唯一一幅非公众机构收藏的达·芬奇油画作品，虽然仅得到部分专家的认证，却顺利地入选参加了史上最完整的达·芬奇纪念展。甚至有说法认为，这次展览就是为了坐实《救世主耶稣》是原作而举办的。英国国家画廊的公信力在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抛开《救世主耶稣》的争议不谈，实际上英国还有一幅彩色手绘作品，与达·芬奇扯上了关系，那就是《美丽的公主》(La Bella Principessa)。

这是一幅少女侧身像，使用的材料是黑、红、白三色炭笔，被画在羊皮纸上，并被裱在了橡胶板上。这幅画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资深教授马丁·肯普(Martin Kemp)的鉴定，认为是达·芬奇的真迹，画中主人公很有可能是达·芬奇的雇主，也是米兰的僭主卢多维克·斯福扎(Ludovico Sforza)的私生女比安卡(Bianca)，因此他给这幅画取了一个非常文艺复兴式的名字《美丽的公主》。这种说法还得到了近10位来自世界各大名校和认证机构专家的认可。2010年肯普把他对该画的研究专门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可见这幅绘画在真伪认证上应该是非常严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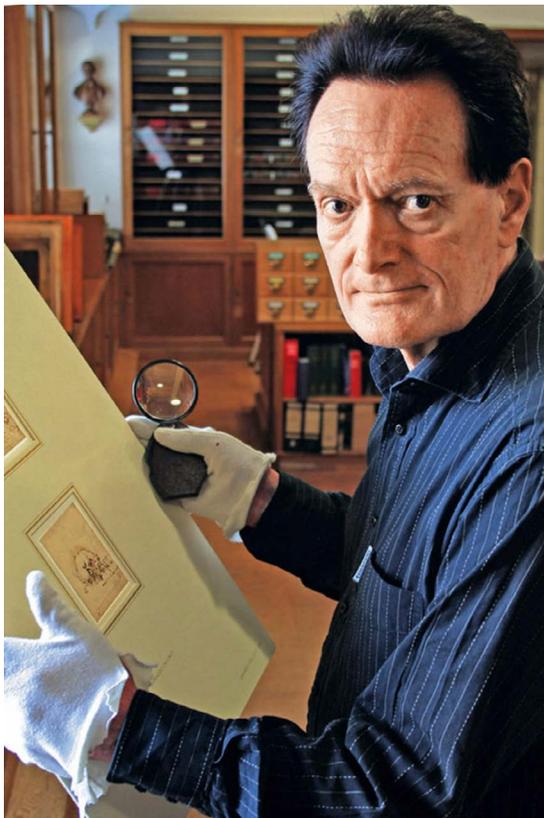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2017年5月27日，英国《卫报》

独家报道了专文，现年56岁的英国著名造假大师肖恩·格林豪(Shaun Greenhalgh)公开表示，这幅所谓的达·芬奇真迹，不过是他18岁初出茅庐时的习作。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格林豪的说法成立，他不仅挑战了那些满腹经纶、阅宝无数的专家，而且也直接挑战了达·芬奇。试想一个18岁，几乎没有接受什么古典绘画训练的英国人，居然能够就这样画到了达·芬奇的水平，这也不得不说是一桩奇闻异事。

据格林豪的说法，他是在1978年绘制的这幅画，并以8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画商，当时他并没有把这幅画当作达·芬奇的真迹来卖。1998年这幅画在纽约佳士得的拍卖价格已经达到了近2.2万美元，但当时佳士得认证这幅画是19世纪早期德意志画风，主人公是一位身着文艺复兴式服装的少女侧身像。而到2010年肯普认证这幅画是达·芬奇手绘本之后，该画的估价一下子就蹿升到了1.5亿美元。这让格林豪非常震惊，他说一开始还不敢确信这就是自己当年画的。2015年，他在米兰的一次展览上对该作进行了近距离观察，认为画中女性背带上的蝴蝶纹饰就是自己当年作为装饰品画上去的，而画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什么比安卡公主，而是英国一家超市的一位叫作莎丽的女服务员。

挑战达·芬奇的难度

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多元



左图：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马丁·肯普，是他为这幅画取名《美丽的公主》并鉴定为达·芬奇真迹

右图：传达·芬奇，《美丽的公主》，约1495~1496年，羊皮纸本三彩绘，33×23.9厘米

快捷，但即使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要仿造一幅达·芬奇的作品，以假乱真，也绝非易事。

达·芬奇被公认为文艺复兴艺坛三大巨匠之一，并且是最年长者，可谓开创全才式（文艺复兴人）的奇才，但实际上后世对他作品的学习、仿制和伪造远不及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1. 达·芬奇的完整传世彩色作品不足10件，油画作品也不过10余件，大多藏于贵族府邸，常人不易借阅。2. 达·芬奇彩色成品绘画的题材也不够丰富，规模最大的也就是《最后的晚餐》这样的十几人群组肖像油画，而《东方三智者朝圣图》虽然是大型群组肖像，达·芬奇并没有完成就弃之不理了。这也为后人学习和仿制带来了一定的麻烦。3. 达·芬奇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法非常具有个人色彩，为了获得“薄雾法”的朦胧感，他使用的是自己特制研磨的彩色颜料。然而这类颜料不幸地使用了易挥发油，使得传世作品表面很容易出现龟裂，如果不妥善修复和保存，最后会出现严重的变色，甚至彻底损毁。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伪造达·芬奇作品变得非常不易，难度无异于自成大师，说到底必须靠天赋、勤奋和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那么《美丽的公主》是否为达·芬奇的真迹呢？这幅画的认证是否能听信格林豪的一面之词呢？格林豪曾因制造其他名家的伪作而在2007年被英国警方抓捕，锒铛入狱4年多，既然他能够制造假画，那么制造一些假的证词想来也是手到擒来，他的话真的可以相信吗？

真迹依据

鉴定一幅作品的真伪，手法无非这几种：1. 流传有序；2. 材料论证；3. 技法风格。把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全部有直接的确凿性证据，那么作品就可以判明是真的了。反过来说，如果这三种鉴定手法，无论哪一环节出现矛盾，就可以证明作品是假的。这当然是鉴定的理论和逻辑，而实际上，

很多鉴定的结果是无法直接证明其流传和材料，但又没有关键的证据可以反驳，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争议，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至于技法风格，也都只能旁敲侧证，因为大多数伪作的基础就是风格学。如果连风格技法都没研究好，就去造假，那伪作是无法登大雅之堂，供专家们坐而论道的。

《美丽的公主》的鉴定也同样属于保有争议空间的那种。从流传有序这条线索来看，只能往前推到1955年，而有正式文书证明则要到1988年。虽然西方古董市场规范化做得要比中国早，但实际在流传有序的梳理上，要到60年代以后才开始规范化，也就是造假大师格林豪成长起来的那个年代。格林豪曾说，他年轻时造假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善于包装的画商攫取了，因为画商有专业的文档资源，可以巧妙地把流传记录编织得天衣无缝。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知识资源的共享开放，格林豪逐渐学会了怎么编造源流，于是他就可以单干，并赚取巨额的利润。

《美丽的公主》可查的拍卖记录也就只到1988年，拥有者的记录，也只能大概查到1955年，其人是一位艺术修复人员。在这样的故事里，根本无从考证《美丽的公主》是否与达·芬奇有关，就好像一幅敦煌壁画残片的原拥有者是张大千一样，也只能让人将信将疑。因此1998年佳士得的鉴定结果是非常克制的。

肯普在源流上梳理找到的衔接是一本藏于波兰华沙的“斯福扎”羊皮卷。该羊皮卷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时候做过重新装帧，而羊皮卷本身制作于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是斯福扎家族为纪念家族史而订制的。达·芬奇作为斯福扎的御用画家，承接了羊皮彩绘的项目。而羊皮卷中的缺失页，大小基本可以和《美丽的公主》对上。从源流上，有可以间接证明是达·芬奇原作的可能性，不过仍缺乏直接证据。

而从材料上论证，有几点可以与达·芬奇的创作方式相对应。首先，三彩炭笔彩绘羊皮法是法国的一种传统技法，而达·芬奇曾于1498年和数学家路加·帕西欧利(Luca Pacioli)合作出版的《神圣的比例》(De Divina Proportione)插图本中运用了这种技法。在达·芬奇的笔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曾向于1494年造访米兰的法国羊皮卷画家让·皮尔瑞尔(Jean Perréal)学习了如何在羊皮卷上用三色炭笔画画。第二，2009年，艺术科学法医鉴定师曾发现画面左上角有一个手指印，这和达·芬奇的《野外的圣杰罗姆》

上残留的指印非常相符，并且，这一指印也是达·芬奇绘制背景远方小山时所运用的特殊技巧。这一点，是证明该画是真迹的非常有效的证据。第三，根据碳14鉴定法，画中的白色铅，起码有225年的历史。当然，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很容易地推翻，因为老料新作在中国早就成了造假的传统了。

剩下的推论，只能从风格技法上去分析了。首先，从绘画笔触来看，《美丽的公主》是出自一位左利手的手笔，这也符合达·芬奇的作画习惯。其次，这幅画的比例约为根号二矩形(长宽比为 $1:\sqrt{2}$ ；约为 $1:1.41$)，这是达·芬奇在米兰画肖像的惯用比例。其三，人物头像的五官比例符合达·芬奇绘制的《神圣的比例》，该数学图书中有不少是达·芬奇总结出来的比例。不过如果造假者花了工夫，按照这本书的法则来绘制，也不是没有可能。第四，斯福扎家族成员画像惯例是用侧身像，而情妇等非血缘相关的人员则不会使用这种格式，由此可以认为这是比安卡。而在英国皇家收藏的达·芬奇素描手稿真迹中，可以找到和《美丽的公主》相似的图像。第五，《美丽的公主》衣服上的纹饰和达·芬奇为自己米兰工作室所设计的标记一致。第六，《美丽的公主》有很多修改的痕迹，修改人是右利手，修改的地方明显不如未修改的底层绘画手法高明，而且原画者对人物的细微刻画上水平超出常人。

当这么多资料和证据罗列出来之后，大家也许心中有了一定的判断。笔者认为，如果指印这一鉴定的结果是客观的话，那么造假大师格林豪没有可能在18岁的时候可以画出《美丽的公主》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他既无法得知《野外的圣杰罗姆》远景的小山是指头皴法画出的，也不可能有关达·芬奇绘制人物比例的知识存储。那么他为什么要在2017年5月这么向媒体披露《美丽的公主》是他画的呢？原因其实不难揣测，因为2017年6月1日，他出版了一本自传《造假者的传奇》(*A Forger's Tale: Confessions of the Bolton Forger*)。

《美丽的公主》只能认证为达·芬奇所画，虽然马丁·肯普的研究非常值得尊敬，他和其他达·芬奇专家都深入地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揭示了许多达·芬奇过去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确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是达·芬奇的真迹。这和《救世主耶稣》的真伪论证是一个道理，属于常见的真伪鉴定的第三个结果——推敲的证据都摆在面前，没有确定性的反驳理由，至于画作是真是假，作为专家的肯普有没有他因，只能靠信仰了。■

对称的宇宙

记者 苗千

对于刚刚从一场大爆炸之中诞生出来的宇宙，所要面对的最严峻问题——在很多物理学家看来——就是如何不马上又消失于无形之中。根据人类用来描述物质世界基本粒子的性质和行为的数学框架——标准模型的描述，宇宙大爆炸应该产生出数量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而这两种物质一旦相遇，就会立即发生湮灭，转化为能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宇宙中或许本来就不应有任何物质存在。问题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存在来证明，经过了140多亿年的演化之后，宇宙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物质，而相比之下，反物质则显得极为稀少，至今也没有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任何威胁。

反物质究竟在哪里？是已经通过湮灭几乎消失殆尽，还是大量存在于宇宙的某个区域？在宇宙诞生之初，为什么物质与反物质并没有同时消失？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困扰着物理学家们。一方面标准模型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它可以描述宇宙中的大部分物理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为物理学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悖论。就连宇宙自身的存在也显示出标准模型并不完备，人类的探索仍未完成。

宇宙并未消亡于诞生之初，而且在目前看来物质远多于反物质。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物质与反物质之间存在着极其细微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让物质逐渐在宇宙中占据上风。这种差别究竟在哪里？物理学家们测量了质子与反质子的质量、电量，都显示完全相同或相反（反质子带有负电荷），呈现出完美的对称。于是一些物理学家把寻找细微差别的希望寄托于两种粒子的磁性上。

想要精确测量单个质子的磁性尚且困难，要测量一个反质子的磁性难度自然更高。在实验室中制造和保存反质子本身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在

测量的过程中更是不能让其与任何物质相遇。因此，尽量精确地测量反质子的磁矩，对于物理学家们来说，本身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挑战。最近，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一组科学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实验，把人类对于反质子磁矩的测量精度在此前的记录上又提高了上百倍。2017年10月20日，他们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于反质子磁矩的十亿分率精度的测量》（*A Parts-per-billion Measurement of the Antiproton Magnetic Moment*），展示出人类对微观世界中单个粒子的超强操控能力，同时这个结果也加深了人类对于反物质的迷惑。

在欧洲核子中心“重子-反重子对称实验合作项目”（BASE Collaboration）工作的物理学家克里斯琴·斯莫拉（Christian Smorra）说：“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显示出了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完美对称，这就是为什么宇宙真的不应该存在的原因。”这样的评论透出一些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之中也有着实验物理学家的自豪。

在BASE合作项目工作的科学家们于2014年首先精确测量了质子的磁矩，他们把一个质子限制在磁场中，然后再施加外部磁场对质子自身的磁矩进行测量。随后他们需要反质子进行同样的测量操作：研究者在2015年制造出了反质子，之后一直把它悬浮存储在一个特质的容器中，使其不与任何物质相碰。因为容器的设计极其精妙，使反质子始终没有发生湮灭，被创纪录地保存了405天，这样稳定的储存环境也使研究者们有条件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随后BASE合作项目对反质子磁矩的测量精确到了小数点后9位，而除了符号不同之外，它与此前对质子磁矩测量的数值完全相同。

在哥伦比亚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皮特·沃伊特（Peter Woit）看来，这次对反质子磁矩的精确测量算是一次漂亮的实验，但无关宇宙本身的存在与否。这个测验可以算是人类对电荷-宇称-时间对称性定理（CPT Symmetry）的一个实验验证，与电荷-宇称不变性（CP Symmetry）无关，其结果也符合理论的预测。只是通过标准模型的预测，人类并不知道在宇宙诞生之初，物质是否大大多于反物质。

反物质究竟在哪里？是已经通过湮灭几乎消失殆尽，还是大量存在于宇宙的某个区域？在宇宙诞生之初，为什么物质与反物质并没有同时消失？



物理学家尼玛·阿卡尼-哈米德，他是当今理论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问题不仅限于物质与反物质之间。在形式上非常完美，已经由实验充分验证的标准模型，已经成为人类理解自然界深层次美感的典范，但这个完美的结构也让物理学家感到深深地迷惑，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断绝了物理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在标准模型所预言的所有基本粒子都被实验发现之后，物理学家的目标就迅速转变为发现新粒子，以此作为超越基本模型的突破口。

至今为止，全世界所有的高能物理学家都还被限制在标准模型之内。正因为如此，每发现一个新粒子的疑似信号都会令物理学家们激动不已。从2015年12月开始，欧洲核子中心的ATLAS和CMS探测器分别探测到了异常信号，这可能是出现某种新粒子的征兆。尽管这种异常与真正的发现距离尚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物理学家们就已经发表了500多篇试图分析解释这种新粒子的论文。

经过反复的验证之后，物理学家们意识到此前发现的高能量光子信号只是异常，此前的激动也只是空欢喜一场——物理学又回到了原地。令人气馁的情况还不只如此，在欧洲核子中心的ATLAS和CMS探测器，每个研究组都有超过3000名高能物理

学家在工作，他们分析着大型重子对撞机进行的每一次粒子对撞，几年的时间里人们没有发现暗物质的痕迹，没有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表亲，没有发现时空更多的维度，也没有发现超对称理论所预言的各种各样的超粒子。

人类的物理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迷茫，在圆满的标准模型之外，物理学家们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荒芜，这种荒芜是否蕴含着某种深刻？对于物理学家们近几年来在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失败，目前理论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尼玛·阿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众多物理学家做出了各种预测，居然没有一个正确。

除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真实身份需要被解开之外，物理学中还有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超出基本模型的理论给出解释。例如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在物理学家们看来非常的“不自然”，是出于某种对称，还是在宇宙诞生之后被“塑造”至此？在粒子对撞实验中迟迟无法发现新粒子，这是否会为物理学家们带来某种灵感，转而发现关于宇宙整体的某种结构？（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和《Quanta》杂志的报道）

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

文 / 袁越

艺术圈有个说法，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意是说，一个好的艺术家不一定非得按照西方标准，去做所谓的主流艺术，你只要把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做好了，照样能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这个说法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审美标准都是一样的。某个民族觉得很美的东西，另一个民族也应该觉得美。

这个大前提在音乐行业有个非常有名的疑问，那就是不同人对于和弦的和谐程度的感受到底是不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民族，把不和谐和弦同样视为美？

和弦理论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础理论，也是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一项发明。曾经有人怀疑过这个理论的普适性，但该理论的支持者反驳说，你随便去试一个中国人，看他到底是喜欢和谐和弦还是不和谐和弦，答案肯定是前者，这就说明和弦理论是普适的。

但是，仔细一想不难发现，这个假想中的实验存在重大破绽，那就是当今中国已经很难找出一双没有被西方音乐“污染”过的耳朵了。我们从小到大听了不知多少流行音乐，它们大都是按照西方音乐理论写成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听觉习惯已经西方化了，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约什·麦克德莫特（Josh McDermott）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团队专程去了趟玻利维亚，从该国境内的奇玛内（Tsimane）原始部落找来了64位原住民。这个部落一直生活在亚马逊丛林里，从来没有和外界接触过，因此他们从没有被西方音乐“污染”过。

另外，这个原始部落的传统音乐只有旋律没有和声，所以他们的耳朵甚至没有被和声“污染”过。

研究人员先给这64位原住民播放人的笑声和喘息声，让他们评判自己喜欢哪一种声音，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前者，说明在这些基本的方面他们和其他人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完全能够听懂研究者的问题。

然后研究人员再给他们播放不同类型的和弦，包括和谐的、不怎么和谐的和完全不和谐的。后者西方音乐家也经常会使用，只不过那是为了表现紧张、冲突和愤怒等复杂情绪，绝大多数耳朵被西方音乐“污

染”过的人都能听得出来。

测试结果显示，奇玛内人完全听不出不同种类的和弦有什么区别，他们觉得所有这些和弦都一样的好听。同样的测试如果给玻利维亚城里人做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不同和弦之间的差别。

为了保证测试的公正性，麦克德莫特教授又做了一个反向的试验。这一次他把奇玛内原住民的传统音乐录下来，然后用电脑处理了一下，加上了不同类型的和弦，然后他把经过改装的音乐播放给原住民们听，他们同样感觉不出任何差别。但当麦克德莫特教授把这些音乐播放给受过西方音乐训练的听众时，后者虽然从来没有听过奇玛内民间音乐，但却仍然可以立即分辨出不同的和弦类型。

麦克德莫特教授把试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起码在音乐这个领域，民族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觉得好听的音乐，在另一个民族听来很可能觉得难听得要死。☑



全球化，职业网球的现实与未来

文 / 张斌



(视觉中国 供图)

11月12日，在2017 ATP年终总决赛小组赛上费德勒（右）2比0战胜杰克·索克

过往六年，伦敦在全球化城市排行榜上位列首位，爱这座城市的人们深以为然。ATP(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 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年终总决赛在此上演，8名选手，8个国度，全球化的真实写照。1200公里之外，时尚之都米兰，一群英姿勃发的网球小子在“新生代网球赛中”一道探寻着网球的未来，如果说，伦敦时下正是“好看”的网球，那米兰则在塑造“好玩儿”的网球，各种新规则和新装置一一亮相。职业网球瞩目未来，一个全球背景下，斑斓的未来。

时近年终，打开ATP排名，前25位高手来自不同大洲，这也是一种可以暗自欣喜的所谓全球化趋势吧。大势如此，所有人都在思量如何乘势而起。足球，一向被定义为“世界的运动”，网球虽无此王冠，但只要探入职业网球的历史岁月，不禁会感慨一番，网球拥抱世界的胸怀越来越宽广了。

上世纪60年代，40项四大满贯赛事中，澳大利亚男单选手统治力凶悍，一举捧走32座奖杯。但从2002年以来，这个数字居然变成了零。1974年至1999年，26个年终男子排名第一选手中16位是美国人。看今朝，世界前十中，只有一位可怜的美国小伙子。男子如此，女子亦然。今年女子四大满贯单打得主分别归属了两位美籍非裔、一位拉脱维亚和一位西

班牙姑娘。登顶的选手不仅属于网球的传统国度，也可以来自武汉、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

1997年，美国一家便承办29个网球顶级赛事，现在萎缩到了14个，球迷们和明星们被迫对希尔顿海德岛、芝加哥和斯科兹代尔这样的美国网球名都说再见，而要习惯与向天津、伊斯坦布尔和金奈问好了。是什么在深深地决定网球影响力的分布呢？答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均衡性。1960年，美国天下独大，占全球40%的GDP，60年过后，占比已然退至20%左右。世界体育在建构新的市场前景，保守主义虽然不断抬头，但全球化催生的澎湃需求让赛事像风中的种子一般四处飘落扎根。

过去，网球巨星们因为避税而离开祖国，选择摩纳哥这样的天堂。当下，更多的球员则为了更好的训练条件和网球氛围而选择长期居住的国度。2012年，小威拜在法国教练门下，理由之一便是“要看看这项运动到底是如何运转，别人是如何思考的”。背起球拍行走世界从来都是网球明星们的生活常态，但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则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交媒体的黏性让明星与球迷们仿佛总在同一时空之中。纳达尔一年在美国比赛三场，在亚洲出场两次，在其精心打造的社交平台上，1500万全球支持者被他撩动心情。

费德勒则更有王者之尊，他一人的媒体力量往往抵得上ATP、四大公开赛和网球频道的合力，他的全球化属性深刻地改变着网球运动的面貌。费天王是瑞士人，时常也会在迪拜居住，在非洲运行着自己的慈善基金，教练是克罗地亚人，陪练是瑞士人，经纪人则是美国人，在南美有着属于自己的系列表演赛事，今年秋天参与创办了拉沃尔杯——职业网球世界中的莱德杯。网球的世界无疑也是平的，全球的资源在自由配置，市场的开放度超过历史的任何时代。

网球，甚至体育本身，从来在时代大潮中都保持着灵动的敏感，甚至扮演着推动代际转变的角色。女金刚和阿什以网球世界为投身社会和政治洪流的舞台，比利金则在这里拉动了男女平等的时代风尚，几乎也是网球第一个无限接近着男女同酬的目标。这个时代，打破保守主义并迎接竞争，职业网球向前的脚步稳妥，身段未曾变形，冲破藩篱，让自由和开放成为永恒的主题。潮流使然，顺应也就是了。■

听

见

幸福

一本书
一部电影
一张音乐专辑里的
声音哲学



主/讲/人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加入他的朋友圈
在声音的哲学和艺术中
获得安抚心灵、减少焦虑的力量

音频

图文

私享会

三艘航母齐聚西太平洋的启示

文 / 宋晓军

11月11日，时隔10年后美国海军三艘航母再次齐聚第七舰队所辖的西太平洋展开军事演习。尽管美舰队司令斯威夫特（Scott Swift）上将对此举进行了“公关宣传”，但鉴于4月份三艘航母齐聚的“乌龙新闻”和随后第七舰队发生的两起严重“撞船事件”，这次三艘航母齐聚的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国内媒体的关注。其间有媒体朋友问我如何看这一现象，我回答说：虽然这次美国海军三艘航母齐聚远没有上次那么被关注，但从7个月前的那次“假齐聚”到现在的“真齐聚”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以及由此牵出的一些信息，对眼下国内媒体关注的中国航母的发展应该有很多启示。

说到这个话题，还要先从美政府问责署（GAO）今年9月7日下午16时送达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证词说起。这份题为《海军战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解决可持续的维护、培训及舰队面临的其他挑战》的报告，是GAO专门为国会调查第七舰队“撞船事件”把近年来多份报告中水面舰艇存在问题的汇集简报。其中涉及航母的至少有三项：一是航母部署时间增加影响了维护、培训。具体是2008～2011年航母每次部署平均为6.4个月，而到了2015年已达到9个月。二是从本世纪初海军为了减少增长快的人员成本通过技术改进减少舰员的配置，而此举在航母上实施

后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总成本没能得到控制，而且增加了舰员工作时间造成疲劳。具体是以2015年“尼米兹号”为例，舰员成本下降了1450万美元，而维护成本却增加了4100万美元。同时舰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81小时达到了108小时。三是无法按时完成舰船维修，阻碍了舰艇的战备状况。具体是从2011～2016年，21艘次航母的维修有18艘未能按时完成，导致损失了1103天的航母运营日，相当于每年牺牲了0.5艘航母的部署时间。

当然，我列举GAO报告中的这些信息，并不是要针对美海军航母“揭短”，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一支海军有了航母并不意味着会用航母，会用航母也并不意味着能用好航母。比如通过技术改进减少舰员配置，其初衷是为了减少成本，因为航母在全寿命周期内人员成本占了全部成本的近一半，那么到底应该配置多少舰员才是合理呢？再比如，随着航母部署任务的增加，为航母提供维护的公营船厂维护能力到底应该维持在什么样的规模呢？这些与使用航母相关的因素都要通过不断“试错”才能找到最佳答案。总之，如果说建造航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使用航母和用好航母则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实上，9月7日GAO向国会提交的证词就是要借助调查“撞船事件”向国会议员们说明这个道理。同时，也是敦促国会要求国防部和海军及时拿出改进的措施。

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近期媒体对美国三艘航母齐聚西太平洋关注度的下降和对所谓中国“三航母”新闻关注度的上升，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即中国航母在未来有可能填补美国航母不能抵达或来不及抵达的“权力真空”。因为在所谓中国“三航母”的新闻中，无论是已经入役的“辽宁号”，还是已下水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以及准备开建的第二艘国产航母，不仅都会像美国航母一样面临着“会用航母”和“用好航母”的诸多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恐怕比有百年航母使用经验的美国海军所面临的挑战还要更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此次美国海军三艘航母“真齐聚”的新闻背后，应该还有很多中国海军在未来航母队伍建设上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视频中国供图）

11月12日，韩国东部海域的三艘美国核动力航母当日全部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参与韩美联合军演



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

霍宏伟 著 定价：79.00元

古人用镜，不仅以之映照妆容、装饰居所，还用它来寄托相思、辟邪祈福，更用它来比拟人物、譬喻德行。本书挑选汉至唐代的铜镜，复原古人使用铜镜的方式和环境，将考古发现、古代文献、诗词、图像中的镜子融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精妙的镜中世界。

古人的日子：戊戌年历

扬之水 廉萍 著 定价：98.00元

以诗记历，以物解诗，尽可能细节化地再现古人的日子，是该书的初衷。春夏，读古人的耕田采桑；秋冬，读古人的渔猎收获……这一切往昔情景，在浩如烟海的古物、古画中，我们总是不难找到相应的实例，来一一印证。整本日历按农历编排，始于正月初一春节，结于除夕之夜，各种传统节日，相应文物，书内皆有标注，并附 2018、2019 公历年表方便使用。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

吴晓东 著 定价：48.00元

吴晓东在北大讲坛上推崇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无疑称得上大师，他选作阐释分析对象的九篇作品也已经或终将被证明为不朽。本书在严谨缜密的学院派研究风格之外，更增添了几分潇洒而感性的亲和力，对我们熟悉或热爱的小说与小说家，本书或许是一种有趣的“旧梦重温”。

国学课

邱雯友/张学波/田博元/李建崑 编著 简松兴 试题增补
定价：42.00元

一部实用的国学常识参考书，是同类书籍中最为凝练的一部。以极为简练精要的文字历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兼及国学总论、目录学和国学基本书目，书末还提供“国学常识题库”，是读者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了解国学常识最合适的读本。



日本国立小学365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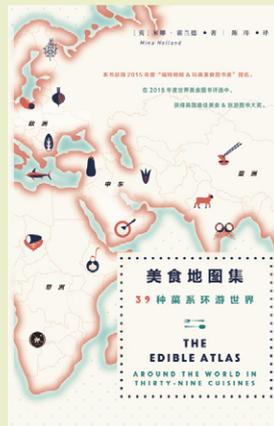
谭琦 著 定价：45.00元

本书记录了日本国立小学一年四季的校园生活，在教育细节方面有很多着墨，例如开学典礼、午餐教学、母亲的职能、社会课、游泳课、毕业歌剧的排演等等，对日本的基础教育有入微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也对比了中日基础教育的差别与差距。

美食地图集：39种菜系环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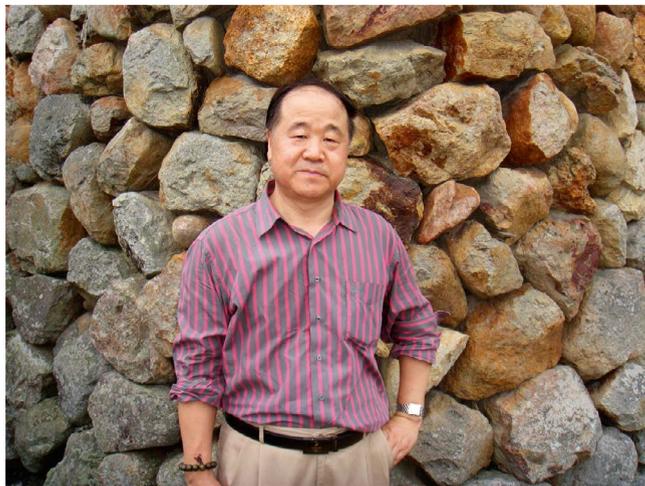
[英]米娜·霍兰德 著 陈玮 译 定价：49.00元

“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旅行。”作者选取全球 39 种菜系，品味其味觉特色，并探寻构成这一菜系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提供基本的烹饪技巧。本书将带着你做一次环球旅行，不仅是味蕾上的，也有历史的、文化的、风俗的。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5）

文 / 朱伟



莫言

《欢乐》后，莫言写了同样恣肆的《红蝗》，赶在反“自由化”的档口，遭严厉批判。这应该是莫言遭遇的第一拨乱棍。我记得有文章谴责他，居然堂而皇之歌颂本是污浊的大便，“审丑”就从那时起，成为批判他的路标。其实，“高密东北乡人大便时，一般都能体验到摩擦黏膜的幸福”，小说对四大爷蹲在春天麦田里出大恭的描写，百灵鸟在高空唳哨，满目新绿颜色，鹁鸪双飞，一点都没有污秽。莫言是对比在城里“如刀刮竹般大便的痛苦”，来形容高密东北乡大便“纤维丰富”的，大便当然也是乡情的一部分，却也实际挑战了读者已经固化的审美。我还记得《人民文学》编辑部批判会上，对莫言喻大便为“进口香蕉”的变了声的愤慨。他们不会体悟莫言所说的，“他们踩着草地，就像踩着我的胸脯”，当然就不能接受排泄中也有情感。

《红蝗》其实就是用第一人称“我”，写“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真力弥满、万象在旁”雄放的乡情，红蝗是载体。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的才华是不能围堰阻挡的，阻止，就将可能性都扼杀了。从这个角度，真得感谢纵容了莫言“飞流直下三千尺”放肆奔泻的这三十年，它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莫言写蝗灾，先写无数小蚂蚱像“牛粪”团在

一起，其膨胀如“昙花开放”，如“蘑菇云”爆破，就引来千点万点弹雨，溅起尘土，四处扫射。飞蝗如毛茸茸的厚云，掠过大地，潮水般汹涌，一浪浪滚成一条无数虫团结的巨龙，被阳光射上闪光的蓝色鳞片。它渡河而去，满河的虹光；上了岸，沾水的龙身就像镀了一层银——多了不起的想象力！没人能这样放肆、无节制地宣泄自己的才华。现在回头看，这放肆真倍感珍贵。

这小说开头写那个打“我”耳光的黑衣女子、守画眉的老头，猥琐的教授与他的情人学生，都为了衬托高密东北乡的雄放，一点都不随意。“我”随蝗灾，是走回家园的一个过程。这雄放最朴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性。小说开头那个黑衣女子及教授，都为用来对比铜锅匠与四老妈、四老爷与小媳妇、四老爷与九老爷的性态度。性是人的原欲，莫言喻女性生殖器是生命之船，男性生殖器是船上的桅杆。四老爷喜欢上穿红衣的小媳妇，四老妈喜欢上铜锅匠；九老爷既喜欢四老妈，又喜欢小媳妇。莫言回到乡村最质朴的男女关系，讴歌坦荡，鞭笞蝇营狗苟的虚伪。他写被休的四老妈一节，写她在明亮的阳光下，“翘起的奶头几乎戳到九老爷的眼睛上”；写她对四老爷、九老爷的傲慢鄙视；写她挂着那两只大鞋，挺胸骑驴穿村而过，鞋就像“光荣的徽章”；写得太光彩夺目了。遗憾的是，她最后被子弹击中的场景，又回到《红高粱》里“我奶奶的感觉”了。

还是那个老问题：既是人的原欲与原罪，性的诱惑与道德的冲突能否坦荡直面？我感觉，莫言小说中，在阳光下朴素的性，并不沾染肮脏尘土。

这个中篇后来变成他系列小说《食草家族》的第一章，“食草”是莫言在《红高粱》系列后，进一层对家族叙述的思考。高密东北乡人口中嚼着茅草根，不嚼，牙齿就会变黄变脏；而原始欲望构成着红色淤泥、红色沼泽。莫言称，他收到《食草家族》这系列里的中篇都是梦境。我的理解，这只是一种说辞，因为，他思考的原欲与精神的关系，在现实中有道德的樊篱，梦境里才有其豪放的自由的权力。

1987年冬至1988年春，他写完了实际上的第二部长篇《十三步》（《红高粱》与《食草家族》其

实都是互为独立的中篇组成的系列小说)。《十三步》原名叫《笼中叙事》，小说一开始，第二人称“你”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说，“真理就像我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它只吃笼外扔进去的粉笔，粉笔是教师生涯的象征。莫言在这部小说出版时的后记里说，关在笼里的这个，只是一个叙述者，形成一种叙述技巧所构成的丰富性，也构成生存形态的一个隐喻——思想是可以越出笼子的，但实体，必须老老实实待在里面。笼里，是角色，每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角色。

这是一部荒诞小说，讲述的故事是，生活可以虚伪，如故事冲破牢笼，命运却无法改变，改变的结果，便是荒诞的悲剧。核心故事是，物理教师方富贵猝死在教室，送到殡仪馆，殡仪馆里的整容师是方富贵同事张赤球的妻子李玉蝉，张赤球与方富贵是只隔一堵墙的邻居。方富贵的死正遇上教师节，王副市长本要去学校追授方富贵“优秀教师”的称号，却也在上午倒运猝死。李玉蝉本来要给方富贵整容，就换成了王副市长，方富贵进了冰箱。王副市长还是王科长时，就要了李玉蝉的童贞，王科长不仅是李玉蝉母亲的情人，也是李玉蝉的情人。小说中的李玉蝉在整容床上，拔去王副市长的金牙，剥去他肚子上的脂肪，送进动物园，达成与动物园管理员的交易。

而方富人死心不死，他顶开冰柜的门回家，敲开家门，妻子屠小英把他当成鬼，李玉蝉却开门让他进了屋。为满足他不死的愿望，李玉蝉将他整容为自己的丈夫，替代张赤球去学校上课。张赤球不想当老师，就持原貌，外出挣钱。这就出现了“死不了，活不成”的荒诞。外表是张赤球的方富贵去接近屠小英，屠小英以为是张赤球用方富贵的形态勾引她，方富贵因此被同事骂作禽兽不如。屠小英最终投河自杀，方富贵求李玉蝉还他脸不得，只能以张赤球的身份悬梁自尽，又死一次。张赤球出门做生意，想到方富贵成了他家的主人，万念穿心。他不会做生意，反被当作精神有病，关进派出所。出了派出所，又被当作杀虎偷皮的同伙，经甄别无罪释放回到学校，面对外形是他，实质是方富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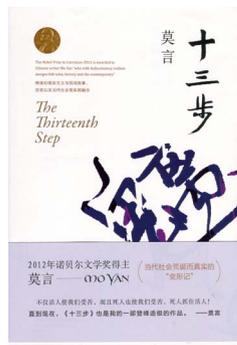
追悼会。这表面荒诞背后的悲剧人物是李玉蝉。小说有意抹杀了她对王副市长、对那个中尉、对张赤球、对与她在整容床上做爱的殡仪馆长的喜怒哀乐，似乎她就是一个被扼杀了情感的做爱工具。最后，老情人的儿子还要继承父亲的位置，催她快快上床。从笼中角色的位置体会，方富贵、张赤球毕竟还有悲哀，李玉蝉却连悲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这部小说是莫言在当时都在比试“先锋手段”的背景下，对自己能量的试探。笼中叙述人的角色其实非常重要，它形成重要的意象与不断变换的视角，构成不断的人称转换，不仅混淆本来并不复杂的故事，以扑朔迷离，丰满叙述的腴理，也使笼中的意念更具深度。就“先锋手段”而言，这个角色最值得称道。篇名“十三步”是什么意思呢？小说中的说法是，人要看到麻雀单步走，就会有好运，比如它走一步你交财运，但要是看到它走了十三步，好运就都会变成厄运。这其实只是故作悬念，十三本来就是不吉利要镇住的数，因此，儒家有《十三经》，而农历正月也称“十三月”，又回到起点了。莫言这部小说写了十三章，我以为，《笼中叙事》的含义本来要深于《变形记》，但莫言一改名，牵引读者去魑魅的方向，这魑魅指向人生，十三步便是人生枷锁的含义了。

在那个比“先锋肌肉”的时代，这篇名就像凸起的那块“肌肉”。☑（待续）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蝗》是《食草家族》的第一篇。《食草家族》1993年由华艺出版社首版



长篇小说《十三步》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首版，现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新集结出版

我的抄书生涯

文 / 周铁钧 图 / 陈曦



去年退休，整天除了遛弯儿就是看电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一天，电视讲述明代大学士张溥抄书苦学，一生编著典籍千余卷的故事，勾起了我年轻时抄书的记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有一次，向同学借得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刚看几页，就被故事中阴森的老宅、幽谧的石阶、神秘的绣花鞋深深吸引。记得那晚一夜没睡，连看三遍，因借时有约，第二天上学必须归还。

后来几天，满脑子都是《一双绣花鞋》撼人心魄的情节，想到故事的紧要关头，恨不能马上把书拿来再看一遍。没几天，又从同学手里借到手抄本《阴阳铜尺》，故事更加离奇精彩。同学要去乡下串亲戚，二十几天才回来，时间如此宽松，我何不也抄下来？于是买来白纸裁订成本，放学后就躲在家里抄写，用了十几天时间，抄完一册86页的手抄本，改完错字细读，感觉仿佛不是抄来的，是自己刚刚写完的惊险故事。

自己有了手抄本，便与同学“换抄”，不到半年，我抄完《叶飞三下南京》《绿色尸体》《13号凶宅》等十几本。有一次把自己抄的《地下堡垒覆灭》借出换抄，还回来却是另一种抄本，看着陌生的字迹，许多细节也与自己的抄本不同，本来熟悉的故事，又读出一种另类感受。

还有一次，我得到一本前后撕去多页的书，书脊也无字迹，虽无名无头尾，内容却万分引人：一个叫巴克莱的美国人带领中国考古队，在一个神秘山洞找到一支青铜剑，历尽曲折，在深山老林又发现古代部落虎族留下的珍贵文物。接着巴克莱密施巧计，让隐藏在考古队的国民党特务原形毕露。后来，已找到的文物突然失踪，一名考古队员下落不明，大家分成几个小队出去寻找……故事到这里，书页撕没了，虽如此，我还是把引人入胜的残本抄了下来，但书叫什么名字，精彩的开篇、神秘的结尾究竟如何，简直成了我的心结，曾问及许多爱看书的人，都没有答案。

直到我参加工作，这本书的谜仍时常在脑海翻腾。后来调转工作远离故乡，那本书的记忆仍时有涌起。2008年，我结识了一位退休教师老田，一次闲谈，我提起那本书，老田听完书的故事，说：“这本书我年轻

时看过，但记不起书名，哪天去学校图书室找找。”

没几天，老田兴冲冲地举来一本书：“你说的书找到了！”我接过一看——《古峡迷雾》。激动中翻开书页，把没看过的页码一目十行地粗读一遍，而后细看，书的作者是童恩正，上海少儿出版社1960年出版。后来查阅资料得知，童恩正是考古学家和作家，1959年，他到巫山古峡参加考古发掘，壮美的山川激起他的创作欲望，考古结束后写出侦探悬疑小说《古峡迷雾》，1963年他又写出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年被改编拍摄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我用3天把缺少的5000多字全部抄完，订成一部新的手抄本，才长长舒了口气：“40多年，这本书终于抄完整了！”当时的心情如卸下多年的心头重负。

如今退休，闲寂无聊，何不捡起抄书的老爱好？现在，我每日都要抄上几页。久不动笔，字迹有些趑斜，但整页看还是规范工整。有一天，老友来访，他看了抄页，建议按古籍版式抄，然后装订成书，既规范又有收藏价值。在他的启发下，我买来宣纸，到印刷厂切成大16开，打上红框黑格，这回抄完再看，果然素气雅致、古色古香。于是，我开始系统地抄起来。

上了岁数，不比年轻时目清手灵，常抄错字、错行，出了错一整页就前功尽弃。但时间长了就找到出错根源，是意存杂念、精神不集中。于是我就把《红楼梦》和《唐诗宋词》两部古籍轮换着抄，每次抄书前，我都要先平心静气，清空意念中的繁杂，脑、眼、手协调，呼吸平稳自如，凝注笔端，犹如轻舒缓移地打太极，在宁静愉悦中心随意走，墨流神韵。

后来，我请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友帮我题写书名，他翻阅一阵，说：“抄得非常工整，就是字缺少章法。”听了这话，我顿有所悟，第二天买来硬笔书法字帖参照临摹。不久，我的硬笔楷书、隶书也写得有模有样，一年多后，还在全市硬笔书法比赛中得了二等奖。

如今，抄书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闲来翻翻这些年抄的书，品味苦中有甜、累中有乐的时光，别有一番意趣。☑